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8

1 9 7 5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摘　译

外国哲学历史经济

一九七五年第八期(总第八期)

上海外国哲学历史经济著作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5.25　字数119,000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171·87　　定价：0.38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战争问题·

从美国官员言论看苏修的进攻态势
……巩　雨（1）
美国必须保持强大 ……〔美〕约翰·麦克卢卡斯（4）
世界海上力量 ……〔美〕威廉·米登多夫（12）
早就警告过你们了 ……〔美〕《新闻周刊》编辑部（20）
美国主张使用核武器对付苏联的进攻
……〔美〕《纽约时报》（25）
小资料　美苏军事力量对比 ……（27）
战略上的适应性 ……〔美〕威廉·R·范·克利夫等（29）
欧洲的常规战争——苏联的观点
……〔美〕小达拉斯·布朗（37）
人物志　施莱辛格 ……（46）

·苏联民族问题·

“民族一体化”就是法西斯化 ……铁　钧（50）

苏联的民族政策和乌克兰的反抗
……〔加〕博丹·R·博丘尔基夫（53）
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辩证法"
……〔加〕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托恩（62）
亚美尼亚人也起来反对莫斯科了
……〔美〕保罗·沃尔（79）
一份使当局困窘的呼吁书
……〔英〕《苏联问题分析家》（82）

·关于巴西经济·

是经济奇迹，还是畸形经济？……（85）
巴西工业的非民族化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阿诺（87）
巴西没有奇迹 ……〔委内瑞拉〕《一周》周刊特别通讯（102）
巴西的外援……〔美〕伊斯雷尔·约斯特（110）
巴西的实用民族主义 ……〔美〕潘友苏（122）

*　　*　　*

西方经济衰退如何危害苏联……〔美〕《商业周刊》（133）
苏修报纸讨论什么是"轻快生活"……（141）
章　鱼……〔美〕理查德·J·巴伯（145）
外国史学·经济·法学·出版动态（五则）……（154）

战争问题

从美国官员言论看苏修的进攻态势

巩　雨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国防部长、空军部长、海军部长等等高级军事官员纷纷发表文章、讲话，大谈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力量对比和美国的军事战略，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

从本刊这一期摘译的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空军部长麦克卢卡斯、海军部长米登多夫的讲话以及其他一些有关文章、资料看来，美国统治集团已经越来越感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势。从施莱辛格发出"狼来了！"的惊呼声中，人们可以清晰地听到苏修这只恶狼的嗥叫。美国空军部长算了一笔账：苏联的国防预算"在一九七四年也许比我们大百分之二十"，"这一趋势具有十分严重的含义"。美国海军部长则说："苏联海军迅速扩充实力的趋势，同苏联其他战略战术的军事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将使任何一名海军部长有理由感到忧虑。"这些话，出自美国高级军事官员之口，确实反映了美国统治集团的危机感。须知美国统治集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爬上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地位以后，从来就是骄横暴戾、不可一世的，从来没有说过这样愁眉苦脸的话。现在，一个更加阴险狡诈的、武装到牙齿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站在美国面前，怎样对付这个敌人，自然成了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的要务。发展空军，发展海军，发展核武

器，发展常规武器；准备打常规战争，准备打核战争，……就是美国统治集团关注的中心。因此，美国高级军事官员的这些言论，深深反映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

明明是激烈的争夺，却偏偏要大叫大嚷“缓和”，这不过是麻痹敌人、使自己乘机扩张的手法罢了。两霸采取的都是这种手法，只是苏修特别擅长。美国当权人物也是一些老奸巨猾，他们又何尝不知？美国空军部长就捅了一下子，他说：“任何人也不要相信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能排除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缓和并没有阻止苏联继续增加它的军事实力。”美国海军部长惊呼：“我们现在正面临苏联海军的挑战。”这倒是真的。在“缓和”的烟幕下，苏修的武装部队超过了美国一倍，坦克超过了美国四倍以上，潜艇超过了美国近三倍，大型水面舰艇、战略核导弹都大大超过美国。我们要注意，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但是在扩军备战的规模上却大大超过了美国，他们想干什么不是很清楚吗？现在，苏联不仅具有庞大的陆、海、空军事实力，并在积极地发展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苏修依靠军事实力，在世界各地制造紧张局势，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了全球性的挑战，严重地动摇了美帝的霸权地位。当然，随着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也就步步扯下了披在它脸上的“缓和”的面纱，使世人对它的凶恶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

面对苏修的步步进逼，施莱辛格提出，战后美国的核“威慑政策”，“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但是，施莱辛格提出的“灵活反应”的核战略理论，也不是过去美国那种“威慑政策”的简单翻版。根据“灵活反应”核战略理论，美国的军事实力虽然仍旧是建立在战略核力量的基础之上，但是，它要求美国军队具有打有限核战争的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常规军事力量，准备同苏联在欧

洲主要战场上进行一场“长期的常规战争”。施莱辛格甚至主张，如果美国不能阻止苏联在欧洲的进攻时，可以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

施莱辛格为美国帝国主义设计的全面对抗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军事战略，是美苏争霸愈演愈烈的反映。这种情况表明，战争的因素正在进一步增长，世界不安宁的局面将会日益加剧，全世界人民要有所准备。

美国必须保持强大①

〔美〕约翰·麦克卢卡斯

大约每年这个时候，总统总是把联邦预算提交国会初审。这件事也在报纸和其他宣传工具中占了显著的地位。若干年来，人们曾要求削减防务开支，今年也不例外。此外，在最近几年内，有些美国人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在缓和的时代大大地减少我们的防务费用。

在我看来，问题的回答有两个主要部分：通货膨胀和军事平衡。

通货膨胀的影响

在讨论通货膨胀时，关于它的严重影响，在这里无须我跟大家多讲。然而，我怕很多人没有认识到它对国防的影响到底如何严重。

一九六八年以来，虽然国防预算按当年美元计算或多或少保持原有水平，但它的购买力已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左右。仅在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预算中，看来我们已因通货膨胀实际减少了六十亿美元。

如果我们从一个较长时期来观察，这一影响甚至会更引人

① 这是美国空军部长约翰·麦克卢卡斯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讨论会上的讲话。

注目。例如，作为五十年代最高一年的一九五三年国防预算接近五百亿美元。如果按一九七五年美元价值计算，那一数字将达一千二百亿美元左右。

我的论点是：不管哪一年的美元总额有多少，有必要考虑到它们能换到的用以完成任务所必需的实际国防物资。

你们大概熟悉的一个例子是燃料的费用。空军曾对节约能量作出很大努力。因此，我们预料今年燃料的消耗量将比一九七三年减少百分之二十七。然而，由于石油价格的上涨，我们的燃料费用将比一九七三年大一倍以上。我们已经学会用大量减少燃料消耗的办法过日子，但仍不得不花两倍到三倍的燃料费用。

顺便提一下，试图预测通货膨胀率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有时难于作出费用估计。你们不时会听到个别的防务计划费用增加了；但在最近几年内，大量的费用增加常常可以归因于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在对我们的防务是如此必要的 B-1 战略轰炸机计划中，在一九七〇年整个计划的费用估计中，大约有八分之一是由于通货膨胀造成的。今天我们估计通货膨胀几乎将使总费用增加一倍。在七十年代的以后几年里，如通货膨胀率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一，则累计生产 B-1 的总费用将增加十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考虑通货膨胀，仍按一九七〇年美元价值计算，目前估计生产一架 B-1 的费用是三千四百三十万美元，比计划开始时增加不到百分之十二。

这样，我认为通货膨胀是我们为什么不能降低国防预算的一个主要原因。事实上，它的影响是如此严重，以致更为恰当的问题也许应当是我们怎么才能不让预算大幅度地增长呢？的确，自一九六八年以来，购买力削减了百分之四十，而承担的义务并没有相应地削减。国家仍希望有充分的军事安全。它还希望缓

和有进一步的进展。这两个目标有赖于保持一个世界范围的军事平衡。这不是说单凭军事实力就够了，但这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军事平衡

显然，对某些人来说，缓和同实力是不相容的。这种看法多半是基于实力造成紧张和冲突的观念。虽然我认为没有足够的实力恰恰能产生同样的紧张和冲突，我想真正要牢记的一点在于缓和是合作和竞争的一个混合体，而且是一个十分微妙的东西。我们必须敏锐地意识到缓和的利益和它的局限性。在一九七五年，它还不是以人类十足的利他主义为基础，而是以互利为基础，特别是避免核战争的灾难。过去几年中，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这种缓和的关系，我们对未来怀着希望，但是现在还不是松懈我们军事态势的时候。即使我们不再处于冷战之中，但我们还没有获得稳定的和平。

当然，缓和并没有阻止苏联继续增加它的军事实力。中央情报局估计，在我们开始从东南亚撤军后不久的一九七一年财政年度内，苏联国防费用比我们的还要大。当然，要对苏联计划的费用按美元作出精确的计算是困难的；然而很明显，他们的国防预算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在一九七四年也许比我们大百分之二十。苏联国防费用比美国大这一趋势具有十分严重的含义。

尽管我们认为，苏联人不能在一个夜晚来获取军事上或政治上明显的优势，但是，我们却关心他们正在发展新技术，这种新技术从较长时间来看确实能够产生那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强调：需要在军事平衡中保持“必要的均势”的理由。

在战略领域内，苏联人有一个广泛而野心勃勃的以四种新洲际弹道导弹为重点的研究和发展计划，其中三种曾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进行试射。所有这四种新洲际弹道导弹的部署目前正在进行中或就要开始进行。此外，苏联人有一种新的、远射程的、机翼能摆动的、逆火式远程轰炸机。他们还继续生产更多的装有现代化的四千哩射程导弹的核潜艇。

我们曾试图通过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来保持战略均势。在限制战略武器第一轮会谈中，双方达成了限制战略进攻导弹发射架和反弹道导弹的数量的协定。然而，进攻性武器的限制对双方来说是不相等的，而且在质量方面没有约束，例如把现有导弹改装为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在五年协定期间内，有若干因素其中包括我们在轰炸机数量上的优势弥补了这些不利的条件。但就较长时期来说，苏联人有潜力使用一种新的轰炸机，并利用他们较大的导弹升力或发射重量来部署核弹头，比美国所能有的以地面为基地的导弹的核弹头多一倍以上，那就不会存在必要的均势了。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达成的谅解中，我们建立了导弹发射架和轰炸机的总量相等原则，其中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的数量单独加以限制。这个谅解在保持战略均势方面前进了一步，而且为今后减少战略武器水平提供基础。然而，具体细节仍需谈判，甚至在具体细节谈妥后，必须不让苏联在质量上的改进造成严重的不平衡。

由于发展一种新的重大的系统至少需要十年时间，因此，如果要同苏联将来巨大的战略力量的改进保持平衡，我们就必须继续发展并改进我们的导弹力量。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着眼于象空军机动力这样一类新的概念的理由。我们最近试验了空中发射方法的实用性，从一架飞机上投下一个信管保险的民兵式

1号导弹，用降落伞垂直拉着，然后很快让它着火。我们还正在研究地面机动导弹和越来越坚固的发射井。

当苏联增强它们的战略能力时，轰炸机变得更为重要了。这种载人的武器使敌人不能通过发展一种有效地进攻我们的三合一战略力量——洲际弹道导弹，海上发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的方法来抵销我们的威慑力量。而且，轰炸机能够提供高度的选择力和调节灵敏度；这样，在继续制止全面核战争的同时，轰炸机在回答有限核进攻方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法宝。在危机形势下，这个机动的能力非常有助于谈判的进程。

现代化的洲际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将帮助我们保持战略均势。它们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苏联人正在增强他们的力量，而且从长远来看，他们也许会处于一种打破平衡的地位。因此，我们也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核力量。

然而，一般核战争的威慑力量并不是我们唯一的要求。我们还需要有制止常规战争的能力，当这样一种战争真的开始时，才能保卫我们的国家利益。任何人也不要相信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能排除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一九七三年中东战争就是在缓和的情况下发生这种战争的一个例子。

对空军来说，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在特定场合，这种暴力行为的爆发意味着除了我们的核力量外，还需要一个战略空运能力。我深信，例如在一九七三年秋，我们对中东空运装备的迅速反应，对缓和战争在那里的影响和使之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建立和平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在显示我们空运能力的同时，我们还重申，这种空运能力对应付欧洲可能发生的重大冲突来说还是不够的。因此，我们已着手一项改进我们的战略空运力量的计划。这一计划包括加强我们的C-141运输机的运输能力和改进民用客机，使它们能够在紧急情况下运送军用物资。

中东战争也证明了现代战术空军力量的必要性。在防止或打一场常规战争时，空军在对付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地面部队或地面武器方面，也许可以作为巨大的均衡力量。以欧洲为例，战术空军在抵销华沙条约国在坦克方面的巨大优势中，必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果要使我们的战术空军有效，它们必须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加以现代化。举例说，我们目前主要依靠的 F-4 战斗机，这种飞机大约是在十五年前设计的。要在下一个十年中继续保持空中优势，我们需要一种更现代化的飞机，足以打败苏联人能够制造的最好的战斗机。

因此我们发展和制造了 F-15。这是一种最好的飞机，它在试验中已有卓越的成绩。在过去几周中，在达到各种高度的升高时间方面，它打破了国际公认的、包括苏联米格-25 狐蝙式飞机在内的纪录。这还只是 F-15显示力量的一项指标，这项指标在控制天空的能力中是一个主要因素。我们指望它给我们所必需的空中优势。

为了给地面部队以较好的支持，我们正在生产A-10 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这种飞机将是简单而又结实的，因而它能在前沿阵地进行活动。它将能大量载重并在低云和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飞行，这种情况在欧洲是经常遇见的。A-10 还将能击毁重型装甲车，因而在防止华沙条约国在欧洲发动一场常规战争中起一种主要的作用。由于现代常规战争要求空军的近距离控制，又由于我们需要改进同海外地区的盟国空军的协作，我们发展了空载警报和控制系统(AWACS)。它主要是利用一架波音-707 飞机，在机上装备长距离雷达和有关的计算机等。AWACS 的新型雷达能够看到几千平方英里地区上空的几百架飞机，甚至还能发现快速、低飞的飞机。它也能侦察和追踪敌人的海军。因

此，我们相信 AWACS 会使我们在整个战斗区域中，在改进部队的指挥和控制方面得到一定的提高。它在欧洲特别有用，因为，在那里的战斗很可能要使用密集的飞机和其他军事力量。

这些现代化的方案，将继续使我国在空军方面比谁都强大。我们认识到它们要花费巨款，我们正在尽可能节约地来完成这个任务。举例说，我们曾经制造过一种有战斗力但并不是很尖端的飞机，它能使我们降低生产战斗机的费用。对两家承包工厂的飞机原型进行比较后，我们选择了 F-16，把它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新的战斗机。F-16 对F-15 的性能作了某些补充，我们认为这两种飞机将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在成本方面使数量和质量之间取得有效的平衡。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也对这样一种飞机感到兴趣，我们希望他们将选择 F-16。如果他们这样做，这将会帮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装备的标准化并降低国防费用。

同其他武装部队所需要的措施一样，这些方案将会帮助我们保持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平衡，这种军事平衡对缓和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正在要求美国公民为此付出代价。

然而，对有些人来说，仍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要担负起这么广泛的义务呢？简单地说，因为没有别的国家能够这样做。只有美国有力量对抗苏联的实力。只有我们才能保证有足以遏制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平衡。

让我说明一下为什么我们必须提供这种均衡。在战略部队范围内，美国是能够保持对苏联有毁灭能力的唯一国家。那就是说，只有我们能够保持战略力量，并使苏联的设计者相信，即使在对美国进行第一次打击后，我们的残存部队仍足以使苏联遭受到无法忍受的损害。此外，只有美国能够对我们的盟国提供可靠的“核保护伞”。因此，正是美国必须制止核战争。

历史证明了一句古老的格言是正确的，战争发生于军事力量的明显不平衡，而不是平衡。去年八月，福特总统就职后不久，他保证和我们的盟国“继续忠诚合作”。我们仍然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当我们既不是世界警察，也不热心于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无疑仍然是积极的集体安全制度的主要支持者。

结　论

简单地说，国防预算同你们的家庭预算一样，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但更重要的是，它的规模还反映了美国人民的意志，即应当考虑到日益增长的苏联军事力量的现实和由此而引起的美国的国际义务。

当然，我们作为人民可以决定不承担这个义务，但在我们做出这种决定之前，我们应当认识到它会引起的后果。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上个月在纽约的谈话中指出：“除非我们准备去保卫在北美以外的世界的各地，否则，我们将会很快发觉，除了北美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以保卫了。”然后，他强调说：“在那种情况下，国家投入防御的力量将大大增加而不是减少。”这对任何人都不可能是一个美好的前景，不管他所关心的是国内社会进步、国家安全还是个人自由。今天，这是我们还能够作出决定并加以避免的一种形势。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美国《当今重要演说》半月刊
陈声雅、袁缉辉译）

世界海上力量[1]

〔美〕威廉·米登多夫

纵观美国历史，海上力量是构成我国强大所必要的一部分。一支强大的商船队促使我国的经济向前发展，它为我们的工业基地输送了必需的原材料。

一支强大的海军保卫了我国的海岸，保护了我们的海运航线，防御侵略，并且在全世界表明美国的存在。

毫无疑问，海上力量对我国的发展曾起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着许多关键问题。作为一个国家要生存下去的能力，我们比以往更加依赖于海上力量了。

在这些关键问题中，首先是政治问题。中东的紧张局势日趋严重。这个敏感地区以前所发生的历次危机表明，在稳定潜在的动荡局面和制止外来干涉方面，美国的海上力量的作用是显著的。

美国海上力量所固有的种种能力，可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美国海上力量的能力主要是：

（1）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内，都具有可靠地履行美国军事承诺的能力。

（2）几乎在世界任何地区，都具有保护和撤退美国公民的能力。

---

① 这是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米登多夫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在旧金山的一次讲话。

（3）在无须同时作出武力承诺的情况下，具有显示军事影响的能力。

（4）在不泄露真正意图的情况下，具有明确表示美国利益和力量的能力。

而且，外交约束、基地权利、飞行特权或东道国的压力对海上力量的影响都是最小的。

当前国际舞台的特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界限分明的两极化政治转化了。现在和将来，国际争端会越来越以政治和经济问题为特色。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国家战略下，美国海上力量在帮助国际稳定，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将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是经济问题。去年，石油生产国拥有的货币储备金已从一百三十亿美元上升了两倍，达到三百八十亿美元。这些储备占世界货币储备金的百分之十九，几乎同工业化的欧洲在一九七〇年的全部储备金相等。财政部长威廉·西蒙最近指出，到一九八〇年，这种资本积累将二十倍于现在，可能超过五千亿美元。

比如，沙特阿拉伯目前在世界最大货币储存国中占第四位。而去年这个时候，沙特阿拉伯仅有四十亿美元，这笔相当大的金额占世界第十三位。今天，它的储备总额达一百一十五亿美元。只有西德（三百二十五亿美元）、美国（一百五十七亿美元）和日本（一百三十二亿美元）超过沙特阿拉伯。

这种财富的急剧积累，而且集中在十分敏感的中东，就有对世界财政体系造成新压力的威胁。

美国海上力量对稳定这个战略地区（那里，集中着百分之五十以上已探明的世界石油储藏量），很可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

此外，世界上最集中的石油海运都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

条狭窄的、沟通阿拉伯湾和印度洋的水道，每天平均要通过近两千万桶石油，占世界石油出口量的一半。如果这个海峡为一个敌对国家控制，就能完全切断大部分自由世界同它的主要石油产地的联系。同样，如果印度洋为一支敌对海军控制，就会妨碍或剥夺油轮的航海自由。

现在，苏联舰队经常在印度洋活动，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一般包括一艘导弹巡洋舰、几艘驱逐舰、一艘两栖艇和几艘辅助舰只。相反，美国海军的中东舰队只有三艘军舰。另外，美国现在定期派遣航空母舰特遣队进入印度洋。

第三个问题仍是经济问题。今天的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外国的原料和能源的输入。

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须有七十一种不可缺少的战略性原料和金属。我们必须进口六十八种这样的原料和金属，而且全部或者部分要通过海运。

一九七三年，美国由海运进口了五千万吨以上价值超过四十亿美元的原料和矿物。

据估计，在今后的十年中，我们必需进口的物资还有一半仍将通过海运。

我们的能源也依赖进口。在一九七三年，我们由海运进口了近五亿八千万桶原油和精炼油，占我们国内消耗量的百分之二十九。

保护这类重要物资的运输航道就是美国海军的任务。为了维护我们的国家政策，在当前世界上施加一种政治和外交影响，也是美国海军的任务。

现在美国海军舰队服役的舰只，已下降到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半以来的最低数，然而，今天我国的军舰确实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式军舰强得多。

现在的“企业”号航空母舰装载着尖端的 F-14、A-6、A-7 航空队，比第二次大战时同样的航空母舰拥有更加强有力的打击力量。

但是，仅仅六年前，我们还有一支近一千艘军舰的现役舰队。由于这些军舰大部分是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建造的，还由于财政预算的限制，我们把海军削减了一半，以致今天大约降到五百艘以下了。

战舰预定服役期限是二十五年至三十年。在一九六八年，服役舰队的平均舰龄已达到十八年。因此，显而易见，为了建造我们所需要的新舰只，必须缩减旧舰只的数目。

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七年期间，我们海军曾计划每年建造约五十艘新舰只。后来，为了满足越南战争的财政需要而减少了造船费用。

我们还花费了很多钱改装三十一艘北极星潜艇，把它们装上了海神式导弹，从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战略威慑能力。

过去的六年里，尽管我们不得不裁减服役舰队中的超龄舰只，而我们的海军却每年只允许建造十三艘新舰。这种每年十三艘的造船速度，意味着美国海军永远不能恢复九百艘军舰的实力，而且，除非增加每年造船量，否则可能连一支五百艘军舰的舰队都维持不了。

事实上，如果不迅速纠正我们所采取的行动路线，就会形成单方面裁减海军。

解决这个紧急问题有若干方案。

在我们的一九七五年度造船计划里，我们采用两种方案，连买带造，将有助于增加舰队的数量。

第一种舰艇是导弹水翼巡逻艇。这种巡逻艇在波涛汹涌时能高速参战，将使海军在变幻莫测的战斗环境下具有一种有效

的打击力量。这一类的舰艇能立即担负起原先由我们大型舰船负责的巡逻和监视任务，从而，就能把我们的斯普恩斯级和诺克斯级战斗舰替换下来，去执行其他任务，诸如参加航空母舰特遣舰队的活动和参与反潜艇战。我们希望建造三十艘导弹水翼巡逻艇。

第二种舰艇是护航炮舰。我们设想，这类军舰将为舰队提供一种造价低廉而载重量大的舰只，用来执行十分重要的护航任务。我们希望建造五十艘这类军舰。

另外，我们在继续建造斯普恩斯级驱逐舰、洛杉矶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艇和三艘核动力航空母舰。

还有一个更为先进的设想是水面效应舰只，这类军舰的时速超过八十浬。一旦研究和发展工作完成后，我们就可以建造这类军舰，部署在世界各大洋。这类军舰的高速性能和精密的武器系统，能使它们在将来成为一种有效的、几乎是战无不胜的军舰。

国会完全了解海军需要更多的军舰和我们造船计划里的问题。国会同意在今年的预算中建造二十二艘军舰。

但是，可怕的通货膨胀，却使我们的造船努力受到挫折。

比如，废钢铁的价格在不到一年内几乎涨了一倍。全部造船费用可能将上涨百分之二十。因此，主要由于通货膨胀，我们海军的造船计划现在已亏空二十亿美元。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各级政府都注意到这类关键性的问题，并在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我感到，在行政机构或立法机构里的每个人都认识到有这种需要。归根结蒂，这是一项当我们面临着具有深远影响的情况下完成重建舰队任务的问题。

在上述范围内，我要谈一件十分重大的军事问题。在美国舰队削减一半、造船计划又受到通货膨胀威胁的时候，我们现在

正面临苏联海军的挑战。

让我先说一下，苏联海军起初还不是羽毛丰满的。那时，美国海军拥有巨大的支持力量，拥有真正的、经过战斗考验的实力。

然而，我本人认为，苏联海军扩充实力的趋势是从有原子弹以来最重要的战略发展之一。

把苏联海军迅速扩充实力的趋势，同苏联其他战略、战术的军事发展联系起来考虑，将使任何一名海军部长有理由感到忧虑。

关于苏联海军：

（1）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它们除了航空母舰外，在建造各种类型的舰船方面已超过我们。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三年期间，它们增加了两百七十一艘大型水面战斗舰和潜艇，而我们却只有一百七十六艘新舰艇。

当前大型战斗舰和潜艇数

舰名	苏联海军	美国海军
航空母舰	2 艘	14 艘
巡洋舰	30 艘	6 艘
驱逐舰	80 艘	90 艘
护航舰	109 艘	66 艘
潜艇	325 艘	115 艘
总计	546 艘	291 艘

从船只的数量和对比的情况来看，威胁是严重的。当然，我们不能把一艘九万吨的美国航空母舰同一艘八百五十吨的苏联“小型战斗舰”相比。但是，苏联军舰中有一百三十五艘以上配置有导弹的巡逻艇，这的确具有极大的威胁。

比如，现在已超过十三年舰龄的苏联OSA级和科马尔级导弹巡逻艇，在战斗中卓有成效。埃及一艘八十吨的科马尔级舰艇于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击沉了以色列的二千五百吨驱逐舰依拿特号。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在印巴战争中，印度使用OSA艇袭击商船队，也非常成功。

苏制八百五十吨 NANUCHKA 级舰艇携带有舰对舰导弹。弹头重一千一百磅，比我们将来计划要造的舰对舰导弹重一倍。

（2）苏联在它们的军舰上部署了复杂的电子、遥控系统和攻击、防御武器系统。在他们所造的军火库里大约有二十多种反舰导弹以及各种型号的这类导弹。这类导弹可由飞机、水面舰只或潜行中的潜艇发射，射程可达十五浬至四百浬。

我个人认为，数年前我们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当时我们决定把所有的导弹力量都放在以海洋为基地的飞机上，而没有发展一种"超地平线"的船载舰对舰导弹。那时候，我们拥有二十三艘经过第二次大战考验的航空母舰。现在只有十四艘航空母舰，而苏制反舰导弹的力量又较强，我们采用首批"超地平线"的舰对舰导弹——"鱼叉"，就成了当务之急。

（3）苏联海军已经出海了。一九六二年，它还是近海防御的海军，到今天，我们发现苏联军舰环航于夏威夷，演习于加勒比海，并在靠近印度洋的战略性石油运输线附近活动。

（4）他们发展了战略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力量。新的D级潜艇携带有射程可达四千二百浬的 SS-N-8 导弹，它在阿拉斯加以西数百浬的海港中就能发射、击中我们这里的旧金山。

（5）同海军的这些发展相呼应，苏联在明年要部署四种新级别的洲际弹道导弹，弹头自一百五十万吨到两千五百万吨（梯恩梯），还将有一种新型的"逆火"式的远程轰炸机。

（6）此外，对美苏两国军火生产率的初步分析表明，除了少数品种外，苏联在所有军备生产中以二比一到十二比一的优势超过我们。

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地位，这些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现在更多地依赖于外国的原料和能源。和六年前相比，我们以小得多的海军力量去执行任务，而苏联人正在以比我们更快的速度建立一支庞大的海军。而且，我们还面临着国际政治经济的紧张局势。

为此，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一支强有力的美国海军。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愿意让美国海军变成二等角色的美国人。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美国《当今重要演说》半月刊　俞军译）

早就警告过你们了

——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次谈话

〔美〕《新闻周刊》编辑部

新闻周刊：越南事件后，美国有陷入新孤立主义的倾向吗？

施莱辛格：据我看，在越南事件后，人们的感情，是有点往那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同三十年代相比，今天的美国公众对国际事务仍然是非常关心的。而且，如果民意测验尚能说明问题的话，那末，公众还是象过去那样不允许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其他任何国家之下。此外，我以为我们应该承认：情况变化很快，如果美国人民一旦发现情况会严重影响他们的利益，正象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的那段时期一样，他们是不会反对使用军事力量的。

问：目前，美国人民是否深信他们的基本利益已经在越南和柬埔寨受到危害了呢？

答：不。我看目前他们并不相信情况确已如此。否则，我们在争取适量的拨款以资助两国政府时，就不会遇到这样一些困难了。

问：前几个月，你在一次早餐会上讲话指出，东南亚和我国的重大利益无关。既然如此，那我们何必还要在非军事的基点上操心呢？

答：我不能肯定我一字不差地说过那样的话。美国在东南

亚的基本利益，远远不如它在欧洲或中东的利益那么大。但是，我们却在东南亚替自己建立了许多属国。如果抛弃这些国家，特别是南越，那末，对全世界来说，是非常有害的事情。这样，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国的对外政策；而且我认为，美国替自己塑造的形象，最后也必然要遭到损害。

问：你是否也把印度洋包括在美国重大利益的范围之内呢？

答：世界上极大多数工业国家都依赖从波斯湾输出的石油。对波斯湾地区石油资源具有优势的地位，势必使全世界的政治形势大为改观。苏联已经并继续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建立主要的补给能力。虽然如此，但把脑袋埋进沙里的倾向是存在的，现在就有人在表演鸵鸟的动作嘛。苏联在索马里境内伯贝拉的设施不但蔚为奇观，而且有增无已。看来目前他们正在伯贝拉建造无人驾驶核轰炸机的补给设施。

毫无疑问，有人会异想天开地替苏联人炮制出种种的辩解。这些人会暗示说，这是给索马里人做榜样的经济示范工程；否则，他们也会说这是苏联人对当前美国无人驾驶核轰炸机研制活动的初步反应。但事实上，这正是某种美国尚未掌握的潜在武器系统的重装载能力。我想，情况是明摆着的：苏联人对永久驻守在印度洋西部并在那里拥有打击能力是郑重其事的。我们如果不是有所准备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同它针锋相对，那就是对实际情况视而不见了。

问：采取哪种反措施呢？

答：美国应该在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岛上拥有自己的补给能力。这样，一旦有需要，我们就能在该地区维持自己部队的给养了。

问：按照苏联建立的其他基地的规格来看，你对他们目前

在索马里的基地设施作何估价呢？

答：我认为它是很突出的。在某些方面，它跟苏联在埃及和叙利亚所建立的设施不相上下。

问：停止对土耳其军事援助的后果如何？

答：停止对土耳其的援助是个不同寻常的事件。人们能联想到的唯一类似的事件（虽然是很不恰当地），那便是一九五六年杜勒斯决定取消援助埃及兴建阿斯旺水坝了。在政治上来说，这是美国政府作出的一项富有戏剧性的决定。

问：从战略武器来看，有没有一个美国所不能退让的最低限度？

答：唔，我想如果我们把目前的数字削减到比如说三分之一吧，那我们就要开始操心了。

问：换句话说，就是把运载工具的数字从两千四百削减到一千六百了？

答：这个数字差不多。

问：你所建议的灵活核战略，已经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指责，说你所真正想到的无非就是第一次打击能力。那不会打乱目前的核均势吗？

答：我们在理论上的改变，并不需要美国扩充它的战略力量。由于我国的核威胁看来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了，而且也不需要引起两方的自杀，所以上述的变化提高了我国威慑态势的效力。因此，引起主要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减少了。美国并不希望任何一方拥有第一次打击能力；事实上，根据双方现有的力量，任何一方都是无法拥有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我们是从下述前提出发来设计美国的战略力量的：只要苏联人打算毁灭美国的城市和工业基地，美国是无法限制这个损害的。

问：但是你已经建议大力提高核武器的精确度和增加核武

器的产量了。这难道不会导致我国发展反击能力以对付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吗？

答：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过了：我们宁可任何一方都不发展主要的反击能力。我们理所当然地关切的是，苏联对大规模地重新部署有自动计算设备的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以及许多精确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它们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如果他们真的动手干的话，我们也准备跟上去。当然，我们宁可双方都不作这样的部署。

问：许多议员都赞扬你最近所作的国防报告。但是看情况，他们大约还会大刀阔斧地削减你提出的预算。这是不是五角大楼过多地叫嚷"狼来了"的缘故呢？

答：怎么说呢？过去也许有过一点叫嚷"狼来了"的倾向。但是我愿提醒各方面人士一句：一旦狼真的来了，被吃掉的可不会是那个没人理会的小羊倌，而是整个美国社会。关键在于：国会山直至整个社会，已经乐意于以比越南战争时期更为理智的态度，来对待美国的安全和国防能力方面的问题了。

问：换句话说，你是否认为我们所患的越南消化不良症的最糟时期已经过去了呢？

答：我想，我们全国性的消化不良症的最糟时期是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存在着某种要削减国防预算的倾向，但这并不是对国防有什么对立情绪。这大半是出于预算上的考虑；同时，也是从这样一种要求出发的：从国防方面多拿出一些资源来，以便有更多的资源用于社会计划或经济计划。

问：二十五年前当许多军事计划被削减时，前国防部长刘易斯·约翰逊所处的时代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是否又回到那个时代去了呢？

答：真是这样，从我国的武器同人力的比例以及同国民生

产总值的比例来看，我们不但已经回到了刘易斯·约翰逊时代，而且已经回到了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那个搞得一团糟的复员时期了。这同邱吉尔在《胜利与悲剧》中所说的，颇有相似之处："伟大的民主政治胜利了，而且又能干出几乎使自己丧命的那种蠢事来。"

问：你以为，你的话别人听得进去吗？

答：唔，我是挺乐观的。现实世界的政治既然如此，美国公众总有一天会承认它。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没有其他抉择，而唯有致力于向公众阐明我国和苏联之间必须维持军事均势。如果当前的倾向继续发展下去，那末，在今后的岁月里美国大半会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到了那个时候，肯定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早点向我们发出警告呢？"我希望在那时我能直截了当地说："早就警告过你们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美国《新闻周刊》　陈中绳译）

美国主张使用核武器对付苏联的进攻

〔美〕《纽约时报》

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不久前在向国会作的《欧洲战术核力量情况》的报告中说，苏联指挥的常规军事力量对西欧发起进攻时，可能迫使美国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避免失败。

施莱辛格说，必须作出努力保证核报复是预防性的，是为了减少把冲突发展成为全面核战争的危险。不管怎样，这种攻击应该是十分猛烈和有决定性的，以便强行改变华沙条约组织领导人的看法，并创造一种有助于谈判的局面。

在美国的核力量占优势的时代，美国的战略基础是，通过用核武器代替大规模常规军事力量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威慑政策。在一九六七年时，这种政策转变为一种"灵活反应"的政策，把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结合起来加以使用。这种转变是因为苏联现在的战略力量已同美国处于均势，因而必须更重视常规军事力量和战术核力量。

《报告》中说，西欧拥有七千个美国的核弹头，其中三分之二指定给盟国武装力量使用，三分之一供美军使用。所有这些核弹头在交给盟国使用前，都由美国控制。

美国国防部的很多分析家认为，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常规部队大致相等。在人员、坦克和飞机的数量上共产党部队占优势，在坦克和飞机的质量上西方国家部队占优势。

在谈到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时，施莱辛格说，使用这种武器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阻止华约组织用常规部队或核武器发动战争。虽然北约组织的常规部队被认为是能够对付华约组织的，但也有可能出现比那些设想的情况坏得多的局面，以致北约不能对付华约的进攻。因此，这样一种出乎意外的情况，就不可能排除北约首先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

即使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使用战术核武器，也有导致核战争升级的严重危险。因此，只有在常规战争遭到惨败的情况下，才会考虑这样做。例如北约丧失大量的土地或部队，北约的政府领袖们可能考虑愿冒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施莱辛格还说，目前华约组织的战略是适应进攻的，部队都受过核武器作战的训练。苏联显然认为，如果在欧洲发生战争，很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三十日美国《纽约时报》）

小 资 料

美苏军事力量对比

美苏军事力量对比：

	美　　国	苏　　联
武装部队	2,100,000	4,200,000
战术飞机	5,500	5,150
战略轰炸机	498	160
坦克	9,000	40,000
潜艇	115	325
航空母舰	15	1
大型水面舰艇	161	219
战略核导弹	1,710	2,310
战术核导弹	20,000	15,000

北约和华约在欧洲军事力量对比：

	武装部队	战术飞机	坦　克	战术核导弹
北　约	780,000	2,700	6,000	7,000
华　约	930,000	2,900	16,000	3,500

美苏在地中海的军事力量对比：

	武装部队	战术飞机	航空母舰	大型水面舰艇
美　国	31,000	180	2	40
苏　联	20,000	0	0	40

美苏在波斯湾军事力量对比：

	武装部队	大型水面舰艇
美国	500—600	3
苏联	600	0

美苏在印度洋军事力量对比：

	武装部队	大型水面舰艇
美国	0	0
苏联	2,000—3,000	20

美苏在远东军事力量对比：

	武装部队	战术飞机	航空母舰	大型水面舰艇
美国	190,000	240	3	45
苏联	600,000	1,100	0	55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美国《新闻周刊》）

战略上的适应性

〔美〕威廉·R·范·克利夫
罗杰·W·巴尼特①

核武器和远程运载系统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概念，并产生了两种战争概念。在传统的概念上又增添了一种新的概念，即关于"超级大国"之间远程核武器的决战，这种核决战逐渐成了现代战略问题讨论的中心。在这种概念里，就老百姓遭到大规模毁灭的可能性而言，"获胜"的概念似乎变得陈旧过时了。谁是胜利者，谁是被征服者，将无法区别出来，决不会有胜利者，而只会有失败者。

因此，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威慑逐渐被看作是唯一适当的军事目标了。似乎要使这种战争概念成为自行证实的预言那样，威慑战略发展起来了。这种战略的目的不在于获胜，而在于使人确信大家都将是失败者。武装部队首脑再也不可能走到他的政治领导面前宣称："先生，现在战争胜利了！"

在另一方面，如果"获胜"可作为"不失败"来解释，或者换一个讲法，它的意思是"达到一个目标"，获取相对的利益，或者改善战争的结局，那末，这个词似乎在本质上还是不坏的，不一定

---

① 克利夫是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防务和战略学科副教授兼指导教师，国防部及兰德公司顾问，《环球：世界事务杂志》编辑部成员。

巴尼特是美国海军中校，曾在联合参谋部担任有关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方面的工作，现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国际关系问题，主修国家安全学科。

是陈旧过时的——假定人们对谁取得胜利还是关心的话。在这个意义上，“获胜”就成为制订战略政策和国防计划的核心。

战略核战争的“成效”如以城市毁坏和几千万生命死亡来衡量的话，这种战争一旦打起来，“获胜”的一切定义都没有什么意思了。但确信，核战争采取这种交锋形式，就不能算作是一种战略，战略并不是谋求两败俱伤，而没有胜利者。

对美国发动战略核攻击的假设，肯定是构成美国战略政策的基石。对于这个无懈可击的原则是没有争议的。但事情显然还不止于此。威慑力量无论是威慑什么，还是在怎样完成威慑方面，都不是静止不变的。单是威慑力量也不构成为战略的全部。总之，战略的关键是适应性，同时，适应性也是美国核战略理论新近变化的关键。

战略适应性是假定：“战略已变为一种战争艺术，它旨在达到一些还算不上有关国家重大利益的目标（要是为了保卫这些利益，恐怕必须投入它的全部力量）；同时，要制订出对付一场意外的、规模不可改变的核攻击所必需的那些计划。”

一场新的争辩

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提出关于战略适应性的主张，国务卿基辛格发出要对战略进行全国性辩论的呼吁，随之而来的一场新的大辩论是必定要展开的，尽管少数的报纸文章和更少一些的比较学术性的论述大肆谴责和诋毁“施莱辛格的战略”，不过，即使没有大辩论，人们也会注意到知识界的激动以及对既定的战略和军备控制概念进行重新思考。诚如有两位学者在论述这次战略变化时所正确地指出的：由于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失望和苏联在会谈中的不妥协态度，由于苏联发展核武器计划的气

势，并由于苏联的战略理论和政策的其他表现形式而共同产生的“对苏联意图的普遍怀疑”，这就带来了“今天对美国战略核武器政策所依据的许多基本前提产生了广泛的和由来已久的不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我克制使得美国主要战略目标——反击力量的发展受到了约束。人们曾设想这将会诱使苏联人实行同样的自我克制。但是，现在必须认真地重新考虑这一点了，因为克里姆林宫方面缺乏相应的自我克制，它已拥有了战略能力，这样，作为我们计划中的一种反应的“确保摧毁”（或者说任何大规模打击的选择方案）就成了问题。换句话说，所以有必要重新考虑，主要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意愿，也不是由于我们的敏锐，而是由于我们主要对手的决心。“确保摧毁”的理论以及“相互确保摧毁”的观念，如果不是苏联的战略进攻能力坚定地增长，如果不是苏联对“确保摧毁”理论和“相互确保摧毁”观念的坚决拒绝，就不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理论和观念，从而，这种理论和观念也许还会继续是美国战略和军备控制的两项引人注目的东西。

但至今或多或少地还有人背诵“确保摧毁”的教条。今年年初，国防部长的声明还遭到那一学派惯常的猛烈抨击。不过一种新的创见即使尚有分歧，也已日益明确。这种创新精神应该在任何全国性的辩论中得到鼓励。

关于全国性战略问题的辩论，在诸如战略力量的计划和确定目标等方面受到了意气用事的影响，可能把问题搞混乱，而不是把问题搞清楚。一些可供选择的方案将会变得戏剧性的，如果以要么这样或要么那样的错误词句来进行表达的话，这些词句本身很少具有说明性或分析性，而是争论性的。这些不准确的词句往往被用作文字导弹来向对方发射，如对军备控制、稳定性、

军备竞赛、过多的核武器摧毁力、第一次打击能力等方面。

实际上，那些可供选择的方案以及施莱辛格声明所代表的修正方案都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很多方面，它们都只不过想把问题搞得更清楚些，使口头宣称的政策更加切合于在军事力量的取得、部署以及使用方面实际可行的政策。有人希望把可供选择的方案清楚地确定为“反击力量”和“确保摧毁”之间的选择，“作战能力”和“威慑力量”之间的选择，尽管这些都是不能对比的，过去不是，将来也不会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选择。任何现代战略力量，无论是对软的、硬的、或最硬的目标都具有某种内在的反击力量。任何使用这些力量的计划将必然包括一些军事目标。例如，或许要摧毁某些防御工事，才能进行其他攻击。任何力量要起威慑作用，就必然能用于实战。有谁能严肃地说，一种军事力量可以没有任何作战能力？

美国的战略进攻力量过去曾否以及现在是否有能力袭击敌人的军事目标，甚至是最坚固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这不是真正的争论点。这种能力，美国过去有，现在也确实有一些。问题在于这种能力是否充足。我们目前的能力，即使通过原来所制定的主要军事力量计划而得到大大地改善，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第一次打击能力，使得苏联以陆上为基地的战略部队丧失战斗能力，更不能提供象国防部长所解释的那种预防性的解除敌人武装的能力。因此，第一次打击能力的效果可能并未稳定，对于这一点是没有什么讳言的。

的确，“灵活性”本身很难成为争论点。正如施莱辛格所说的：“当你接触到确定目标的计划的选择性和灵活性这一根本难题时，真是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

因此，争论点不是在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上面，而是在多一些、还是少一些上面：灵活性多一些还是少一些；选择能力多一

些还是少一些；对于有限打击，对于克制，对于准确性，对于军事目标等等的计划是多强调一些，还是少强调一些。

确保摧毁论的起源

在整个六十年代，“确保摧毁论”由作为测验美国报复力量是否充足的主要尺度的一种分析性工具，发展成为研究国防问题的知识分子甚至官方计划人员中间的战略指导思想，又发展为军备控制和相互威慑的哲学。在先前不认真地对待战略灵活性、反击力量和限制损伤等观念之后，“确保摧毁论”成了迫切需要的理论，成了一种“衡量我国战略力量的需要和是否充足的观念性的条条框框”。

在战略上，“确保摧毁论”逐渐以假定的人口和民用工业毁灭的百分比作为衡量的依据：第一，因为战略轰炸同城市轰炸紧跟在一起。第二，因为在这个概念形成的年代里，作为当时战略力量特点的爆炸当量大和不准确性这两者合在一起，就不能进行有区别的攻击，以便至少在市内和市区附近的目标避免重大的连带的毁坏。第三，因为很多人认为，并且继续认为这种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至少是容易达到的，因此，如果双方以此为前提设计它们的战略力量的话，费用就可以降低，相互威慑就增加了，限制武器会谈也可达成协议了。第四，由于居民的伤亡和城市工业区的大规模毁灭在一定条件下似乎是便于计算的，因此，这就是一个良好的计算或衡量的方法。不过，战略轰炸和城市轰炸不必如此呆板地联系在一起。现在已能做到这样准确：有区别地进行攻击，而不造成对于居民的广泛的连带伤害。甚至在“确保摧毁论”盛行的年代里，战略力量也是为除了轰炸城市以外的目标和军事能力而设计的。再者，有很多证据足以表明

苏联一开头就反对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既没有使军备竞赛放慢，也没有使有意义的军备控制实现。恰恰相反，它也许已经激励苏联把战略设施搞到首先使它们有机会取得战略均势，然后有机会占据显著优势的地步。

“确保摧毁论”这个词表述得太简单、太肯定，容易使人误解。其实任何东西都不可能确保无虞的。

有鉴于“确保摧毁”的措词欠妥，有鉴于这个观念在战略的推理中所起的指导作用，有鉴于它在决定战略力量和估价限制战略武器的一揽子计划方面的重要指导意义，就很有必要反复指出，它基本上是一个分析性的测验工具，而不是一种战略。

我们知道始终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为了威慑苏联对美国的攻击，用城市和居民的大规模的毁灭相威胁是否必要？它对有限的威胁是否是一种有效的威慑？甚至在美国受到最极端的威胁时，它同对敌人的军事能力、自然资源和基本工业进行大规模袭击的威胁相比，是否具有更大的威慑性？

确保摧毁论过时了

从麦克纳马拉时代到现在这段时期的战略理论，是以“确保摧毁论”为正式依据的。但是所谓“充足原则”既没有明显地以居民伤亡数字来说明“确保摧毁”的标准，也没有把“确保摧毁”同“充足”等量齐观。根据一九六九年各个机构的共同研究结果，就对美国的直接威胁而言，战略上的所谓“充足”有四个标准：

保持充分的第二次打击能力以威慑对于我国战略力量的全面的突然袭击。

发生危机时，不要刺激苏联首先打击美国。

阻碍苏联获得在核战争中能够给美国城市和工业区造成比

美国给它所造成的更大的破坏能力。

防御小型进攻和偶然袭击造成的损害。

总的说来，以上这些标准(它们从来没有公开撤销过)明确宣告，单凭“确保摧毁”是不够的，“多少战略力量才算足够了”，这必须根据另外的考虑来判断。在一九七五年财政年度国防部报告上所作出的若干修改中，好象意味着有一套关于“充足”的新标准。

一九七四年三月，国防部长建议，在我们的战略地位上需要维持和改善的主要特点包括：

我们的能力要足够强大、多样化和有生存力，以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高度的信心，甚至能安然度过一次大规模的突然袭击，还能够深入敌人的防线，并且在长时间内拥有确保摧毁的后备力量。

我们全国所有的司令部，要有控制指挥能力，以一种有控制的、有选择的和有克制的方式指挥战略力量的使用。

有力量实行广泛的选择来对敌人可能的行动作出反应，其中包括对软的和硬的目标进行准确的打击的能力，同时使连带的损害减少到最低限度。

对进攻能力的规模和组成，要使人们都看到它同任何潜在敌人的战略力量保持总的平衡。

这个方案要求：

(1) 不仅要有确保摧毁的能力，而且要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这种能力作为后备。确保摧毁的力量成为最后的威慑性的威胁，它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把它当作主要采用的方案，而在于虽然不被使用，但能使敌人作出一定的克制。

(2) 要有广泛的可供使用的选择，使我们能够对于城市和非城市的目标、软的和硬的目标都能进行有控制的、有选择的、

克制的和准确的袭击，并减少连带的损害。

（3）既要在实际上，又要在表面上做到同任何敌人的战略力量保持“基本均势”。不过这并不要求力量的对称，也不要求一切敌对力量旗鼓相当，要求的倒是“总的平衡”。在这种平衡中，敌人的某些优势可以被美国在其他领域内的优势相抵销。

于是，问题就不仅仅是确保摧毁。“确保摧毁”作为一种分析性的工具，如果不使用过火，还是有用处的。作为一种力量的能力，它是有必要的——但不是足够的。建议作出的修正也不是完全抛弃它。但有两点区别：(1)修正的理论不是把“确保摧毁”作为我们主要的反应能力，也不让“确保摧毁”在其他抉择中占统治地位。现在我们要求有更多的、有计划的有限打击的选择方案，而把确保摧毁能力留作后备力量，其目的是阻止战争升级。这样的后备力量使其他抉择方案的有限打击的性质看得更清楚些。(2)我们可用同战争和它的后果有关的更大的政治、军事目标来判断确保摧毁能力是否充足，而不用居民伤亡和城市摧毁的状况来衡量。例如：1.削弱敌人发动战争和战后在国外施展影响的军事能力(或者，为了这个原故，削弱敌人保持国内控制和保卫它本国边境安全的军事能力)。2.摧毁那些同敌人受到袭击后恢复能力密切相关的部门。3.破坏政治控制机构。

为了就美国战略理论中哪些是要改变的，哪些是不需要改变的，以及改变的理由是什么，展开适当的讨论，最好确切地领会国防部长讲过的话。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秋季号美国《环球：世界事务杂志》 王涵清译）

欧洲的常规战争——苏联的观点

〔美〕小达拉斯·布朗

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在东西方紧张局势松弛的时候，再来重复谈论苏联的军事战略有什么用处？尽管存在着缓和，但苏联的领导人并没有排除在两个集团之间发生大战的可能性。这只要粗略地看一下他们的政策声明就可以明白。

苏联对于在一次新的欧洲冲突中出现常规战争的可能性的看法，是在西方的战略理论家中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基本的问题是，苏联是否认为核战争在欧洲两个集团发生冲突时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国家对于这一问题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那是因为双方都能在苏联的政策声明和军事文章中找到各自的论据。

苏联领袖们现在认为，如果欧洲发生冲突的话，引起核战争的机会已比过去减少了。苏联这一估计的基础是，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也许已被使用核武器所吓倒了。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在战略核武器上和美国达成了平衡，因而对威慑力量的信心也增强起来了。

战略的内容

在欧洲，缓和与威慑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标而双管齐下、相继使用的。目的之一便是要使美国的战略进攻部队撤离西欧的

防务。从苏联最近发表的文章的语气中，可以看出他们相信这种情况已经在开始出现了。苏联在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对北约组织核力量的分析中又重复了这一看法。

苏联的观点是，直到如今，他们的威慑政策都是成功的。当然，为了小心起见，苏联也要考虑到万一这种威慑遭到失败的情况。一场核战争，即使是限止在欧洲范围以内的，也将危及苏联国家的生存，使它的许多政治目标消失在核战争的废墟上。因此，非常明显的是，苏联希望使欧洲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能够降到最低的水平。

若干西方的战略理论家得出结论说，苏联反对在欧洲集团之间的战争中有任何限止的想法。我的这篇文章则是企图说明，那种认为苏联对常规战争和战术核战争不加区分的论点是错误的，因为苏联本身就对这两者是有所区分的。

那种认为苏联反对在欧洲有进行常规战争的可能性的论点，主要是基于下述两点因素：第一是苏联在欧洲的核战能力已经非常强大，而它对野战军又进行了某些限制。第二是现在绝大部分苏联的军事论文都在讨论核战争的问题。上述两点的准确性是无可怀疑的，但这里却忽略了事情的某些方面。苏联核武器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威慑，至于它对野战军的限制，则必须和北约组织在欧洲的兵力联系起来考虑。根据西方的估计，苏联在欧洲的常规战争的能力已经相等于或者大于北约组织的力量了。

历史的观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一直维持着一支庞大的常规部队威慑着西欧，以防美国对苏联进行核攻击。到五十年代末

期，它以实战的核体制代替了常规部队而作为主要的威慑。最后，在六十年代中期，以美国为目标的战略核体制在苏联的威慑政策中占了主要的地位。这时候，苏联已经不象过去那样对美国的核优势感到拘束了。在一九六四年，苏联已经部署了三百个洲际弹道导弹和从海上发射的弹道导弹了。

斯大林后期（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三年） 战争刚结束时可以看到的，几乎是完全依靠常规力量的大陆性方针。斯大林要他的战略理论家们集中研究他的有关“在战争中永久起作用的因素”的原理。这些因素便是后方的安定、军事力量的质和量、指挥员的供应和能力。这个理论排除了突然袭击和核武器在未来的战争中作为重要的因素。

从斯大林的这一理论中得出的结论是，欧洲发生的新的战争基本上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苏联在东欧的常规部队进行了改组，并在装备和训练上获得了优先权。

中间时期（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 在这一转变性的时期里，斯大林的理论大部分被放弃了。一般的感觉是，新的战争将是核武器的战争。苏联开始对西欧部署实战性的核武器。但是，主要的角色还是保留给地面部队。新的欧洲战争仍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不过将有核武器来作为辅助手段罢了。战争可能是以互相使用核武器开始，但它将拖延下去，而最后仍将以大量的地面军种来决定胜负。

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的基本战略观点是，北约和华约集团之间的战争将很快地转变成世界大战和核战争，在这样的冲突中，核武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从这种核武器第一的基本观点中得出结论，认为某些常规力量已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想对它进行削减，而把腾出来的资源用于制造核武器或其他目的。这种削减曾引起了某些高级军事人员的抵制。一

九六一年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向党中央作军事报告时说："尽管核武器在未来的战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要在一次反对入侵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只有依靠所有军种的联合行动。因此，我们正对各种武器的完善化给予应有的注意。"

索科洛夫斯基在《战略》中也同样强调了这些论点。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这种强调核力量和常规力量之间的平衡的论点，也就成了苏联军事政策的基本原则，至今还起着作用。

赫鲁晓夫下台后的时期（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四年） 由于核平衡的转变而使马利诺夫斯基的观点获得了信誉。六十年代中期，美国越来越强调在常规方面的"灵活反应"。这在苏联看来是一种明显的信号，说明苏联的威慑势态越来越有效了。下面的事实又进一步增强了它们的信心：在六十年代的末期和美国大致上达成了战略核武器的平衡，一九七二年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

一九六五年时，我所指出的这种变化正在进行之中。看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可能已被使用核武器所吓倒，苏联又开始严肃地考虑到在欧洲进行常规战争的问题。从下列各方面的材料中，可以获得支持我这一命题的证据，这里面包括苏联的政策声明、军事论文、军事演习和武装力量的数字。

政策声明

自从赫鲁晓夫时代终结之后，在苏联高级官员的发言和文章中出现了显著的转变：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得到了确认，而核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却往往被忽略或是被小心地掩盖起来了。

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不久，苏联地面部队的一个高级官员

契曼柯将军提出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他写道："美国已经失去了对核武器的垄断和优势。"据他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会采取更软弱的军事原则的道理。

苏联共产党领袖、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于一九六五年宣称："我们一方面对核导弹武器加以特别注意，另一方面也没有忘记常规武器仍具有很大的作用。我们的军队继续获得最新的坦克、飞机、大炮以及其他装备的供应。"

一九六九年，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宣称："战争的开始可能是使用核武器或使用常规武器。敌人可能有种种想法来综合利用各种武器。"接着他强调了平衡的问题，并说明苏联军队对各个军种都提供了"最新的战斗手段"。

一九七四年，这位国防部长在指出"武装部队的决定性的军种是战略火箭部队"之后，又提到了平衡的问题。他说："地面部队、防空部队、空军以及海军的战斗力已大大地增强了。"

由于这些都是地位很高的人物的发言，因此必须考虑到它们的权威性。特别是格列奇科的声明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是现任的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

军事论文

苏联近年来发表了许多军事方面的文章。其中很多是从各个方面来讨论核战争的。可是，在过去的十年里，苏联的理论家们对常规战争的问题已越来越注意了。

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战略》杂志和较早出版的两卷《战略》中，主要刊载了论述全面战争问题的文章，同时也对西方有关在欧洲打一场有限战争的思想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作者们引用了西方的说法，并指出了它的利害关系，最后加上了简明的评语：

"各种限制都隐藏着向全面核战争升级的严重危险，特别是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场合"。

这并不是说这些作者反对常规战争；而是他们害怕两个集团之间的任何武装冲突都会引起全面战争。换句话说，他们的希望似乎是这样一种序列：最好是"和平共处"，其次是常规战争、有限的核战争，如果这些都无法实现，最后才是全面战争。

一九六九年，苏联出版了一本研究当代战争的文集，题为《军事理论和实践的方法问题》，作者都是高级军官，也是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的优秀成员。他们的论点都确认了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只是不能确定这种战争可以维持多久。他们还讨论了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常规武器的作用和任务问题，例如，对大炮和装甲车的作用都有所提高。

总之，这些作者都认为常规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即使在核战争中，常规部队也是需要的。

苏联的很多文章几乎都是讨论核武器问题的，但即使在这些文章里，也小心地说明了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例如，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进攻》一书，曾经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注意。这是一本全面阐述在核武器条件下进行攻击战的著作，但在结论中还是这样说："在某些情况下，还是要进行各种不同的战斗行动……不是使用核武器，而是只使用武器中的'典型'的手段——大炮、坦克、小武器，等等。"

苏联这些有关常规战争的文章的论点是很坚定的，而且是跟这一问题有关的政策声明有所联系和一起发展的。这些声明和文章的本身就很好地说明了苏联对在欧洲进行常规战争的兴趣越来越大，而另外还有一些征象比这些声明和文章更能说明问题。

军事演习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和华沙条约国进行的各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反映了他们日益强调常规战争的情况。尽管不能从苏联方面获得详细的情报，但西方国家提供的数字已经足够说明这种现有的趋势。

一九六五年，华沙条约国进行的“十月风暴”演习，在方案中规定的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的常规进攻和华约国家的常规防御和反击（持续了将近三天）。双方也曾使用了核武器。

一九六七年的两次华约国家演习，应用了一九六五年方案中在北约国家尚未使用核武器之前的常规战争的行动。“第聂伯”演习是一次由苏联单独进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它自始至终是常规性的，目的是要测验一下苏联新近改组的地面部队的进攻能力。演习中包括以空降部队和渡河作战突入五百公里的行动。

一九七〇年的“特维娜”是苏联的一次大规模演习，目的是要测验苏联野战部队的能力，动员步骤和空降活动是其中主要的项目，这里面同时包括了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战斗。华约国一次代号为“武器的兄弟关系”的军事演习可能全部都是常规性的。“盾牌-72”演习则是对北约国的入侵进行了防御和反击，它包括了核战争和常规战争。

自从一九六五年以来，苏联和其他华约国家一直在进行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条件下的军事演习。我们不能证明这些演习方案全部反映了苏联对战时可能发生的情况的想法。演习只是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排练而已。可是，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事实是，至少从六十年代的中期起，苏联就一直在训练它在东欧

的野战部队来应付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了。

军事力量的显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在东欧保持着庞大的野战军力。若干年来，它们主要是作为对北约国家的威慑力量来使用的，但它们的作战能力，不论是在核战争或常规战争方面，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苏联的野战核体制包括导弹、飞机和战术火箭。总计起来，地面部队大约拥有一百六十个师，其中的半数只要经过短时期的动员就可以用来对付北约组织。有将近二十七个师是驻扎在东欧的。这些师都保持着高度的作战准备，并可以从苏联国内获得最快的增援。地面部队能得到苏联战术空军的支持。大约有三千六百架战斗飞机分配给战斗部队，可以担任防空、地勤和侦察的任务。战术飞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配置在东欧的。苏联海军准备从各方面来支持地区的战役，包括封锁海上的交通线。苏联的地区部队还有其他华约国家武装部队的增援。

苏联正在进行使野战部队现代化的计划，其中包括一些主要是用于常规战争的某几种装备，例如，由地面支持的飞机、装甲的战斗车辆以及攻击用直升飞机。

苏联在东欧的野战部队也受到了某些限制，因而使它们在常规战争中遭到困难，例如在后勤以及常规火力方面就有这种情形。最近的六、七年来，苏联已经对这些缺陷进行了改善。驻在东德的苏联军队已经增加了大约一千五百辆坦克。各师的大炮数量增加了将近一倍。战术空军部队更加强调了对地面部队进行空中支持。对飞机和地面支援设施的保护也已增强。常规武器的储备已有所增加。为了改善东欧的后勤体制，也增强了机动

运输的能力。这些措施都为苏联正在准备在欧洲进行常规战争提供了证据。

如果欧洲发生战争，苏联希望把它保持在常规战争的水平。他们害怕任何方式使用核武器都将使战争升级为全面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就是如此。苏联在六十年代中期取得了可靠的战略核威慑力量之前，曾设想一次新的欧洲战争将“不可避免地”升级到使用核武器。苏联的推论是，北约组织为了避免失败，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想法，苏联就使用了他们的野战部队和政策声明来威慑北约组织不要对苏联使用武力。

苏联至今不能断定常规战争可以持续多久，因为他们不能肯定北约组织不会在某一时机使用核武器来避免自己的失败——“交战国经常处于核打击的威慑之下”。因此，苏联可能会在他们的野战军中继续强调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平衡。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北约组织不使用核武器，苏联也将使用常规武器来进行战斗，至少直到北约的中央军团打到涅曼河边、也就是苏联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的时候为止。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第二期美国《军事评论》　戴容译）

人 物 志

施莱辛格

詹姆斯·罗德尼·施莱辛格，是尼克松信赖并能够交给各种各样最高级任务的一位"通材"，一九七三年七月二日就任国防部长。他是由于水门事件的余波，接替埃利奥特·L·理查森而进入五角大楼的。施莱辛格从一九七三年二月起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在此之前，做过十八个月左右的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莱辛格把他的特长带到了五角大楼，是具有有利条件的，因为他长期关心国防经济学。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和海军学院当过教员，在兰德公司当过分析研究员，并且在一九六〇年写过《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又当过预算署（后来改名为行政管理和预算署）的副署长；这些职务都显示出他在国防经济学方面的专长。正当美国结束在印度支那长期军事卷入而需要对国防体制优先重新考虑的时候，他进入五角大楼担任了负责人。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施莱辛格生于纽约市。一九四六年，他在高中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一九五〇年以优异成绩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一笔两千四百美元的学业优良奖学金，使他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年中能到西欧和亚非各地去旅行。后来，他在回忆这段靠奖学金旅游的情况时说："我认识到的世界是一个很复杂的场所，而狭隘的经济学训练却造成人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狭隘的见识。"

后来，施莱辛格决定重新回到哈佛继续研究经济学。一九五二年获得硕士学位，一九五六年获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一九五

五年他在弗吉尼亚大学担任经济学助理教授。两年以后，他获准离职六个月到罗得岛新港的海军学院当学术顾问，并在那里作了一系列讲演，一九五八年在回到弗吉尼亚大学以后，他被提升为副教授。他执教于弗吉尼亚大学的同时，还兼任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的顾问。

施莱辛格在海军学院的一系列讲演，已收进一九六〇年出版的《国家安全的政治经济学——对现代实力斗争的经济方面的研究》一书中。K·H·海曼森说："它所根据的论点是：东西方分裂将长期不能解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地位。"古斯塔夫·拉尼斯评论这本书时写道，施莱辛格"揭露我们某些陈词滥调的尝试，是这本书中最有价值和使人耳目一新的特点之一"。

施莱辛格的这本书受到兰德公司最著名的私营"智囊坦克"的高级人员的重视。一九六三年，据说施莱辛格在拒绝担任几家银行副行长之后，接受兰德公司的聘请，担任设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蒙尼加的该公司总部的一名高级职员。到一九六七年时，他已是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主任。他的专长是战略分析，着重于核武器的战略分析。他还担任一项关于核扩散科研项目的主任。除了兰德公司的职务外，施莱辛格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九年还担任联邦预算署的顾问。

一九六九年二月，在尼克松政府上台后不久，施莱辛格就离开了兰德公司到华盛顿，接受预算署副署长的任命。一九七〇年，行政管理和预算署成立时，他担任了新署的助理署长。施莱辛格还是预算署参加总统直辖的环境改善委员会的代表，因此，他负责为尼克松政府制订能源政策，对诸如空气和水污染等问题给以特别重视。

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尼克松提名施莱辛格继格林·

T·西博格博士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

一九七一年八月十七日，施莱辛格宣誓就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不久，他就卷入一场预定于十一月六日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姆奇特岛上进行一次核试验的争论。这次以"小罐"为代号的试验，即用民兵反弹道导弹系统的五百万吨级弹头的试验，遭到了环境保护派和反战运动团体的反对。施莱辛格为了显示他确信这场爆炸试验不会危及环境，曾携带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到阿姆奇特岛上目睹这场爆炸。

据报道，在亨利·基辛格的建议下，尼克松总统于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提名施莱辛格接替已被任命为驻伊朗大使的理查德·赫尔姆斯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观察家们再次把这一任命看作是试图精简庞大的、对公众需要的反应是迟钝的官僚机构，使之效率更高。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参议院一致批准这一提名，施莱辛格于二月二日宣誓就职，并立即开始执行他早些时候在行政管理和预算署任职时就提出的建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情报局作为一个战略情报机构以来，在局内到处弥漫的"绅士俱乐部"的气氛被转变成一个更为有条不紊的环境。这一机构的秘密的"间谍特务"活动不被重视了，而把更大的重点放在系统的战略情报收集和分析上。作为中央情报局的首脑，施莱辛格还担任情报来源谘询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他对国家安全机构和五角大楼的国防情报机构也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些机构过去曾同中央情报局发生过冲突。施莱辛格在担任中央情报局首脑期间的一个活动是，对该局的国家情报判断处进行大改组，该处对主要危机地区的发展情况作出秘密报告，但它的分析并不总是同总统的观点相一致的。

虽然施莱辛格没有卷进水门事件，但这事件同他的升迁有直接关连，因这事件使他被提名为国防部长。一九七三年五月十

日施莱辛格受命接替埃里奥特·理查森在五角大楼的职务，后者接替理查德·G·克兰丁斯特任司法部长。弗雷德·L·齐默尔曼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一日的《华尔街日报》上评论此事说，尼克松"与其说是试图引用新人，不如说是表示特别喜欢让经验丰富的老手掉换职位"。

施莱辛格在参议院批准提名的听证会上，作为一名保守派人士出现，为过去的国防部政策辩护，并对削减国防预算表示慎重。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詹姆斯·R·迪肯森在《国民观察家》杂志上写道："那些认识施莱辛格的人说，他渴望国防部最高职位已有好多时候了。"迪肯森称施莱辛格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也"决不会让意识形态妨害他探求合理的解决办法"。

经参议院一致批准后，施莱辛格于一九七三年七月二日宣誓就任国防部长。他在任职的头几个星期里的几次公开声明中，把对柬埔寨的战术轰炸辩解为实现停火的一种手段，他声称一九六九和一九七〇年对柬埔寨进行的几次秘密入侵，对保护美国兵是必要的。他直率地反对大赦逃避征兵的人，否认那种说美国计划在欧洲单方面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中撤军的谣传。他在八月十八日的记者招待会上透露，苏联已成功地试验了两枚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并指出因此这种武器的控制已变得更加困难了。他宣布："当苏联弥合了技术差距时，美国不能容忍苏联不久后占有数量上或质量上的优势。"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十月号美国《现代传记》杂志　伍贻康译）

苏联民族问题

“民族一体化”就是法西斯化

铁　钧

一九六一年，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二大鼓吹，苏联“各民族将进一步相互接近，将做到完全合成一体”。事隔十一年，到了一九七二年，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四大宣称，“民族一体化”的任务已告完成，“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民族——苏维埃民族——在我们国家里兴起了”。正当叛徒们为此而频频举杯、交相庆贺的时候，一桩又一桩的民族问题方面的“麻烦事”，却在苏联各地不断发生。这里选译的几篇文章，粗略地提供了苏修“民族一体化”的概貌：列宁、斯大林时期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方针被否定了，民族文化在消灭，民族语言被扼杀，民族领导人被清洗，反抗者被镇压、流放，苏联各民族广大劳动人民陷入了深重的苦难之中。为了摆脱苏修强加的民族压迫的枷锁，苏联各族人民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斗争的新浪潮。这一切，正是苏修“民族一体化”过程的真实写照。

十九世纪俄国有一个文学家曾经说过：“我国政府不喜欢纯粹的民族，它总想尽量把这些民族混杂在一起。被分解了的民族，通常是比较驯服的。混血的种族，在统治者的胃里，可以比较容易消化掉，因为混血里较少使你刺痛的东西。”这是对老沙皇的“民族同化”政策的辛辣鞭挞，把它移用到新沙皇身上，倒也是十分合适的。今日的苏联，危机四伏，楚歌四起，人民愈来愈

不满新沙皇的反动统治，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为了摆脱这一困境，新沙皇承袭了老沙皇的衣钵，乞灵于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大搞“民族一体化”，妄图转移劳动人民的视线，掩盖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一〇页）新沙皇大搞“民族一体化”，是为了俄罗斯族人民的利益吗？否！新沙皇对少数民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压迫，也是为了加紧对俄罗斯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民族斗争的激化也就是阶级斗争的激化。

苏修在国内大搞“民族一体化”也是为它争夺世界霸权服务的。新沙皇“泛斯拉夫帝国”的迷梦，做得比老沙皇更大，它不仅妄想把苏联各民族“一体化”，而且妄想把全世界各民族“一体化”。今天苏修的一些“大家庭”国家，不就是在所谓“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被苏修控制了经济、政治命脉，沦为苏修的附庸了吗？！

当然，这并不是新沙皇的新创造。老沙皇这样干过，希特勒也是这样干的。当年，希特勒为了建立他所谓的“日耳曼大帝国”，用尽了一切野蛮手段，狂叫要彻底消灭犹太民族和斯拉夫民族，铲除他们的文化。今天新沙皇的所作所为，同当年的希特勒又何其相似！老沙皇、希特勒的幽灵又在俄罗斯大地上游荡，俄国再次沦落为**“各族人民的监狱”**。所谓“民族一体化”，就是法西斯化。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民族问题总是要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认为，民族融合、民族消亡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又认为，首先是阶级消亡，随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才是民族消亡。列宁指出：**“人类只有经过一切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才能达到各民族的必然融合。”**（《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

一四一页）今天的苏联已经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所谓“民族一体化”，同马克思主义讲的阶级彻底消灭之后实现的民族融合、民族消亡完全是南辕而北辙。新沙皇妄图用所谓“民族一体化”来掩盖自己在国内推行法西斯化的狰狞面貌，只能是白费心机。今日的苏联，到处都燃起了各族人民反抗新沙皇压迫的斗争烈火。必须指出，这里摘译的一些文章是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写的，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今日苏联的民族矛盾，因而往往把眼光只停留在苏联国内少数民族的一些知识分子身上，而对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则基本上没有反映。这就很不够了。当然，这同苏修当局严密的新闻封锁也大有关系。但是，就从这一侧面来看，苏联今日阶级矛盾的深化也可窥见一斑。以勃列日涅夫为头子的苏修叛徒集团已坐在火山口上，沸腾的岩浆总有一天会喷薄而出，将他们烧得一干二净。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第六三四页）

苏联的民族政策和乌克兰的反抗

〔加〕博丹·R·博丘尔基夫①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勃列日涅夫在纪念苏维埃联盟成立五十周年而发表的演说中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肯定无疑地和无可改变地解决了”。他接着重复说明了党的新论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民族——苏维埃民族——在多民族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兴起了”。勃列日涅夫还声称，这个“一体化过程”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和“进步的发展”。他还警告说：“党认为任何要阻止民族相互接近这一过程，用种种借口阻挠这一过程，或人为地推动民族分离的企图，都是不允许的，因为这将偏离我们社会发展的总方向……”

在乌克兰这个最大的非俄罗斯族的共和国里，就在这个重要的纪念年里，却发生了大规模的逮捕知识分子事件，为的是，他们唱了同勃列日涅夫先生不同的调子：即党在事实上没有能解决民族问题；苏联领导人背叛了列宁的民族政策的国际主义原则，继续执行着荒唐可笑的、行不通的歧视政策，排挤非俄罗斯族的语言和文化；这个政策完全不能导致一体化，事实上反而加深了俄罗斯和非俄罗斯人民之间的仇恨，并且是在破坏着苏维埃制度的真正基础。由于一九七二年五月乌克兰的党组织撤

① 作者是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

销了彼得·谢列斯特的领导，说他“对这个共和国的地方主义和民族偏见的表现采取了没有原则的讨好态度……”，乌克兰局势的严重性进一步地突出了。

很清楚，勃列日涅夫声称已完全成功地解决了复杂的苏联民族问题，实在是说得过早了。从对乌克兰近来发生的骚动的考察，我们认为，足以证明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正在苏联各民族中上升着。不仅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当中是如此，而且在共和国的党政领导人物当中也是如此。过早地宣布一个苏维埃“超民族”的诞生，似乎是为了要为五十年代末开始的在苏联教育和出版方面恢复大规模俄罗斯化的运动说明它的合理性，也是为了要猛烈攻击那些捍卫非俄罗斯民族在语言、文化和宪法上的权利的人而发出的信号。

乌克兰的反抗

乌克兰可能是斯大林逝世以后最普遍和最响亮地反对当局的同化政策的地方。乌克兰的反抗基本上是通过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组织秘密的阴谋集团，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不同政见，在官方的乌克兰党政上层集团内组成制造舆论和影响决策的团体。

第一方面是一种继承过去民族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集团搞阴谋的传统的地下暗流，这些人大多以乌克兰西部为根据地。有两个这样的组织是在一九六〇年成立的：“乌克兰工农联盟”和“乌克兰民族委员会”。它们鼓吹乌克兰根据宪法第十七条而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和平脱离出来。另一个类似的组织“乌克兰民族阵线”成立于一九六四年，它鼓吹要成立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在这些集团被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发现以后，

它们的成员遭到了秘密审讯，并被判处苏联刑法中最重的刑罚。

第二种抗议是知识分子公开发表不同政见。他们声称自己是忠于苏联宪法和遵守法律规定。就这一点来说，这个思潮是“正统的”。这个思潮主要集中在基辅和利沃夫，以通称为“六十年代人物”的那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松散集团为先锋。这些作家、文学批评家、艺术家、记者和学者，开始时是对文学表示关心。到了六十年代初，就转变为愈来愈多地站出来为乌克兰语言、文化和教育进行辩护，反对俄罗斯化的升级。这些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私人组织的讨论会，加上散发请愿书和地下刊物，有力地表达了乌克兰人的利益，使人们知道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动员了广大的乌克兰群众来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一再向乌克兰的党政领导人作出呼吁，要捍卫宪法保障的民族权利，要反对莫斯科的侵蚀。

第三种持不同政见者结构最松散，包括官方的共和国党政上层集团内的一些乌克兰成员。这种人的反抗不仅表现为经济“地方主义”（把共和国的利益置于全苏经济的利益之上），而且，从乌克兰的利益出发，还试图影响文化和教育政策，或者至少使之有所修改或者使之不得实现。这个“乌克兰派”看来终于是结合在彼得·谢列斯特的周围了。谢列斯特从一九五七年起就是基辅州党组织的头头，一九六三年升任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在知识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谢列斯特的“内圈人物”（据说也包括几个知识界的持不同政见者，其中最突出的是文学批评家伊凡·久巴）之间发展了某种联系。长期以来就有谣传说谢列斯特保护和支持一些主要的知识界持不同政见者，为他们反复受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苏活动”或跟国外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有“联系”的指责进行辩护。或许是在这个“内圈”的某些成员鼓励和帮助下，谢列斯特写出了他的那本后来受到谴责的书：

《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这是一本广泛流传、受人欢迎和浸透了强烈的苏维埃乌克兰爱国主义意识的书。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四年秋天的下台增加了乌克兰要修改民族政策的希望。的确，有一段时间新领导似乎又重新主张要维护共和国的自治权和恢复非斯大林化所取得的某些成果了。在基辅和一些别的城市里，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公开集会要求不应对乌克兰语言和文化抱歧视的态度。根据持不同政见者的说法，基辅政府当时正在作出计划在高等学校的很多已俄罗斯化了的领域里恢复乌克兰语的课程。

一九六五年夏季的末尾，由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发生了突然转变，离开了"非斯大林化"，走上了加强思想控制、中央集权化和加速同化的道路，乌克兰这种乐观的情绪遭到了莫大的打击。这个政策转变说明在苏维埃制度的顶端，势力平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看来，一个新的强大的势力集团已积聚在勃列日涅夫的周围：它包括那些对年青人的"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下降感到惊慌的保守的军事利益集团，担心党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逐渐减弱的宣传机关，以及一贯夸大知识分子的不同政见和少数民族的离心倾向并以此获取既得利益的克格勃。

久巴的抗议

一九六五年八月末和九月，克格勃在乌克兰逮捕了几十名知识分子；最后有二十名持不同政见者受到审讯（多数是秘密审判的），其中有十六人以所谓"反苏宣传"被判处长达六年的徒刑。这种对持不同政见者杀一儆百的恐怖做法并没有能吓倒乌克兰的知识分子，反应是举行示威游行和向党政机关大量投寄

抗议信。最有名的抗议书出于伊凡·久巴之笔。他自己就是一名重要的持不同政见者，据说多亏谢列斯特的干预，他才免于被捕。久巴得到乌克兰党的领导人的鼓励，用书面陈述他的意见之后，给谢列斯特和苏维埃乌克兰总理谢尔比茨基一份很长的文件，这个文件后来在乌克兰党的主席团其他成员中和乌克兰的所有州委书记中间传阅开了。题为《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的这个文件，看来是苏联从未有过的对苏联民族政策最透彻的分析。久巴指责斯大林歪曲列宁主义的原则，尖锐地批评苏联领导人继续执行着的俄罗斯化路线，推行或至少并不反对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从而使乌克兰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成员和现制度疏远。久巴声称，由于这样的反列宁主义的政策，乌克兰民族正在经历着一个威胁它自己生存的重大危机：

> "乌克兰人由于以下几个原因，正在逐渐地和愈来愈多地失去他们在地区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乌克兰人被大批送往西伯利亚、北方和其他地区……；组织大批俄罗斯人向乌克兰移居，而这样做并不总是为了经济上的原因；形式上有行政区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几乎无权在乌克兰土地上行使主权。最后这一原因，加上过分的中央集权和一切从属于莫斯科的全苏当局的做法，使得乌克兰民族的经济生活的完整性和主权同样无从谈起。共同历史命运的意识也在消失中，因为乌克兰人正在不断地被分散到苏联各地，而且学校中和社会上完全缺乏有关民族的教育，人们对于民族传统的意识以及有关过去的历史知识正在逐渐消失。乌克兰民族文化被置于地方文化的地位，实际上被当作"次等"货看待；……乌克兰语言变得不重要了，在乌克兰的城市里，实际上已不用了。"

久巴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公众知道，在"使各民族相互接近"

的掩盖下，他们在被俄罗斯民族所“吸收”。这个单一的“苏维埃民族”的理论，不管人们如何加以阐述，只不过是为普遍的俄罗斯化过程提供一个“理论依据”。久巴的文件在结束时，呼吁苏维埃乌克兰政府采取行动，以捍卫和促进民族的利益。

意味深长的是，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业得到加拿大共产党的支持。一九六七年由于加拿大共产党的乌克兰成员（人们知道他们和谢列斯特有过联系）的推动，加拿大共产党派了一个高级代表团到乌克兰去考察“乌克兰共产党和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和经验”。代表团在一九六七年初发表了报告，对那个政府来说并非是表扬性的。它批评政府对乌克兰作家和其他人的秘密审讯是“违反社会主义民主和剥夺了人民的公民权”，并注意到“某些地方倾向于把在公立学校中更多地使用乌克兰语言的要求说成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偏差”。

镇压的加剧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事情更明显了：一九六五年的逮捕反而促使乌克兰的情况更加恶化。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继续在增加，并且和俄国的民权运动之间有了更加密切的合作和团结关系。地下刊物在质和量方面都有了发展，从一九七〇年开始还出现了一本作为乌克兰抗议运动的喉舌的秘密期刊：《乌克兰先驱》。持不同政见者和当局之间的对抗在苏联的国内外都广泛传开了。

莫斯科对乌克兰事态演变愈来愈感到惊慌，反应在一九七〇年七月乌克兰共和国秘密警察首脑、谢列斯特的朋友尼基坚科的被撤换。新的克格勃头子费多尔丘克显然是没有同谢列斯特商量而被任命的。他负有压制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任

务，并非常可能还负有“暴露”这位乌克兰党首脑的政治“错误”的任务。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对乌克兰历史学家瓦连京·莫罗兹（他对苏联乌克兰政策批评得最激烈）的秘密审讯，为这个新的更加严峻的对付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的路线发出了信号。他被严厉地判处了十四年监禁和流放。一九七一年，克格勃又加强了它对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的威胁、孤立和渗透活动，特别是想控制住他们同西方联系的渠道。

到了一九七一年十二月，政治局显然决定，要对以一切形式表现的持不同政见者发动全面的进攻。在接着的一个月里，克格勃大批逮捕了乌克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和其他嫌疑分子，借口他们跟国外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他们的帝国主义主子”有勾结。为了“证实”这些指控，警察拿出了一个已招供的、从国外的民族主义组织派来同某些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建立联系的密使——一桩显示出克格勃似乎也是以反对谢列斯特和他的“乌克兰派”为挑衅目的的案件。一九七二年四月，逮捕了苏联民族政策最著名的批评者伊凡·久巴。谢列斯特继续要袒护久巴的努力显然已不起作用了；不出一个月，他自己也就被解除了乌克兰党的首脑的职位。

整个一九七二和一九七三年，搜查、盘问、逮捕和秘密审讯继续在乌克兰进行着，卷入了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多达两百五十个人。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初步盘问时就垮了下来，以丢脸的“招供”和对别人的揭发来换取他们的释放。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大约有四十名持不同政见者在事实上是秘密审讯中被判处极为严厉的徒刑，最重的监禁十五年，送进劳改营或流放。文学批评家伊凡·斯维特雷奇内和记者维阿切斯拉夫·乔尔诺维尔都被判处十二年徒刑，患了严重肺病的伊凡·久巴被判处五年监禁。至少有两名持不同政见者包括一位基辅数学家列昂尼德·

普雷乌希被无限期地拘留在专门的精神病者的监房里。被捕的知识分子被审讯和判决以后，克格勃继续对他们施加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压力，逼使他们写出“供状”和“悔改书”。一九七三年的秋天，伊凡·久巴在基辅监狱经过了一年半这样的待遇之后，终于被迫在一篇调子悲哀的“供词”中否定了他自己过去对苏联乌克兰民族政策的批评意见。

在进行逮捕的同时，还在作家协会、艺术家协会、乌克兰科学院、各大学和编辑委员会中彻底清洗了一切同情持不同政见者的嫌疑分子。还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发动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以“苏维埃爱国主义”的精神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要他们同“敌对的意识形态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并特别指出了“乌克兰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在谢列斯特下台以后，愈来愈多的“谢列斯特的人”从重要的党政职位上被撤换了下来，其中包括乌克兰党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奥夫恰连科、几个党委书记、文化和高等教育部部长和其他许多政府官员。象接替谢列斯特任第一书记的谢尔比茨基一样，很多新提升的官员过去都和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一派有联系；他们很快就投入了扑灭乌克兰共和国的“谢列斯特主义”的运动。一九七三年春天，《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的一篇未署名的书评谴责以前被高度赞扬过的谢列斯特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揭示了这场运动的开始。

长期的影响

这一系列的逮捕和清洗，对乌克兰公众的影响如何？目前还很难作出估价。毫无疑问，当局已成功地抓走了持不同政见运动中的最能说会道的发言人，也已禁止了它的刊物《乌克兰先

驱》的发行（一九七二年三月被禁）。镇压的范围和严厉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的事件。在目前的舆论情况下，最近的逮捕和清洗将使乌克兰人同俄罗斯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将使更多人增强对现制度的怨恨和不满。这些事态的发展肯定将使对苏联法治所剩无几的信心丧失殆尽，这种信心在过去十年中曾推动过很多次公开的民权运动。从现在起，持不同政见者将愈来愈多地通过搞阴谋的办法来表达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目标和方法必将变得更加激进。

克里姆林宫目前这种强调要在"一个苏维埃民族"的熔炉中加速熔化非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政策，只能加深乌克兰的上层分子跟莫斯科疏远的情绪。

在未来的岁月中，远非解决了的民族问题可能会成为苏联国内政治中一个更加具有爆炸性的问题，成为苏联制度内部更不稳定的一个根源。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中，在继续执行目前这种否认这个问题存在的政策的情况下，愈是采用暴力手段来镇压少数民族中的持不同政见者，将愈是找不到什么解决苏联民族问题的办法。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五月号英国《今日世界》杂志　钱志坚译）

苏联在民族问题上的“辩证法”

〔加〕特里萨·拉科夫斯卡-哈姆斯托恩①

一九七一年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四大上傲然断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岁月中，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的民族——苏维埃民族——在我们国家里兴起了。”

然而，考察一下苏联社会就会发现，这种断言仅仅是官方想得到、但并不是已成事实的东西，因为人们可以看到，在苏联非俄罗斯族的少数民族中，民族主义高涨已成为苏联国内政治的一个主要矛盾。

今天，这种民族主义观念，对苏共领导人以及对研究苏联民族问题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是已带来了预期的各民族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发展，并相应地削弱了维护民族特点的意识呢？还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的新的一代少数民族中形成的民族观念，已使新生的“苏维埃爱国主义”黯然失色了呢？各民族中的民族主义，只是象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等那些古老民族中遗留的行将消逝、不会影响苏联民族未来统一的东西呢？还是那些在十月革命时对民族文化并不热心的人们当中，现在也发生了浓厚兴趣的一种新现象呢？如果象我们要说明的那样，后者符合于实际情况，那末，民族主义力量是在上升。我们决不能把它看成是过去

① 作者是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兼苏联和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著有《俄国和中亚的民族主义》等书。——译者

遗留下来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成是社会的新的部分特征。它正是企图消除民族主义而推行的政策的产物，尽管看来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社会进步的结果

当人们考查一下苏共中央制订的以各民族一体化和“国际化”为目标的经济政策执行五十年以后的结果时，就会发现各民族间的差别，仍然十分显著。俄国的欧洲部分（包括乌克兰在内）是最先进的地区。苏联的经济核心地带大体上是一个三角形，它的底线从西乌克兰西南部分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顶点在莫斯科北面一点。苏联的大部分人口居住在这一地区。苏联工农业产值的一半以上，也来自这一地区。在这里，运输网最密，投资的利润率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劳动生产率也比南面和东面的地区要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到五十年代中期都可以看到的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倾向，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似乎已经倒过来了。经济建设项目的轻重缓急顺序，愈来愈取决于苏联领导人对经济效果和大力集中发展的考虑。虽然在过去半个世纪内，象高加索和中亚等地区经济上的重要性已比过去增大了，并且那儿也有多余的劳动力，但欧洲部分的核心地带仍旧是最大限度地获得优先发展的地区。所以，从目前的轻重缓急安排来看，决不是回到早期那种要缩小富裕和不发达共和国之间差别的平均化政策。

综览一下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也可以看到一个同样的模式，即尽管总的有了发展，但在诸如城市化或人口中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比重等指标方面，少数民族的地位并没有发生什么

真正的变化。虽然，一九七〇年人口统计表明，苏联的城市人口终于占了多数（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各少数民族的城市化程度却大有出入。只有四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亚美尼亚、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民族（俄罗斯、亚美尼亚和犹太人）的城市化百分比超过平均数。

对于大多数少数民族来说，城市化程度之所以低，还突出地表现在这样一个方面，即在这些少数民族共和国的城市里，一般都是由俄罗斯人为主的外来民族集团占多数。这个事实说明，城乡差别所引起的矛盾中存在着民族问题的含义，而且差别还在扩大，它的速度似乎超过了农村居民移到城市去的迁出率。

这个问题在苏联的东南部分特别严重。尽管在工业城市中心缺少熟练劳动力，但在农村由于出生率高而熟练劳动力少，仍存在着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在中亚，农村居民的迁出率，一九七〇年每千人中只有五人，是苏联迁出率最低的地区。（一九七三年一月号莫斯科《新闻工作者》月刊）城市缺少的熟练劳动力，是从其他地区移来的，这种现象既促成了城乡和民族矛盾，也影响到中央当局要向东北地区移民的计划。

在教育普及方面，人们发现十月革命以来受教育的机会大为增加了，苏联学生占人口的比重，现在已相等于或者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比重。这种发展导致了受教育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大量增加；然而，就是在这方面的成就，也并未改变原来各民族的相对文化地位。在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一年学年中，只有五个民族（犹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人）超过了每千人中有十八点九五个高校学生的全国平均数字。这五个民族中的前四个，再加上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在科学界的知名人士中占的比重也最大。一般说来，中亚的少数民族和摩尔达维亚人在这一类统计中总是比较落后的。

人口统计中反映的问题

从近年来人口统计中所反映的趋势看来，不平等的矛盾不是缩小而是更加扩大。一九七〇年的人口普查表明，在经济落后的共和国里，人口增长最为突出。中亚和阿塞拜疆的人口净增长率是百分之二，占苏联各地区人口增长率的首位，意味着这两个地区的人口将在三十年内翻一番。这对城乡人口的分布、各共和国人口的年龄组成和官方"国际化"政策（即为缩小民族独立性，加强苏联各族人民一体感而作出的努力）的前途，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年龄组成来看，一九七〇年人口普查表明，在四个中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二十岁以下的人占各该地区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到五十六，而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三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的百分比却仅为百分之二十九到三十八。人口普查也表明，乌拉尔以东和以南地区过去十年中人口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当地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不是移民的结果，这就使莫斯科长期以来推行的民族"国际化"政策的成功前景未可乐观了。这个政策，原先是打算通过把俄罗斯或其他斯拉夫人移到这些共和国去使少数民族得以"国际化"的。人口普查还表明，大俄罗斯人在苏联人口中占多数的比重下降了（从一九五九年的百分之五十四下降到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五十三），而中亚和高加索少数民族的比重却有了增长（从百分之十增加到百分之十三）。

在通婚方面，除了各斯拉夫民族间以及俄罗斯人和犹太人间通婚较多外，"国际化"（即俄罗斯化）的进展也非常缓慢。即使俄罗斯人同其他民族的人有通婚情况，也是俄罗斯女人嫁出的较多，而俄罗斯男人娶当地少数民族女人的却较少，特别在中

亚，后一种情况是绝无仅有的。

显然，党一贯推行的提倡俄语作为苏联和新苏联文化的通用方言的政策，表面上似乎是成功的，但却并没有导致预期的文化和民族同化。一九七〇年的人口普查表明，有一亿二千八百八十万俄罗斯人和一千三百万非俄罗斯人是讲俄语的，另有四千一百九十万非俄罗斯人则声称俄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因此，现在整个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能用俄语通话。然而，百分之九十三点九的苏联公民却依旧认为民族语言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在十三个加盟共和国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还是使用当地通行的他们自己的语言。

加盟共和国里存在着少数民族的行政机构、讲地方语言的学校和地方性的文化机构，这些都是促使少数民族保留自己语言的重要因素。宗教也是妨碍语言统一的一个因素。

新的民族主义

苏联国内存在着民族主义，并且它是以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关于这一点，就连勃列日涅夫这样一个权威人士也已默认了。他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为纪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五十周年而发表的讲话中承认："即使在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民族关系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它不断有所发展，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在各个少数民族发展水平平均化方面存在的客观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在勃列日涅夫这个讲话发表后的六个月内，举行的一系列有各共和国高级官员参加的党的意识形态会议。根据会上对民族主义表现的重视情况来判断，这个国家少数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是在日益发展之中。从

苏联报刊关于这些会议的情况介绍中，人们可以看到官方批判了一系列明确指出或暗示是民族主义的活动，说这些活动是传统文化型式的“残余”、经济“地方主义”、“同民族主义有关的地方观念”、“沙文主义”、“狭隘的民族观念”，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民族主义”。

从这些例证来看，苏联社会中明显存在着各种很紧张的关系，而这些紧张关系往往是通过民族主义活动表现出来。而且，有迹象表明，这种民族主义是属于一种新的范畴。虽然六十年代初期所作的苏联社会调查表明，城市居民表现出来的“民族偏见”较乡村居民少，但城市里表现出民族主义情感的人，却大抵是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其中有的人很年轻，还受过高等教育——这也许反映了存在着各民族优秀分子间争夺职位的问题。

导致苏维埃国家出现这种新型民族主义的三个关键性因素是：(1)少数民族有了它自己的现代化的优秀分子，他们力图从各自独特的民族遗产中以及同自己民族的人民保持联系中找到合法性的根据；(2)存在着联邦制度，这种制度提供了少数民族优秀分子可以追求他们各自民族利益和目标的政治和行政组织；(3)对少数民族来说，占多数的大俄罗斯人继续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权，继续表现着民族沙文主义。让我们分别扼要地讨论一下这些因素吧。

新的民族主义者主要是新的少数民族中的优秀分子，他们是具有现代化技能的能说会道的公民，也正是官方推行的社会转变政策的产物。由于有了接受教育的大量机会，这些优秀分子的人数甚至在最不发达的少数民族中也在迅速增长。现在他们开始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受束缚的。在他们自己民族的所在地区里，他们要同俄罗斯人和其他外来者在控制职位和地方决策方面进行竞争，而在全苏范围参与决策的机会就更

少了。除了这些经济和政治压力之外，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也感到存在着一种在传播马列主义的幌子下不断把俄罗斯文化模式强加于人的做法。他们的反应是转向于仍旧存在的“古老遗产”，这既是为了要保存这种遗产使它免受俄罗斯人的侵蚀，也是为了要同他们自己民族的成员保持紧密的联系，从而形成一个能面对莫斯科的权力基地。

苏联联邦结构的继续存在，也有助于这种事态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联邦制度原来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社会形成前的一种临时措施。根据少数民族分布而划分行政单位的联邦政治和行政制度，既为少数民族优秀分子提供了基地，也为他们提供了追求民族利益的手段。

而且，联邦行政结构本身的庞大复杂性，也为避不执行中央指示和推进本地区的利益大开方便之门。毫不令人惊讶的是，党的领导人往往把共和国里少数民族追求它们各自民族利益的活动看成是地方主义的表现，因为有意识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必然会同争夺行政、经济和地方利益的斗争交织在一起。

在现代苏联社会中，民族主义观念增长的最后一个关键性因素是，占多数的大俄罗斯人占据了社会的统治地位。正是这种大俄罗斯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占有的份量和无所不在，更加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独立感。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客观因素，还由于大俄罗斯人本身坚持民族主义态度而更起作用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是有它根深蒂固的历史根源，它对非俄罗斯人采取一种家长式统治的姿态，它保持了那种俄罗斯人是去传播文明的使命感以及俄罗斯遗产、文化是特殊的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尽管作出了“国际化”和同化的种种努力，苏联当局仍旧要求在每个公民的国内通行证上注明属于哪一个民族，它在婴儿一出生时就填上了，以后要想改动是极为困难的。官方

在探索怎样来控制中亚穆斯林的人口爆炸状况和奖励俄国欧洲部分增加出生率的办法，也包含着一种民族偏见，人们可以怀疑，这就是为了要维持大俄罗斯人在全苏人口中的多数地位。

民族主义提出的挑战

民族主义的力量，似乎是在一种挑战和反应的辩证运动中不断上升着：一体化和同化的压力，导致了民族主义对中央领导提出挑战；中央领导所作出的反应，就是推行那些客观上却是进一步加深民族主义的政策。

民族主义对中央提出的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1)施加压力，要求有更广泛的政治自治权；(2)施加压力，要求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向地方性项目，要求有更多权力来计划和管理共和国的经济活动；(3)施加压力，要求有提倡民族文化的更大自由。

地方上的优秀分子，为了施加压力以争取更广泛的政治自治权，就致力于在他们的共和国里控制权力机构和决策权，还要在全苏范围为他们自己和地区的需要争得较大的发言权。民族集团也企图影响人员的任命和升迁，以便使地区的决策机构"塞满"当地人。在一九七三年格鲁吉亚共和国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据报道："在阿布哈齐亚有一种肤浅的'理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根据这个理论，领导职位只应由本地的民族成员来担任。"(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第比利斯《东方曙光报》)

人员的升迁和安排问题，也不仅限于政治范畴之内，而且日益牵涉到经济方面种种职位的分配安排问题。在当地人口增长而技术水平低，从而专业职位由苏联其他地区的熟练工人前来占有时，问题就更为严重了。这种移民活动，既减少了当地人

的就业机会，也妨碍了当地专业人员培训工作的开展，这两种情况都导致了民族矛盾的扩大。这种民族情绪，显然也促使一些格鲁吉亚的阿扎尔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宁可放弃经济发展而不愿冒外族人涌入的风险。

为了扩大地方自治权，人们还极力妨碍推行那些被认为是不好的中央政策，或者就干脆拒不执行这种政策。这种行为，特别在经济领域里，显然是司空见惯的。因此，除了特别明目张胆的事例外，有这种行为的人，仅仅算是犯了一点小错误。

这种尽量扩大地方政治自治权的势力遍及各共和国。六十年代初期的阿塞拜疆、哈萨克和拉脱维亚共和国，一九六五年的乌克兰、哈萨克和格鲁吉亚共和国，一九六九年的阿塞拜疆共和国，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的拉脱维亚、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它们的领导人遭到清洗时，都被指责犯了民族主义、用人唯亲和贪污腐化的错误。

一九七二年四月，彼得·谢列斯特之所以丢掉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地位，显然也是由于犯了民族主义的偏差。虽然官方的说法是，因为他采取了强硬路线，反对同西方缓和的政策。谢列斯特对文化领域里的乌克兰化采取了比较放任的路线，并且大力推进乌克兰地区的经济利益，这显然触怒了中央的党政领导人。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号的《乌克兰共产党人》杂志上，还发表过尖锐地批判谢列斯特所著《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的书评，指责他没有指出"俄罗斯文化对乌克兰文学、艺术和音乐的发展所起的好作用"，而是把乌克兰的一些发展同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全国的发展都割裂了开来。文章断言："此书有明显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含义。这是有害的，因为这会促进民族主义幻想和偏见的产生。总的来说，此书过份地强调了乌克兰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特色。"

同样，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姆日阿瓦纳泽被撤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位，主要理由虽然说是由于经济管理上出了问题、贪污腐化和听任自由企业泛滥，后来对格鲁吉亚共和国事态发展的批判却有力地说明，具有政治性的民族主义"偏差"，如企图把共和国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也是姆日阿瓦纳泽受打击的原因。（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东方曙光报》）

在经济领域里，有证据表明共和国领导人在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要中央计划当局批准宏大的地方项目，使自己的共和国占有较大的中央拨款份额，而同时却尽量减少自己共和国对国库的贡献。一九七二年十月，白俄罗斯第一书记马祖罗夫发表的一篇涉及民族问题的权威性论述，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他写道："在经济关系中，这种反常情况（即民族主义和地方观念倾向）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寄生状态，要从全苏的基金中拿到尽量多的资金和投资，另一方面表现为迟不完成国家的任务，对各共和国间及时地、相互配合地保证交货以及最有效地使用中央拨款和地方资源缺乏应有的关注。"（一九七二年十月号苏联《共产党人》杂志）

从乌克兰地下刊物资料中也可以看出这种立场所引起的讨价还价情况。据报道，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要同乌克兰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乌克兰部长会议讨论基本建设投资的计划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为这些共和国机构"总是以乌克兰的生产对全苏作出的贡献为依据，坚持要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他们公开地说他们遭到了掠夺"。但是，各共和国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中亚一些共和国似乎是为了要使它们的经济多样化，成为不仅仅是生产棉花的地方，因而施加压力要更多的基本建设投资。对比之下，拉脱维亚人和爱沙尼亚人却不愿意投资太多，因为他们

害怕这样势必会带来更多的俄罗斯人。

维护民族文化

民族主义在上述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表现固然是苏联中央领导人所极其关切的事情，但苏联民族关系中最具有爆炸性的方面却是文化领域里的民族主义压力，如民族历史的写作和文学艺术的表达方面要求维护民族自主权。虽然所有这些倾向事实上或潜在地在苏维埃制度到来之前也存在，但现代化和人员调动的过程却反而促使这些倾向更加发展，因为有了现代的通讯技术，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的不平等状态更为人们所知，因为正是那些民族情绪得以日益表达出来的形式（如语言、民族历史学、文学运动等）有了新的活力。

苏联制度对教育和出版事业的强调，无疑推进了各少数民族去研究和写作它们的民族历史。当然，中央领导鼓励民族历史的写作时总是指出，这些作品要有阶级观念，清楚地规定了这些民族遗产应从两种不同的历史"潮流"角度来加以阐述：一种是"进步的"，另一种是"反动的"。实际上，这意味着要歪曲历史，要把少数民族反对俄罗斯人侵犯的任何维护自主的行为说成是"反动的"。当一九五六年在解释历史上允许有较大的自由之后，许多共和国里冒出了种种对历史的"不正确"（即未经认可）的解释。一九七二年末，特别对近年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和亚美尼亚历史学家的著作提出了批评，说这些著作有"民族主义偏差"。雅科维夫在一篇肆意谩骂的文章中，指责"一些著作企图对某些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表人物涂脂抹粉，进行美化。当这些著作涉及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社会联邦主义者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民族主义党人时，都发现

有这种企图。"(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苏联《文学报》)

这种有"不正确"的或"民族主义"倾向性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和文学艺术作品的大量出现，不仅涉及许多从事创作和学术活动的知识分子，而且也涉及宣传机构和出版社。人们只能假定共和国的党的领导集团或者是认为这样的事并不算犯什么错误，或者象谢列斯特事件所表明的那样，他们甚至还积极支持这类活动。

同这种突出民族文化的发展有关的还有少数民族对传统的民族宗教愈来愈虔诚信奉的情况。宗教信仰和礼拜活动已成为苏联少数民族日益加强民族感的组成部分，苏联领导人对这种联系也是知道的。例如，天主教是立陶宛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东正教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路德教也是当地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就中亚各民族以及鞑靼人而言，伊斯兰教提供了一种促进团结的结合力和一种与众不同的标志，有助于使他们不受社会变化带来的一体化影响。而官方为了要取缔"过去的遗迹"和提倡无神论而施加的压力，无疑还促使人们反过来更要维护这些文化形式，他们根据苏联宪法所提出的保证，要求在宗教礼拜和民族教育方面有更大的自由。

程度上的不同

综观对民族主义所施加的压力，人们看到过去十年内这种压力明显地大为增加了。民族主义过去是潜伏和被压抑着的，近年来却抬头了，这或许是由于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后争夺继承权以及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赫鲁晓夫的"解冻"起了催化作用。看来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其"正统"民族主义的表现，即

在现有制度的范围内有意识地追求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自治权。在各共和国里，包括当地权力机构成员在内的一个新的民族，知识分子上层充当了民族感的旗手。

“正统”民族主义存在的程度各有不同。一些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如四十年代并入苏联版图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民族，或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不但保存了而且加强了他们的民族感。有四千多万人口和经济基地的乌克兰人又是一种特殊情况。他们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在三十年代，他们的民族感曾有所削弱，但在过去二十年中又有力地复活了，或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入西乌克兰这一情况是起了促进作用的。不管怎样，乌克兰人似乎也已名列民族觉醒的前茅，而解决乌克兰的民族问题对苏联领导人来说是关系非常重大的，因为如果能够成功地同化了乌克兰人，相对地来说，其他少数民族就比较无足轻重了。

在中亚以及一定程度上也在阿塞拜疆，民族感的发展长期来在土耳其斯坦地区是局限于统一的伊斯兰文化方面。然而，现代民族主义在所有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中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它们的民族意识固然可以最清晰地从文化领域中觉察到，但它们也已开始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施加压力。吉尔吉斯和哈萨克人或许比其他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更现代化些，他们和乌兹别克人(最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产生了最能说会道的少数民族优秀分子。

从苏联犹太人的事例中还可以看出，高度的同化程度并不等于就会使人们放弃他们的民族观念。苏联犹太人分散在苏联各地，他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行政和经济基地，他们几乎已全部城市化，他们到处流动，养成了使用俄语的习惯，也已习惯于采用俄罗斯人的文化方式。然而近年来，愈来愈多的犹太人却又

有了民族感，许多人甚至选择移居以色列来表明他们并不接受苏维埃这种制度。

当然，犹太人也不是在苏联表现出“非正统”民族主义情绪的唯一的一个民族集团。但是，这种分裂主义和不接受苏维埃制度的例子似乎仅仅出现在局部地区。非正统民族主义是要受到残酷镇压的，西方观察家主要是通过地下刊物了解这些情况的。当民族感同诸如宗教这样强有力的文化促进因素结合在一起时，似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乌克兰、立陶宛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在规模较小程度上还有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人，他们那里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例如，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以及再次在一九七二年，乌克兰曾有过民族主义骚动的浪潮和接踵而来的逮捕法办。一九七二年三月，立陶宛天主教人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抗议迫害的备忘录。两个月后，苏联当局不得不出动军队来镇压继罗曼·卡兰塔和另外两个立陶宛青年抗议性自杀后，在考纳斯地方发生的骚动。

地下组织的形成，还有民族主义的或宗教性的地下刊物的流通，都是存在“非正统”政治反对者的明证。六十年代的乌克兰就有许多这样的地下组织。有的前身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争取独立的组织，如乌克兰民族解放阵线。一九七三年夏，《立陶宛天主教纪事报》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致全世界共产党的呼吁书（附有一百零五页的亲笔签名）曾在西方散发。据报道，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共和国内也有规模较小的建立地下组织和散发地下刊物的活动。

官方的反应

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民族关系的情况是了解的和担忧的，这

一点无可争辩。政治局的意识形态问题专家苏斯洛夫把民族对抗列为妨碍苏联建设共产主义获得进展的三大矛盾之一。（一九七二年一月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二年苏共中央的一个决议也承认民族问题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的一个关键问题”。（一九七二年三月莫斯科《党的生活》杂志）

少数民族不断施加的压力，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上曾获得一定程度的重视。当时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把一些联邦的权力下放到了共和国去，也让一些被清洗的少数民族领袖恢复名誉，让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从祖先的家园赶走的少数民族恢复它们的正常生活。然而，接踵而来的民族压力的强化不久就引起了反作用，首先是一九五九年，一些共和国领导人以“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罪名被撤职了。

赫鲁晓夫对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挑战的反应是修改官方的民族关系理论。一九六一年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指出，在新的共产主义建设时期里，“……各民族将进一步相互接近，将做到完全合成一体”。这个新的公式是有辩证含义的，它肯定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将通过强调文化上各民族共有的东西，“相互接近”而繁荣起来，最后辩证地一跃而“融合起来”，或“完全合成一体”。新公式提出的同时还直截了当地提到了联邦形式的“陈腐性”。

少数民族的优秀分子对这个新公式是很不满意的。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反击也是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鲁晓夫下台的一个因素。总之，他的继承者们肯定迅速地对各共和国作出了策略性的让步，包括恢复共和国在经济管理上一些传统的行政管理权以及承认各共和国发展民族文化的需要。虽然官方声明中继续援引“相互接近”的概念，民族“融合起来”的说法已不提了。此外，在六十年代后期，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都成了苏

联最高苏维埃的当然成员，各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也成了苏联部长会议的当然成员。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共和国最高法院院长和计划委员会主席。

不管怎样，这个“相互接近”的公式继续流行一时，并成为一九七一年春二十四大上讨论的一个主题。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号召要开展一个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教育运动，以促进人们理解这个概念。他也谴责了“各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狭隘民族观念和骄傲自满”，还提到俄罗斯人在苏联社会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苏联领导人在如何对付这个主要国内问题上是犹豫不决的，这一点在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五十周年讲话中也可看出。他在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党认为任何要阻止民族‘相互接近’这一过程，用种种借口阻挠这一过程，或人为地推动民族分离的企图，都是不允许的。”然而总书记讲话的整个调子却反映了民族主义压力的力量，因为他显然不厌其烦地想说明俄罗斯联邦在苏联国内的“特殊历史地位”，提醒乌克兰、哈萨克和波罗的海沿岸的共和国的人民注意，他们之所以有了进展，只因为他们是这个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员。同时，苏联报刊也批判了斯拉夫文化优越论（即极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活，要人们注意“相互接近”的过程是长时期的，应该“有分寸地和细致地关心”每个民族的利益。（见一九七二年七月《共产党人》杂志，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日《真理报》，一九七二年五、六月《苏联历史》合刊）

在这种官方举棋不定的气氛中，民族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了。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纪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五十周年以来，这个问题已引起了极大的注意。从许多政治性和专业性的杂志发表了大量权威性的论述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已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心要防止民族主义的

进一步发展。然而，在必须采取什么样的重要的新政策才能扭转局面这一点上似乎没有统一的意见。甚至有证据表明存在着象二十年代有过的那种自治论者和同化论者之间的争论。

总之，在目前的条件下，不管莫斯科统治阶级的政策如何，或者甚至可以说，正由于苏联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政策，人们可以预期苏联少数民族的民族存在感将日益高涨。民族观念将变得愈来愈带有破坏性，但不一定就能毁灭现有的政治制度。虽然民族主义的愿望将不时地或许愈来愈频繁地表现为"非正统"的分裂主义形式，在一般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不难于镇压这种极端的行动。然而，如果发生重大的动乱或诸如一场国际冲突这样的外部的刺激，零星的民族分裂主义事件也许会发展而取代更为正统的民族观念的地位。这对苏联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也不能作出肯定的答案，但预兆看来是不祥的。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五、六月号美国《共产主义问题》杂志　张仲礼译）

亚美尼亚人也起来反对莫斯科了

〔美〕保罗·沃尔

将近四百万的苏联亚美尼亚人中，正在激起民族主义和政治对抗的浪潮——他们直到不久前还似乎是坚定的亲苏者，是苏联的一大支柱。

关于这一事态发展的明显的迹象是在去年十月出现的。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亚美尼亚团结民族党”的几名学生党员在埃里温遭到了审讯，并被严厉判处平均长达七年之久的监禁，随后还要放逐。

审讯是秘密进行的，后来，苏联科学院院士安德烈·萨哈罗夫根据“完全可靠的情报”加以公开报道了。还有一件审讯案还在进行之中。

早在六月初，人们承认已有两个年龄较大的亚美尼亚人由于从事“民族主义活动”而被送进了劳动营。据说逮捕仍在继续进行着。

有一份斥责莫斯科“帝国主义行径”的亚美尼亚人秘密散发的宣言，已经落到了西方手里。在宗教界也出现了类似的紧张状态。

亚美尼亚人在国际性团体活动方面以及在文艺和科学界的地位，可以跟犹太人相媲美。因此，对于莫斯科来说，和苏联其他民族中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比，他们所激起的政治对抗是一个更加敏感的问题。亚美尼亚所发生的扰乱肯定会在全世界引起

反响。

有一百五十万以上的亚美尼亚人散居在苏联之外的世界各地。其中生活在美国的大约有三十万人。（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自身大约有两百六十万亚美尼亚人；还有一百万以上的亚美尼亚人散布在苏联境内其他地方。）

在苏联的非斯拉夫族的人民中间，除了犹太人之外，亚美尼亚人拥有为数最多的科学工作者。在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比重上来说，则占第二位。象犹太人一样，他们更乐意住在都市地区。

亚美尼亚出现扰乱是在去年首次公开化的。当时莫斯科宣布，长期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安东·科钦扬"根据他自己的意愿"，获准退休。那时，他不过六十一岁，还算是盛年。自从一九三七年以来，科钦扬就曾担任过亚美尼亚共青团的首脑，在斯大林时代他还曾担任过亚美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在去年年初共产党的一次会议上，埃里温市委第一书记路德维格·加里勃贾尼扬对日益增长的反俄情绪进行了谴责。他警告不要让达什纳克民族主义党人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复活，这些民族主义党人在沙皇专制制度垮台之后曾经是亚美尼亚最有影响的势力。

这位书记号召要向"伟大的俄罗斯人"表示感激——他并宣布，为了庆祝俄罗斯人解放亚美尼亚的纪念活动，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将于一九七八年揭幕，碑文是"世世代代同俄罗斯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团结在一起"。

近年来，俄罗斯化倾向所引起的不满看来是造成扰乱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米高扬离开政治舞台，亚美尼亚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个一度有影响的势力集团逐渐无声无息了。

从经济上来说，苏联的亚美尼亚共和国较之某几个主要的

欧洲国家还远为发达。它的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已经博得了举世的赞赏。在这种背景下，反俄罗斯的民族主义竟然抬了头，这可见克里姆林宫文化政策问题之严重。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五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王宏儒译）

一份使当局困窘的呼吁书

〔英〕《苏联问题分析家》

对于苏联当局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问题比苏联人口中的多民族构成问题更为复杂而棘手的了。苏联再三坚持说，由于执行了列宁主义的政策，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已告解决了。这种说法固然令人产生怀疑，但也是在警告局外人不要进行干预。

因此，对波兰十五名重要知识分子为要求让苏联境内波兰少数民族享有更大文化权利而签署并送交波兰文化部长的呼吁书，我们必须把它看成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态发展。向驻华沙的西方新闻机构发表的这一呼吁书，要求波兰当局向苏联政府提出，让苏联境内的波兰人享受象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一些波兰少数民族所取得的那种少数民族权利。它特别要求应该让苏联的波兰人有到波兰旅游方面的更多自由（目前这种交往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并且应该让他们在文化上、教育上和宗教上享受更广泛的便利。

一九七〇年的苏联人口普查报告说，苏联的波兰人有一百十六万七千人，其中仅有百分之三十二点五讲波兰语，其余大概是讲俄语和乌克兰语。有确实的证据表明，苏联境内的这一少数民族集团的人数正在下降。根据一九五九年的人口普查，波兰人是一百三十八万，其中百分之四十五点二讲波兰语。同时也表明，同化过程是强迫进行的。一些波兰人被告知，如果他们声称自己属于“波兰”族，就会对他们产生某些不利的后果。

V·I·纳乌尔科于一九六五年在基辅出版的著作《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种族构成》，应用了一九五九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这个共和国内的波兰人经历了广泛的语言同化过程。在乌克兰的三十六万三千波兰人中，仅有百分之十八点七或者六万八千人填明他们使用的语言是波兰语，二十四万九千人填了乌克兰语，四万五千人填了俄语。此外，有百分之五十一点八的城市波兰人同他们本民族以外的人结了婚，而农村波兰人在这方面的数字则仅为百分之二十九点五。

只有在维尔纽斯和利沃夫两个城市的波兰人居民中间，还存在着有组织的波兰社会结构。例如在维尔纽斯，多少还有着讲波兰语的学校网，为大约十万的波兰人服务。其他地方的波兰人居民则比较分散和孤立。除了生活在现属于苏联西部边境的前波兰领土（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部分）内的波兰人居民外，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也有波兰人的居民点。

尽管遭到苏联当局的敌视，苏联波兰人同波兰之间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交往——签署呼吁书的许多人就曾访问过苏联波兰人所居住的区域，对有关情况拥有第一手的情报——因此，可以说呼吁书是在交换了情报之后提出来的。很可能就是苏联波兰人竭力催促他们的波兰同胞：在苏联实行的同化过程完成之前就采取行动。正如众所周知的，在维尔纽斯的波兰人就和立陶宛人（他们自己的宗教-民族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采取了共同行动。当立陶宛天主教遭到严厉压制时，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在宗教上的联系看来就比他们之间在传统上的敌意更为重要得多了。

华沙知识分子提出呼吁书的原因，还同波兰政府对待国外波兰人的政策有关。波兰政府几年来一直推动着一项得力的宣传运动，目的在于使西方的波兰人相信共产主义在祖国波兰所

取得的成就。推动这一宣传运动的主要机构是称为波洛尼亚的组织，据说它同国外的波兰人保持着联系。

事实上，正如华沙的人所指出的，波洛尼亚在争取西方的波兰人方面是非常活跃的，而对苏联的波兰人却毫不出力。去年在华沙举行的国外波侨会议上（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兰少数民族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但没有苏联波兰人的代表），苏联的波兰人问题确是被提出来了，但由于接到了波洛尼亚负责人的命令，立刻禁止了这个问题的讨论。呼吁书含蓄地指出，波洛尼亚和它背后的波兰政府应当显示更加不偏不倚的态度。

促使华沙知识分子提出呼吁书的另一原因，就是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西德政府在安排从波兰和苏联移入一些日耳曼人的问题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华沙的人认为，如果在共产党国家和非共产党国家之间，能够达成这种关于苏联的一个少数民族问题的协议，那末在两个共产党盟国之间，这样的事就应当更好解决了。波兰当局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是困窘不堪的沉默。据说政治局已讨论了这个呼吁书，而得出的结论是：最为适当的态度是采取等着瞧的政策。

同时波兰领导认识到，这一问题对于波兰舆论以及对于苏联的敏感性来说，都是极端微妙的。据说苏联驻华沙大使皮洛托维奇对这一事件的确很恼火。华沙当局关于此事的反应所提供的唯一明显迹象是：有几家报纸刊登了一些简短的通告，详细列举了从波兰出口到苏联的种种杂志和报纸，从而企图表明波兰当局对于苏联波兰人是关心的。

（译自一九七五年一月十六日英国《苏联问题分析家》杂志　淮海译）

关于巴西经济

是经济奇迹，还是畸形经济？

编者按：近几年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继吹捧日本和西德经济发展之后，又在那里大肆贩卖巴西"堪称为现代史中'经济奇迹'的第三个主要国家"的神话。为了揭穿这类谎言，这一期节译了几篇有关巴西经济发展的文章。从这几篇文章可以看出，巴西并没有出现什么"经济奇迹"；相反，却出现了依靠外"援"，特别是依靠美国的贷款和投资，片面发展本国工业的畸形经济。

一九七四年，当盖泽尔上台时，巴西的外债已经超过了一百三十亿美元，比这个国家两年的净出口总额还要多，估计到一九七五年时，还将再增加三倍。巴西经济负债累累，日益困于偿付到期的债务和不断增加的外债利息。

巴西的工业在外资的扶持下，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它的结构却表现了特有的畸形异态。正如《巴西工业的非民族化》一文指出的："这种畸形发展是富国蓬勃发展所产生的一种'反射作用'的结果。今天这些富国除了输出商品和资本之外，还同样输出工厂。"让我们看一看当前巴西的经济情况吧！外国资本控制了百分之六十二的巴西对外贸易，百分之八十二的海运事业，百分之七十七的海外航空事业，百分之一百的

汽车生产，百分之一百的轮胎生产，百分之五十九的机器制造业和百分之九十的水泥生产，等等。巴西的经济不是为本国的需要服务，而是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高额利润服务。巴西实际上是外国帝国主义的加工厂。

在巴西的外国资本中，以美国资本最多。但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拚命想打进巴西市场。它在一九七四年八月到十二月间，主动提出向巴西出口石油五十万吨的建议，阴谋以此为楔子打进巴西，同美帝展开争夺战。

这几篇文章中还有不少关于巴西经济发展对国际垄断资本和极少数巴西特权阶层有利，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则造成无穷灾难的材料。这些材料也告诉人们，在巴西出现的并不是什么“经济奇迹”，而是劳动人民的灾难。

随着巴西民族民主运动的蓬勃高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日益深化，巴西当局开始在逐步改变它的内外政策，采取了“实用的民族主义”。这种改变虽然是缓慢的，但却是巴西人民要求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的一个反映。

巴西工业的非民族化

〔乌拉圭〕爱德华多·加莱阿诺①

一个老年妇人弯着身子摇晃着手在扇火。从她的驼背和肌肉松弛的、布满皱纹的脖子看起来就象一个老乌龟。但褴褛的衣裳当然不能象乌龟壳那样来保护她，而事实上她动作迟钝也仅仅是由于她年龄的关系。在她后面的木头和白铁皮凑合起来的房子也是东倒西歪的；在她前面，一个深褐色的壶里，煮咖啡的水已经烧开了。她举起一个小洋铁罐放到唇边，还没有开始喝，就闭上眼睛摇着头说："巴西是我们的。"

同一个时间，在同一城市的中心，联合碳素公司的常务董事也正举起一个水晶杯子，庆祝公司吞并了另一家巴西的塑料工厂时，想着的也是同一桩事，但用的却是另一种语言。

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错误的。

有的生来很健康，有的生来就残废

一九六四年时，巴西的制药工业就已经不是巴西人的了。本国制药厂的产品仅占全部销售量的三分之一。但根据巴西制药工业协会的材料，两年后的情况又变了，到一九六六年，巴西人的

① 作者是乌拉圭的作家和编辑，他也是《每月评论》出版社出版的《危地马拉：被占领的国家》一书的作者。这篇文章是他广泛访问了巴西后写的，由米基和约翰·朗特里译为英文。

制药厂的产品已降到全部销售量的五分之一。怀思、布列斯托尔、米德·约翰逊和利弗已吞并了丰托拉、拉博尔特拉皮卡、埃多金米卡以及热西等制药厂和香料厂；同时一个法国财团也接办了席尔瓦·阿劳若-罗素药厂。

在一九六四年四月的政变成功之后，几乎在所有的巴西工业部门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十五个汽车厂或汽车配件厂在一九六八年年中以前就被北美或欧洲的大公司所吞并。国营汽车厂是国家的财产，但它也屈服了。电气和电子设备方面，巴西人的三个重要公司落于日本人之手。在塑料行业，原属本国资本的四个工厂也变为北美的公司所有。安纳康达也开始从事有色金属的生产。在机器制造和冶金方面，五个北美公司和一个日本集团接办了六个相当规模的巴西企业。雅费特财团所有的通用矿业公司是巴西人主要冶金厂之一，被伯利恒钢厂、纽约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美孚石油公司所组成的财团以破产的价格所购买。两个北美公司和一个德国公司接办了化学部门。即使是"传统工业"也难幸免，尽管跨国公司所最感兴趣的，自然还是在于控制工业中的动力部门；但产权转让的情况也在卷烟、染料、食品、纺织等制造厂发生。

少数抵制过这种入侵的民族工业家之一宣称："经验告诉我们，一个本国企业的销售收入，经常不是归巴西所有，而是在购买国的金融市场上被继续用来进行牟利。"他进一步说："外国集团总是向外国银行存款，主要向其他外国企业购买货物，同外国公司订立保险合同，而进行投资就靠它们本身创造出来的资本。从政治意义上说，它们起着一种越来越大的影响。它不需要掌握报纸和电视这些渠道。它们控制了大量的宣传人才，因此，就能用各种方法来制造舆论。"这就是指那些在行动中的大跨国公司，就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集合了工业、商业和金融势力而形

成的“混合体”。这个工业家陈述的内容，是在巴西军人政权封闭国会前的国会特别委员会所收集的材料之一。委员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说：一九六八年，外资控制了百分之四十的巴西资本市场，百分之六十二的外贸，百分之八十二的海运，百分之七十七的海外航空事业，百分之一百的汽车和轮胎生产，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制药工业，近百分之五十的化学工业，百分之五十九的机器制造业，百分之六十二的汽车配件厂，百分之四十八的铝，百分之九十的水泥。根据该委员会的材料：外资的半数来自美国；在北美厂商之后，按其重要性排列的有德、英、法和瑞士等国的企业。这一报告包括了非常重要的情报，可惜在巴西却一无所知。在刚要把它出版的时候，科斯塔·埃·席尔瓦政府就把国会封闭了。被该委员会召见的工商部长宣称他自己是参预外国投资的，关于在巴西渗透的情况，他坚持认为是“被大大夸张了”，虽然他也承认在石油化工、机械（包括铸造和锻造）、电气和化学、轻型机械、船舶制造、汽车、玻璃、制药、香料和烧碱等工业方面，外资是占统治地位的。劳动部长对亚马孙河口的传统伐木工业被转移给北美一事进行了谴责。采矿和动力部长、外交部长一致承认，卡斯特卢·布朗库政府所采取的允许外国信贷直接流入外国厂商的办法，使民族资本的厂商处于不利的地位。两人都特别提到一九六五年著名的第289号法令。在该法令的许可下，一百个重要外国厂商中的一半，被允许可以直接从国外取得资金。巴西厂商向国内申请信贷，需支付高达百分之四十八的利息，而外国厂商向国外要求贷款，只需支付百分之七或八的利息。

对于许多巴西厂商来说，这是走向破产的决定性步骤。在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办法实施后，国内信贷严重地减少了；同时，由于实际工资的下降，结果是国内市场的消费水平也随之

下降。巴西政府保护外国厂商已达到了极点，即保证给予特殊照顾的汇率，以便在贬值的情况下偿付它们的国外债务。不仅如此，从委员会报告中还能看到，在巴西经营的银行，其资产中约有半数是属于外资的，同时，在国内的二十七个投资银行中，有十七个是外国的。由于外国厂商和国际金融资本有密切联系这一有利条件，又能得到拒绝贷放给国内工厂的国内信贷。这股风浪一来，于是，许多巴西的厂商由于缺少资金来源而纷纷被淹没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巴西政策设计者和第289号法令的发明者罗贝托·康波斯，在同一个议会报告中用下面这段话作了解释：

> 显然，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聪明，有的生来就愚蠢；有的生来很健康，有的生来就残废。这个世界是由大大小小企业组成的。有些正当壮年即告夭亡；另一些则老而不死，活着无用，罪恶地拖延时光。人类天性和事物本性中本来就包含着不平等。信贷结构中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要求国内厂商能象外国厂商同样地得到外国信贷，那就简直不懂得经济学的基本事实……

按照这个简短扼要的"资本主义宣言"的说法，弱肉强食的规律，就成了统治人类生活的自然法典；不正义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们所理解的不正义，只不过是宇宙无情规律的表现。穷国之所以贫困，就是因为它贫困。命运在星辰上早已注定，而我们生出来只不过是实现它而已。有些人是注定要服从别人，而另一些人则注定对别人发号施令。

并非出于偶然，就是这一个康波斯，不久之后，对在秘鲁占优势的民族主义作了一个奇特的解释。按照他的说法，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的政府征用美孚石油公司的财产，只不过

是一种“丈夫气概的表现”，而民族主义的目的，也只是为了满足原始人类发泄仇恨的需要。但他写道：“骄傲不能带来投资，不能增加资本的积累，也不能创造合理的组织工作的技能，而常常阻碍了生产力的增长。”假如这些是骄傲的结果，那末，什么是耻辱的结果呢？我们将等着瞧吧。

数字和方法

一九六四年四月暴动所产生的军事独裁，暴露了康波斯在处理国家经济方面，是一个道地的沙皇。他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定，对通货膨胀进行的搏斗，就象一面假旗一样，掩盖了赤裸裸地把国家财富拱手送人的政策。拉丁美洲的历史，充满了掠夺的插曲，而在这一个世纪中它也许会创造出一个新的纪录。卡斯特卢·布朗库的政府签署了一个保证私人投资的协定，对外国企业给与“治外法权”，允许它们的赢利外流，降低它们的所得税，并给与它们特别信贷的便利。世界上储量最大的铁矿被送给了汉纳矿业公司，该公司还得到建造私有港口的权利（根据康波斯自己在几年前充任汉纳公司“技术顾问”时所做的计划）。给电气证券和股份公司的补偿费，超过了陈旧的“民族化了的”设备的实际价值的若干倍。为了对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和联合碳化物公司有利，国营石油公司、巴西石油公司被剥夺了对石油化工的垄断权。实际工资被削减了，国内工业的信贷大大地被压缩了，这样就加快了本文所涉及的主题非民族化的步伐。

由康波斯所设计的“政府经济行动纲领”曾预言，为了鼓励和保护外资而采取的政策，将会使资本不断从国外流入，以促进巴西的发展，并有助于经济和财政的稳定。一九六五年预计有

一亿美元的新的直接投资来自外国，但实际只到了七千万。一九六六年预计为一亿二千万，但实际上是七千四百万。一九六七年新投资总额是七千万美元。同一时期，外国厂商把更大数目的赢利和红利汇回了它们国内：一九六五年为一亿零两百万美元，一九六六年为一亿两千七百万美元。而一九六七年外流的赢利和红利几乎两倍于新投资额，外逃了一亿三千万美元。此外，还要加上其他大量的支出，如管理、技术援助、专利权、专利权使用、商标使用和进口佣金等费用；一九六七年，外国厂商在这些名目下榨取了一亿七千万美元。

同时，外债一直在增加，已达四十亿美元。投资的摊还和利息的支付也在不断增加，一九六八年就外流了五亿美元。和拉美其他地区一样，在巴西按照"争取进步联盟"的条件所得到的贷款，也必须用来向美国购买货物（美国出售的机器是世界上最贵的），而且必须由插着北美旗帜的船舶装运（除非北美的公司收取了保险费，每吨货物还需额外收取十美元的装运费）。一九六七年巴西支付了一亿一千万美元的装运费和保险费。除这些资金流失之外，还要加上非法的汇款。巴西中央银行一九六八年的报告中就承认，非法汇出巴西的款项，一九六六年为一亿八千万美元，一九六七年为一亿两千万。

显然，流出的财富比流入的要多得多。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六七年工业非民族化的"关键"年代里，新的直接投资较之一九六一年要少得多。那末，巴西这个拉美最大的"工业公园"，在并没有大量美元的注入的情况下，是怎么样才当上了俘虏的呢？

关于这一权力的转移，早在儒塞利诺·库比契克的工业"景气"时期就已奠定了基础。当一九六四年军人掌权时，巴西人的投资，在全部私营工业中所占比重，就已经不多了。但后来非民族化的过程就以令人眩晕的步伐加速进行了，而民族资产阶级

这“最后一批莫伊坎斯人”(美国的印第安部落——译注)，便相继坠入了使人窒息的外资的拥抱之中。民族企业家正变成北美或欧洲厂商的代理人。本国资本的最后堡垒，已退到生产水平较低的“传统的”或“无生气的”部门之中。具有较高增长率的工业(化学、冶金、轻重机械、电气设备、交通、汽车等)中的外资的巨大力量足以说明，为什么外国企业的产量对巴西总的工业生产的比率，是五倍于它们的资本对工业总投资的比率的理由。

许多被非民族化了的巴西工厂，依赖于使用美国或欧洲的商标、专利、技术等援助；这些项目都必须以美元来支付，而流动资本的长期枯竭，使它不可能偿付这些由于克鲁赛罗（巴西货币)贬值而增大了的债务额。对技术的依赖是代价昂贵的；垄断者的技术情报，也包含着怎么吞噬邻人的非常实用的经验。贷款给巴西企业的外国债主，把未还的债款转为投资的情况是很多的；说得不客气，他们就是用占有债务人的全部或部分机器设备的方式来收集债款的。中央银行的数字表明在一九六五年到一九六七年中，百分之二十以上来自外国的新的直接投资，事实上，就是从过去的贷款转变过来的工业投资。国会委员会收到的关于削减价格的一份证词透露：议员沙维斯·阿马兰特讲到一个巴西的阿德西特胶带厂如何被北美有权势的联合碳素公司所吞并的故事。这个议员说：“阿德西特”是圣保罗的一个企业，“是一些理想主义的、有创业精神的和有战斗力的年轻人办的厂子，起初，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工场，以后，发展成了一个有三万平方米的大工厂，每月的产值达五亿克鲁赛罗。”美国明尼苏达矿业和制造业公司(著名的苏格兰胶带的制造者)，开始在巴西市场以越来越便宜的价格倾销它的胶带。“阿德西特”的销售量因而开始下降，同时银行又拒绝向它提供信贷。明尼苏达

公司继续削价，先是削了百分之三十，然后又削减了百分之四十。于是联合碳素公司就出场了。它以低得要命的价格购买了巴西的公司。以后，联合碳素公司和明尼苏达公司协议把国内市场一分为二，各占一方。并且共同商定，把胶带价格提高百分之五十。过程就这样完成了。

先 行 者

外资大量流入巴西的情况，在五十年代已很显著，特别是在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总统实施梅塔斯计划的时期。那是经济增长使人感到安乐的时期。巴西利亚（巴西的首都）是在不知道什么是车轮或者甚至还不知道有车轮的印第安人的荒野上建设起来的；道路铺设好了，巨大的水坝建造起来了；汽车工厂每两分钟开出一辆汽车。工业在迅速增长。那是一个景气时期。大门为外资敞开着。美元的入侵受到了欢迎。巴西期待征服未来。未来即意味着工业化、进步和生气勃勃。银行钞票油墨未干即行流通，通货膨胀和庞大外债为跃进提供了资金，而外债的清偿将成为未来政府接过去的沉重负担。

库比契克提供了许多吸引外资的办法。他保证给外国厂商以特殊汇率，以便它们向总公司汇回利润和摊还的投资额。为偿付厂商所负外债，政府同厂商共同承担责任，并同意给以低价的美元来偿付这些债务和利息。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所公布的报告，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外资至少占总投资额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七。这样巴西的大量外债又进一步增加了。此外，还对机器的进口给予特殊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国内的厂商却不能享受这些给予外国人的好处。保罗·谢林指出，巴西政府一方面将大量好处送给了庞大的跨国公司（如大众汽车

公司、密西迪斯、本茨、通用汽车、福特)，并允许它们以最小的投资取得最大的盈利；但另一方面，又拒绝支持热图利奥·瓦加斯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考迪罗(西班牙语的音译，意为首领，引申为独裁者——译注)国营汽车厂(以后，在卡斯特卢·布朗库政府时期，这个国营企业被售给了阿尔发·罗默欧公司了)。

附属性发展的贾纳斯双面人

在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社会科学院对巴西各大公司进行调查的材料发表之后，巴西这种投降帝国主义资本的政策所产生的非民族化的结果，就被揭露出来了。根据资料，资本大于四十亿克鲁赛罗的企业中，一半以上是外资的，而其中大部分是北美的；拥有一百亿克鲁赛罗资本以上的有十二个是外国公司，只有五个是本国公司。毛里西奥·文阿斯·德·克罗斯在分析他所主持的调查的情况时得出结论说："公司越大，属于外国资本的可能性也越大。"此外，这个调查还发现在资本由十亿到四十亿克鲁赛罗的公司中，有十个公司在它们各自的范围内，享有实际上的垄断或明显地居于领导的地位。而其中八个是巨大的北美公司的分支公司。

对照这种情况来看，帝国主义就不再以一个对外的剥削制度出现了；或者，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说它仍然是对外的，但再也不是从遥远的地方进行控制了。现在，它就在某一国界里面控制"民族"工业，而这些工业按照帝国主义剥削的"古典"模式来看，应该是它的敌人。在巴西，一些厂商就能找到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和国内资本来源，这些资本大部分受外国所控制，可以用来帮助巨大公司进行渗透。此外，它们还可以得到各种鼓励。同意给予巴西东北部的北美企业的免税额，就比它整个的投资额

还要大；在全国各地的外国厂商们都能得到国家给与的土地，并能享受减低了的电费；它们还能享受到比官价汇率低四分之三的美元的好处，并用这种汇率来偿付它们的债务和夺走巴西所生产的财富。国家对它们的帮助甚至达到这种程度，即当汽车厂有困难时，就免除其出售汽车的营业税。

直到几年前，拉美的工业发展不仅可以看作是进步的同义词，而且在帝国主义面前还是理论上的，有时也是实际上的民族主义的表现。但现在巴西、阿根廷和某种程度上的墨西哥（拉美的三个主要工业中心）的工业结构，表现了特有的畸形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是富国蓬勃发展所产生的一种“反射作用”的结果。今天这些富国除了输出商品和资本之外，还同样输出工厂。的确，现在不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在进行渗透和垄断一切了，而是在垄断组织和大跨国公司的时代里，被资本主义所巩固了的国际规模的工业一体化的组织在进行渗透和垄断了。对“拉美一体化”最感兴趣的是外国的厂商。它们准备用拉美共同市场来吞噬整个拉美的市场。

对于外国厂商来说，国家并不是它为之努力的目标，不是要加以保卫的旗帜，也不是天命注定非要征服不可。正如卢西亚诺·马丁斯所说：国家只不过是一个要加以克服的障碍物。对于这些厂商，国界只是代表了一种障碍。外国控制巴西的工业，或最低限度控制它的主要部门，意味着在国家制度内部引进了外国势力的工具。塞尔索·富尔塔多曾注意到：虽然拉美国家的经济活动有所扩展，但在经济管理方面近年来显然是后退了，现在国家的影响已比二十年前小。同时卢西亚诺·马丁斯指明：“中央资本主义”通过制造业投资的国际化，已挤掉了国内制定决策的中枢。外国厂商已开始在它们所经营的国家里扮演着一个政治角色，并通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的广告和通讯广

播工具对舆论施加了巨大的影响。外国厂商能在“资本主义的外围”国家的国内市场中进行活动，使它们掌握了一种控制的手段，这样就形成了经济依赖的锁链。整个巴西的消费和生产标准，是符合美国关于发展和“现代化”的概念的；北美是投资和市场的实际控制者。这种情况是这个国家结构不平衡的尖锐化的反映。

收支差额是反映这些不平衡的一面镜子。巴西接受美国的财政援助的规模，同它“享有特权的卫星国”的性质是相称的。但在更大的意义上来看是，巴西在财政上援助了美国：第一，因为比新的直接投资额大五倍以上的美元，以赢利、红利和“特许权”等名目外逃了；第二，因为如果在有系统的“放血”之外，再加上偿还贷款的本利、巴西支付的高额运费和保险费以及慷慨的非法汇款等，就可以得出结论：从出口中得到的收入，有百分之七十是通过各种渠道帮助了外国资本。巴西由于帮助美国解决它在越南和全世界的军事开支所引起的大大加剧了的紧迫的收支差额的问题，反而搞糟了自己的收支差额问题。巴西可以用来资助进口的资金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减少了。人们能看到，外债的增加是有很具体的原因的。

但这种工业化（尽管是被遥控的）是否就能以本国生产代替过去必须从外国进口的商品呢？塞尔索·富尔塔多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告诫说：尽管拉美能生产一些更复杂的产品以代替进口，但它对外国所提供的物资的依赖程度，将随着生产发展的程度而相应地增加起来。在一九五七到一九六四年间，北美分公司的销售额由二十四亿美元增加到五十亿美元，而这些分公司输入的物资（不包括设备），却由两亿一千万美元增加到六亿七千七百万美元。这个趋势似乎表明，这种“代替作用”的效率，是按在外国公司控制下的工业发展的程度而递减的。

市场衰落和劳工过剩

实际上，从一开始起，巴西的工业化过程，就一直是沿着它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必须改革部分的边沿而进行的。这个结构本身的份量，就足以加深它的畸形的变化并使原有的不平衡变得尖锐起来。一个官方的报告说："和现在发达的国家中的工业化不同，巴西工业化的过程并不是作为总的经济改革过程的一部分而逐步进行的。巴西工业化的过程，可以说是硬加在它早就存在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上面的一种来得迅猛而深刻的事物。总的来说，它没有改变以前的结构，而是引起了巴西社会所特有的部门和地区上的深刻差别。"报告还说："扩大国内市场和提高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目前起着作用的经济条件下，并不是单靠孤立的工业化过程所能完成的一项任务。"

在库比契克的梅塔斯计划的最盛时期，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改变农业或畜牧业的结构，同时也没有注意到需要改变那种使巴西这个国家成为少数人有钱而大多数人贫穷的收入分配的情况。大庄园制仍在继续发展（百分之三的大庄园土地就占国内土地的一半以上），同时小农庄也同样在发展（百分之三十二的小农庄的土地只占百分之一的土地）。它们加深了资源浪费：即由于大量的没有生产的庄园的散布，造成了土地和资源的浪费；同时由于把土地分成每两公顷一块来扩大生产，也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现有的结构增加了农村中的失业和就业不足，并使农村长期来生产率很低的问题尖锐化起来。大庄园和小农庄的长期存在，再加上其他因素，阻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以致到了不能对紧密相关的工业发展给以支持的程度。在巴西，根本没有产生真正的"大众市场"；在这个国家里，四千五百万人的

总收入相等于社会阶梯中另一端的九十万特权者的总收入。

受到这样热情接待的外资的入侵，使得现在发达国家中的工业化的“古典模式”和巴西发展过程的特点之间的差别，显得更鲜明了。这些差别，由于外国厂商们带进巴西的技术财富而变得更戏剧性地尖锐起来。事实上，这个制度，由于不能对它的剩余劳动力提供生产性就业的机会，就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不象十八世纪在英国和十九世纪在美国所发生的那样，巴西在工业上雇用的工人同其他部门的劳动人口相比，并没有增加。输入的技术使动力工业的生产力迅速发展，但这里使用的工人却最少：一九四九年，该工业雇用了巴西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八六；到一九六四年，仅增加到百分之八点二六。因此，实际上，今天的工业所吸收的工人数相对地说来，和大发展之前相同。巴西工业部门的收入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和美国相同，而美国却雇用了劳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在巴西的城市里，现代化机械排斥了工人；在农村，大庄园又拒绝给他们工作。其结果，一方面是官僚阶层的膨胀；另一方面，城市里不断增加着的棚户区犹如无底之洞，不断吸收着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人口。

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需求作为工业发展持续前进的动力和支柱的重要性。假如外国投资带来高度技术水平阻碍工业产生更多的就业机会，那末，巴西吸收了进步的技术之后，也仅仅使巴西一小撮人得到好处。城市化运动究竟变成什么样子了呢？农村的就业不足变成了城市的就业不足；有用的廉价劳动力流入城市后却找不到工作，而这个制度所答应给与全体人民的财富只给了很少数的人。据最近的研究，巴西“在今后十年里，可以创造出来的新的就业机会的总数，应该是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但在巴西这个拉美最工业化的国家里，工业所雇用的工人

的总数还不到两百五十万。

当劳动力成为一种结构性的过剩时，工资就会降低，即使生产力也许会提高，但工资还可能继续下降。“依附性”的工业化使收入的集中加强了：生产出来的财富，并没有使整个社会得到好处，而是加强了原有的特权者，并产生了新的特权者。工人们并没有从和他们直接有关的工业增长率中得到好处。社会金字塔顶的最高阶层，摘取了生产力增长的果实；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只苦涩的果子。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六年间，机器工具、电气设备以及交通和汽车等工业的生产能力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八点五，但同一时期工人实际工资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八。还应注意到，这是全部工作人员的工资，在这一时期的工人工资的实际价值只增加了百分之六点一。瓜纳巴拉州是巴西条件最优越的一个州，根据热图利奥·瓦加斯基金会的计算，平均工资很少能达到每月五十美元。

东北部是巴西最贫穷的地区，那里人的寿命很少能超过三十岁，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四年间，工业的就业比重由百分之十二点六下降到百分之八点八。尽管宣传方面放出各种相反的说法，实际上，工业化并没有减轻巴西所遭受的深刻的地区差别之害。既然投资最初就是作为有此需求而被引进去的，它不仅没有使贫困地区有所起色，反而是更增加了巴西东南部的富庶地区（圣保罗、米纳斯吉拉斯、里约热内卢、艾斯比利多桑多）的财富，不可缺少的财政来源也集中在这里。计划部的报告中已经提出警告说：外资的入侵使工业的地区集中化的趋势更加尖锐化起来，并因此更扩大了“发达”地区和“萧条”地区的差距。

安德雷·贡德尔·弗兰克在巴西国内《不发达的发展》的研究中提到，巴西一方面是美国的卫星国，另一方面在巴西国内，它的东北部又担任了作为“国内宗主国”的东南地区卫星国的职

能。两极分化在许多方面都很显著：总投资额（包括国内和国外）的百分之七十五都投向圣保罗，公共投资的情况也一样；而全国所产生的资本，通过不利的贸易、武断的物价政策、不利的税收条例、以及大量占用卓越人才和熟练劳动力等做法，就象通过一个巨大漏斗一样被东南部所据为已有了。这样，就在巴西国内又产生了这个国家所身受的一种国际的统治制度。

（摘译自一九六九年十二月美国《每月评论》第二十一卷第七期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巴西没有奇迹

〔委内瑞拉〕《一周》周刊特别通讯

不用炸弹，不是大规模地惹事生非，而是以敏捷的外交联系、签订贸易协定和巧妙的方法，巴西在拉美继续有条不紊地推进它的扩张主义计划。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巴西总统埃内斯托·盖泽尔同玻利维亚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签订的协议标明了这个方向。玻利维亚将于二十年内每年向巴西提供两亿四千万立方英尺的天然气。巴西将为玻利维亚建设一组工厂，它包括一座年产九十万吨铁和五十万吨钢的钢铁厂，一座日产一千吨的水泥厂和一座日产一千吨尿素的化肥厂。

为了巩固这一"发展的支柱"，巴西向玻利维亚提供的第一期贷款为一千万美元；另外还将提供五千万美元，用作"玻利维亚发展基金，专门开发它的落后地区"。

此外，巴西还承担连接横贯南美大陆铁路的工程研究工作。这条铁路由大西洋沿岸的巴西港口圣多斯通到太平洋沿岸的智利港口阿里卡。同时，巴西在贝伦德帕拉、圣多斯、科仑巴和维利乌港四地开辟"自由通行区"，向玻利维亚开放。

去年，巴西同巴拉圭达成了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协议：在巴拉那河伊塔普地方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工程，今年动工，将于一九八二年发电。

这一水坝的发电能力为一万二千瓩，年发电量六百亿度（原

文如此——译者)。工程负责人科斯塔·卡瓦尔坎蒂(巴西)认为,“水坝将对巴西和巴拉圭的经济立即产生效果”。

这项工程的代价高达三十亿美元,其中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资金由巴西国家电力工程公司提供,其余部分由外国贷款提供。

水库构成一个面积达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人工湖,八百平方公里在巴西境内,六百平方公里在巴拉圭境内。

至于乌拉圭,当军方于一九七三年六月通过J·M·博达维里总统解散议会的时候,巴西银行立即向乌拉圭政府提供三千万美元贷款。反对党代表们曾为三百辆军用卡车由巴西穿越边界进入乌拉圭一事提出指责。在上次乌拉圭政治危机时,巴西人在边界上动员了一万名摩托化部队,举行“绿斗篷”演习。

众所周知,乌拉圭有百分之二十的同巴西接壤的边境省份,现在属于巴西。南里约格朗德州的冷冻厂曾经由于加工从乌拉圭走私进来的肉类而生意兴隆。

巴西政府是第一批承认推翻了阿连德总统的智利军事委员会的。今年三月十五日,盖泽尔上台执政时,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将军访问了巴西,两国政府确认了一致立场。皮诺切特承认是一个拉美“反共轴心”的信徒,而这个轴心是以巴西为首,包括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和乌拉圭。

它们是流星锤两端的铁球,随时可以装配起来当作武器。基辛格学说企图在世界范围内,在美、苏、中、西欧和日本五大力量平衡的基础上保持和平,他的信条是,在“其他地区”(第三世界)留下了一个能保障“帝国和平”的战略。

这一战略的基石是所谓“关键国家”理论。有些在地区政治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国家,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经济潜力、政治影响或军事镇压能力,而被召募去和北美宗主国共同分担责任,

充当帝国中心的宪兵和“警察”。

巴西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印度，罗得西亚等国也渴望享受这种荣誉。

巴西目前政治制度的前辈们，可以一直追溯到一九六四年四月极右派军人发动政变、推翻若奥·古拉特总统的时候。从那时开始了新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它在拉美现正处于全盛时期。

人所共知，法西斯主义不是偶然产生的，它是资本主义垂死挣扎的必然产物。五十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加深了发达国家的富裕和经济上不独立国家的长期贫穷之间的鸿沟。在依附于别国的条件下，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普遍的社会紧张，是统治阶级在自由主义的立宪国家范围内所无法解决的。于是出现了巴西式的解决办法：建立一个极右政府，以便在外国的控制下，为企业家的自由打开一条出路。

这种解决办法，实质上同德意两国垄断资本在两次大战期间为解决产生的问题所找到的办法是一样的。尽管巴西政府的依赖性比任何一个欧洲模式还要深刻。

古拉特总统不是共产党员，而是从来没有违背本阶级利益的几个大庄园主之一。他为了保护本阶级利益免于全面崩溃，采取了一些温和的改良措施，以减轻过于贫困落后的群众的负担。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〇年库比契克的发展主义政策遭到彻底破产。受发展主义推动的现代派垄断资产阶级同非常落后的农业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把巴西经济搞得支离破碎。这样，就迫切需要为工业垄断集团和金融资本开辟新的市场，保证投资场所。

工业化过程碰到了陈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这一不可逾越的障碍，它不可能为工业开辟一个新的国内市场。古拉特曾经建议“通过收入的再分配来繁荣国内市场”。他主张极其温和的土

地改革，并给无产阶级组织以有利的条件。此外，还倾向于控制利润外流。一九五一年，热图利奥·瓦加斯在一次题为《可怕啊，巴西人！》的讲话中曾经说过，这种利润有时竟高达资本的十倍。

上面的情况，就已经足够使现代派垄断资产阶级和大庄园主结成联盟，并依靠军人的力量推翻古拉特政府。

巴西军人的政变表明，用资产阶级民主来解决拉美的社会经济问题，显然是要失败的。三十年来的情况就一直如此。

在巴西军人政权统治下，劳动人民的实际工资急剧下降；在小工商业破产的同时，形成了经济的高度集中，对工业劳动者的剥削加剧了；工业转为外资经营，对外资敞开了大门，为榨取利润汇往国外提供了一切方便。真是外资企业的自由天堂！前财政部长德尔方·内托说："我们愿意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发展我们的国家。我们有信心认为，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企业自由这样一种制度着手。"

为了使这个"经济奇迹"运转起来，只需要装上几个零部件：粉碎人民的一切反抗，把国家变成一个监狱，枪毙革命领导人。这一切都做了。

一九七四年三月，当加拉斯塔祖·梅迪西将政权移交给盖泽尔时，曾对"奇迹"带来的成果作过一次总结：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从一九六九年的百分之九上升到一九七三年的百分之十一点四；在这四年中，按每人计算的国民收入增长了近百分之四十，从四百二十八美元增长到五百三十美元（实际只增长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译注）；同期的出口总值增长三倍（一九七三年达六十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从一九六九年的四十三亿美元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一百二十二亿一千四百万美元。

另外还有"奇迹"：发电量增加百分之五十八以上，工业总产值增加百分之十六以上。

这首赞美诗掩饰了某些令人烦恼的资料：盖泽尔上台时巴西外债超过一百三十亿美元(比两年的净出口总额还多)，预计到他下台时还将再增加三倍；一九七四年巴西应付外债近三十七亿美元，而进口燃料的支出占出口收入总额的一半。

巴西经济由于它的依附性而产生的可怕的外债，仍旧是他所鼓吹的“奇迹”的薄弱环节。国家陷入了外债支付的恶性循环中，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螺旋形，借债愈多，要偿还的利息和旧债的到期部分也愈多，为了偿付利息和到期的债款，新债也就愈欠愈多。

但是，官方公报里的赞美诗并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这样的“奇迹”究竟对谁有利？能够加入巴西特权者俱乐部的人数只占巴西人口的百分之五到十。其他的人怎么样呢？看了一些资料后，会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巴西是经历了一场“经济奇迹”，还是遭遇了一场大灾难？百分之二十的巴西婴孩不到周岁就死去，有一半的小孩不到五岁就夭折。照这样的死亡率，可以说全国的人口将在两代人期间都会死光；小孩的死亡每四十秒钟一个，每小时八十五个，每天二千零四十个。

怪不得女作家伊冯纳·让发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还记得一九四〇年的闪电战吗，它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杀害了这么多人？记得纳粹在欧洲屠杀人类时所经历的一切吗？而在和平时期的巴西，每年饿死的小孩比上一次战争中死于纳粹炸弹下的总人数还多。要是我跟你们这样说，你们会相信吗？”

住在贫困地区的一千三百万巴西人穿不起鞋子，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地区，一个工人每月的工资不够买一双鞋子。一千一百万人挤在有害健康的房子里；五百万人挤在没有卫生设备的住房里。

巴西人平均寿命是四十六岁。但在东北地区的人，平均寿命

只有二十七岁。一亿人口的半数患有结核病，通常每年死于结核病的有十万人，没有什么“奇迹”可以挽救他们。

美国终于发现“巴西模式”这一特效药，它能遏制拉美各国继古巴革命以后到处掀起人民运动的高潮。既然“和平革命”已经行不通，为什么不用“流血的反革命”呢？既然这个模式在巴西推行了，就应该向其他国家输出。

巴西是这个地区实施这一战略的“地区领导者”。它不仅具备各种政治条件，而且，巴西的发展要求它在国外寻找市场和投资场所。这个“准帝国主义”为发展跨国公司充当向导，而对邻国中任何要求解放的意图，则扮演着宪兵的角色，进行镇压。

拉美人民运动的高涨同推行“巴西模式”是相关联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托雷斯的民族主义的玻利维亚，变成了班塞尔的法西斯政权；图帕马罗斯（城市游击队）和“广泛阵线”的乌拉圭，变成了这一国家历史上最残酷的镇压；阿连德的人民智利，变成了在拉美前所未闻的大规模惨杀。所有这些，巴西在不同程度上都参加过干预。这就再次确立了它的仆从地位同放手推行企业自由政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巴西的对外扩张象影子那样跟随着上面所讲的过程，根据著名作家保罗·R·希林在蒙德维的亚《前进》周刊上的分析，巴西对玻利维亚的渗透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巴西情报机关参与一九七一年八月推翻托雷斯的政变，它们同武装叛乱分子一起策划，提供经费并参加领导，在这次叛乱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接着就开始第二阶段。正象玻利维亚前国防部长路易斯·R·特兰将军指出：“托雷斯一下台，巴西飞机马上飞来，但这次运来的不是巴西的武器，而是商人。”巴西投资家们在玻利维亚变得时髦起来。巴西银行连同它的拉巴斯和科恰班分行，变成

玻利维亚生活中的权力因素。

事实上的占领玻利维亚领土是与此齐头并进的。庄园主和垦殖农从南面进入(特别是到具有战略意义的圣克鲁斯省,那里有铁矿、牧场、石油)。橡胶工人从北面进入玻利维亚的亚马逊河区。阿克雷州联邦警察局局长说,单是他的辖区,就有六千户巴西人迁往玻利维亚境内。

渗透的第三阶段从两国总统签订协议时开始。协议导致玻利维亚全面地和确定无疑地并入巴西。希林的文章说,"如果计划实现,玻利维亚就从属于巴西经济,以致连民族都不存在了。"

巴西目前在玻利维亚推行的计划,就象在巴拉圭吃掉伊塔普水坝事件一样,还追求附带的好处:孤立阿根廷,敌视秘鲁政权。

大西洋-太平洋铁路将使巴西军事战略家们的旧梦如愿以偿,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控制这两大洋,巴西就无法成为世界强国。不仅如此,铁路还加剧了玻利维亚对出海口的要求,使它同秘鲁发生冲突。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纽约时报》认为:"巴西在南美洲扩张最明显的例子是乌拉圭,它的民主于一九七三年六月被军人按照巴西的样板消灭了。从那时以来,工会、报刊和民主组织都被取缔或镇压掉。"

《纽约时报》还说:"今天,巴西投资家们在乌拉圭特别忙碌,购买土地,控制商业。巴西在乌拉圭渗透时所碰到的障碍甚至比在玻利维亚还少。"

尽管如此,巴西最大的收获还是在智利。皮诺切特向一位巴拉圭记者宣布:"一个国家缺少的东西,另一国家有。一个国家人口稀少,可以由人口众多的邻国来补充。为了降低成本就需要大量的消费者群众,同完全有能力对付共产党危险的南美超级大

国联合，就可以实现上面所讲的一切。”不难设想，皮诺切特在他的巴西利亚之行时提出，巴西是法西斯国际的领导力量，并把它吹捧为超级大国。众所周知，这是很久以前美国所孕育的一个理想。

（摘译自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二日到十八日委内瑞拉《一周》周刊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巴西的外援

〔美〕伊斯雷尔·约斯特

近年来，大量的“发展”援助注入了巴西，这并不仅仅是一个适合巴西发展规模的现象，而是美国和它所控制下的国际援外机构给予军人政权无条件支援的策略问题。单以一九七二年来看，三个这样的机构对独裁者就给了十亿美元以上的贷款。与此同时，对智利的民选政府的外援渠道，却几乎已完全关闭。巴西有个世界上最压制民主的政府，不管这种情况是多么彰明昭著，美国政府仍继续认为巴西是最有资格接受外援的典型。

在详细研究最近十年来巴西外援的历史和性质之前，我们应先了解一下这种援助的目的。不管那些有关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的说法多么天花乱坠，而大部分美国对巴西的援助却从属于以下这三种主要任务。

(1) 为美国公司的各种活动（输出、航运和国外投资）服务。这不是只限于对巴西的情况，而是和美国全球援外计划完全一致的。

(2) 充分支持巴西的军人政权。在暗中破坏古拉特政府和支持一九六四年的政变之后，美国毫不动摇地给将军们为保持他们自己政权所需要的支援。

(3) 加强巴西作为拉美宪兵的地位。援助是美国鼓励巴西成为在南半球有坚强武装力量的“准帝国主义大国”所采取的各种措施之一。

援助政策

从援助巴西的历史，可以完全看清楚美国援外工具的政治性质。当美国在一九六一年发起争取进步联盟的时候，巴西立即成为援助策略中的主要国家。诚然，巴西的东北部是被肯尼迪政府选为争取进步联盟最主要的区域目标。结果是，国际开发署在累西腓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国际开发署唯一的地区性办事处），以补充里约热内卢的使团，并应允以一亿三千一百万美元作为基金来开发东北部。

国际开发署的计划设想，是作为巴西东北部开发管理局的补充而进行活动的。在国际知名的巴西经济学家塞尔索·富尔塔多的领导下，东北部开发管理局展开了一个开发东北部的长期性综合计划，越过由地方政府庇护下的地头蛇，来探索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在富尔塔多看来，国际开发署根据这个开发计划中的一些设想，通过东北部开发管理局来实现它的援助。

但美国却有另一种看法。虽然名义上是通过东北部开发管理局的计划从事活动，但美国使团却更关心在东北区域城乡中日益增长的民粹派运动。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对计划承担过任何真正的义务，对长期开发也只有文字上的兴趣。为了消除东北部的进步运动，美国使团把注意力集中于制订抵制该区域共产主义影响的“弹压”计划。美国的计划是要同州政府合作建立一个成效显著的短期计划，避开东北部开发管理局，并阻碍区域发展政策的实现。这些“合作”的州政府同样是现状的坚决维持者，他们在贫困的东北区域已统治了不少年了。实际上，他们要求美援，也是为了猛烈反对古拉特政府以及在它后面动员起来

的人民力量。

在这些“弹压”计划中，最主要的也可能是最有政治意义的，是在伯南布哥州的学校建设计划。国际开发署负责教育的官员们认为，初等教育的问题主要是课程和师资培训问题，而不是设备问题；但美国使团不顾这种反对，决定要建造校舍，作为美国在这个区域存在的戏剧性的象征。为了要让伯南布哥州长希德·桑帕伊奥担任东北部的“民主”代表，国际开发署设计了一套计划，来协助桑帕伊奥这个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获胜。希望用这样的帮助，来阻止以累西腓为中心的民粹派运动首领米格尔·阿赖斯参加竞选。国际开发署的这种企图并没有成功，阿赖斯终于当选了；但这个初步设计，却为国际开发署在一九六四年政变前的大部分努力定下了基调。

对州长们的贷款并不只限于在东北部使用。当美国政府对古拉特的左派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不满时，援助（及其撤销）成为破坏古拉特地位的主要工具。一方面，巴西联邦政府担负着过去政府留下来的大量债务，但美国却断绝了对它的一切援助（美国进出口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停止了对它的贷款）。另一方面，美国同许多在政治上反对古拉特政府的州长们商谈支援协定，不管他们的力量是否能达到争取进步联盟所述的财政和政治要求。这个所谓“明智的群岛”政策，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孤立古拉特，并表示美国赞成对联邦政府夺权的任何运动。因此，当军人们于一九六四年四月掌权时，美国的援外官员们既不惊异也不失望。

美国毫不犹豫地决定对新军人政权提供款项：在政变后的两个月中，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就签付了五千万美元的计划性贷款。国际开发署的其他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协定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签字的，同时进出口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也迅速地恢复了它们对巴西的贷款活动。

应该注意到，美国政府总是表明它之所以停止对古拉特的援助，纯粹是为了财政关系。主要论点是，因为古拉特政府没有充分地承担责任，采用必要的严厉手段，如紧缩预算和管制工资等，来阻止通货膨胀，因而援助必须停止。同样，因为新的军人政府对这些办法承担了强有力的责任，所以援助必须迅速恢复。但是，这一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以及最近美国官员们的谈话，使大部分观察者得出结论，美国的援助政策是根据政治的考虑，而不是财政的考虑。如果对这还有什么疑问，只需要研究一下一九六八年的一件类似的情况就够了。在那时，不管这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存在着多少的问题，仍应允了军人政府一亿美元的贷款。当有人问到这项贷款的情况时，国际开发署的官员回答说，为了"美国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贷款标准必须"放宽"。

就是为了这个"压倒一切的政治考虑"，除了国际援外机构的约十五亿美元贷款之外（每个机构的具体数字见附表），自政变以来，美国又迅速地对军人政权注入了二十亿以上的援助。更有进者，作为国际金融看门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这个政权连续签订了八次援助协定。这些机构，没有任何一个认为巴西政府所采取的一些镇压措施，足以成为减少或取消对巴西援助的原因。

令人不注目的形象

那末，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有一些同美国双边关系的贷款，已经用于巴西的广大军事和政治设计中。本文所着眼的只是那些争议少，但同样是重要的经济援助计划，这些计划构成巴西外援的主要部分。

巴西的外援，1962—1972（财政年度，以百万美元计）

机构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总计 1964—72
美国国际开发署	85.1	86.5	179.5	234.9	243.7	214.9	193.8	12.4	88.0	79.4	9.4	1256.0
"第480号公法"(美国粮食用于和平计划)	72.5	47.9	150.9	24.6	79.1	21.6	82.9	10.4	62.4	40.6	n.a.	472.5
美国军事援助(各种类型)	49.6	17.5	41.2	11.2	28.9	32.1	36.6	0.8	0.9	12.2	n.a.	163.9
美国进出口银行("长期贷款")	—	—	—	6.0	16.9	30.0	50.8	27.9	65.6	74.0	n.a.	271.2
世界银行	—	—	-	79.5	49.0	100.6	61.9	74.9	205.0	160.4	437.0	983.8
国际金融公司	—	--	—	—	11.0	10.7	—	9.4	8.4	10.9	27.5	77.9
泛美开发银行	25.6	18.6	25.8	80.4	87.3	125.7	76.9	99.8	160.6	119.9	n.a.	776.4

来源：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海外贷款和赠与，1945年7月1日到1971年6月30日》(华盛顿特区；1972)。关于1972年时期的可得到的数字，来自表内机构的年度报告(n.a.意指得不到数字)。

备注：1964到1972的总计，代表给予军政府的援助总额。

国际开发署约半数的款项，是以计划性贷款的形式出现的，有五亿五千万美元包括在政变后的紧急贷款中。这些贷款主要是给政府供应外汇（即美元），并用这些外汇来输入美国商品。国际开发署的其他款项是给工程的贷款，这类贷款是专为指定的开发事项准备资金——在巴西的情况下，是指定用于基建工程的发展。有一些贷款是用作技术援助赠款和别的专门计划，但数目很小，效果也很难估计。

在六十年代中期，国际开发署的贷款计划相对地少了，但从其他机构来的款项却迅速上升。例如一九七二年，巴西超过了日本，成为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最大借款者（超过二十六亿美元），同样也成了世界银行的最大债务人。世界银行在一九七二财政年度贷给巴西的总数为四亿三千七百万美元，较它贷给全部拉美的九亿五千六百万美元的百分之四十五还多。此外，巴西向私人银行的借款也增加了。一九七二年，巴西在欧洲发行了三千万美元的公债（这是欧洲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第一次的国际性贷款），最近又从日本财团获得了两亿美元的贷款。

关于筹措基金来源，由美巴的双边关系向国际方面的这种转变，使美国国会更加难以检查和批评美国对巴西的援助政策。当参议员丘奇就“美国对巴西的政策和计划”举行听证会时，他一再听到关于削减美国在巴西的援助计划的说法，好象美国对该政权的财政援助已不再是重要的了。但是援助依然存在，而它是通过国会难于控制或者不能控制的机构来进行的。

购买美国货

美援的一个根本目的是帮助美国的商品输出，这主要是通过对援助的“限制”使用来完成的。例如，对巴西的种种计划贷

款中提供的全部美元，必须用于购买美国货物，即使在别处能买到较便宜的货物也不行。帮助美国商品的输出，而不是帮助巴西的发展，这似乎是国际开发署主要的考虑。

对美国商业的资助，还扩大到出口商以外的航运业。援外法案规定，由国际开发署贷款所买的货物，其中的半数必须由美国船只装运，而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运费。就国际开发署一九六四年给巴西的一笔供作肥料进口的贷款来看，美国船只的运费要超过别国船只运费的两倍。巴西进口商当然不愿意支付这样昂贵的运费，但巴西政府为了能够利用这笔贷款，表示愿意支付差额。然而当时又缺乏美国运输船只，使得究应怎样恰当地装运这批化肥的争论更加复杂起来了。在达成协议之前，播种季节完全错过了。一九六六年又谈判了一笔两千万美元的肥料贷款，由于估计到贷款中的四、五百万美元将用于资助美国的航运业，巴西人就决定把这项贷款取消了。

关于巴西当前钢铁发展计划方面的争吵，是援助更多地是为了贷款者的利益而不是受援国需要的最显著的例证。巴西打算在五年期间把钢产量翻一番，这一巨大的计划需要有五亿美元的贷款。巴西政府欢迎世界银行提供这笔贷款，因为它在国际上竞争的投标肯定会使成本较低，还因为世界银行会提供更多的辅助设备贷款。美国的供应者们（如威斯汀豪斯），知道他们会在公开投标中输掉，坚持要由进出口银行提供这笔款项，以保证美国公司得到这些承包合同。进出口银行声称它是理所当然的资金提供者，因为它已经在巴西钢铁工业方面投资了一亿五千万美元。

当争吵加剧时，《商业周刊》报道说："世界银行渴望得到进出口银行的一片馅饼"。并指明："这是关系到美国或外国公司将为这种发展出售约值一亿两千万美元的器材和工程劳务的生命

攸关的问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宣称："尼克松将会调停这一争执。"看来这种争吵似乎和巴西所需要的并无关系。这一争吵，通过包括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和其他供应国的基金输出机构等在内的妥协，采取大家都分到一片馅饼的办法，才最后得到解决。

援助跨国公司

对美国公司的支持并不只限于它的出口商和航运业，它的海外子公司或许是这种援外制度的最大受益者。进出口银行，是一家旨在特别促进美国输出的银行，它经常使设立在海外的美国子公司得到这种信贷。例如，一九七二年财政年度，在巴西的固特异轮胎公司除从花旗银行得到一笔由进出口银行担保的四百二十五万美元的贷款外，还从进出口银行得到一笔同等数额的贷款，以扩建它的轮胎工厂。福特、杜邦、欧文斯-康宁、伯利恒钢铁、汉纳矿业和联合碳化物等公司的巴西子公司，在以往几年中同样从进出口银行得到了好处。

国际金融公司是世界财团的组成部分，在包括跨国公司的多种经营冒险中，专门研究"开发"基金的投放。美国的一些大公司为了它们在巴西的经营曾接受过国际金融公司的资金援助。

在某种意义上说，进出口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这两个机构，把货币投放到这些大公司并不是出人意外的，因为这或多或少就是它们的目的。不管怎样，国际开发署对于那些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国家的发展，有着一项理应承担的义务。多年来，国际开发署一直在设法援助巴西的一些美国公司。

对美国公司来说，汉纳矿业公司可能是说明援外的政治和经济价值的最好例证。在六十年代初期，汉纳在巴西的营业是

亏本的，主要是因为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的阿瓜斯克拉拉斯铁矿缺少开矿所需的铁路和港口设备，要求解决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投资，却遭到巴西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汉纳公司的最重要的对手之一，是巴西国营铁矿企业的多西河谷公司，该公司坚持应由它来开发在阿瓜斯克拉拉斯的矿床。这一纠纷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争端。从当时的情况看来，汉纳公司肯定会丧失了它的特许权。

然而，在政变后，卡斯特卢·布朗库政府颁布了一项新采矿法，它为汉纳公司（也为其他跨国公司）开发该矿床及供应必需的设备扫清了道路。多西河谷公司的反对，被泛美开发银行的一笔两千八百八十万美元的贷款所窒息，这笔贷款大约是在宣布新采矿法的同一时间签订的。正象一位细心的观察家雷蒙德·米克塞尔所承认的："可以想象，布朗库总统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法令，为获得这些信用贷款选择了时机……"。《幸福》杂志有点更加夸张，把拯救了汉纳公司的投资的政变，比作是"被第一骑兵师最后一刹那的营救"。

除了这些政治上的花招之外，汉纳公司还一直设法从世界银行获得直接的贷款援助。一九七一年，世界银行董事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宣布了一笔供阿瓜斯克拉拉斯铁矿经营用的九千六百万美元的贷款。

建造所必需的东西

虽然，这些对美国公司的直接贷款表明了谁从这种援助制度中得到了真正的好处，但是，对巴西援助的绝大部分都被用于国家的基本建设，主要是电力和运输设施方面。在巴西，电力部门是贷款的最大接受者。国际开发署对电力工程贷款一直是为

数众多的和大量的，而且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泛美开发银行曾提供了约两亿四千万美元的贷款，包括在其历史上居第二位的最大贷款——一九七二年为伊尔阿·索尔特里亚水电厂提供七千万美元。世界银行曾投放了一笔七亿五千万美元的补充贷款，而且进出口银行也曾为进口美国电力设施器材提供过资金，包括给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一座原子能发电厂提供的一亿三千八百万美元。

大量的援助款项也投入了运输设施，主要是用于筑路。这些用国际信贷建造的道路，贯穿全国，把巴西的各个地区联结在一起，并把许多和它有着共同边界的国家衔接起来。这些道路，对于开发埋藏在巴西更加偏僻地区的有用的自然资源极其重要，这种开发主要是由外国公司进行的。

修建全国公路网的另一个目的，是要加强巴西现政权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全国一体化（修建道路是其中一个决定性的部分）的一项重要作用，是为了转移全国（和国际上）对该政权政策的残暴和不义行为的视线。这些道路在军事上也是重要的，它可以为军队提供既可到达全国各地，又可到达大部分其他拉美国家的现成的通道。尤其是，在巴西南部和乌拉圭之间行将（用泛美开发银行的四千七百万美元的贷款）建造的道路，一旦乌拉圭有左倾的趋势时，为巴西的入侵威胁提供了更加现实的可能性。实际上，在一九七二年二月乌拉圭选举期间，巴西军队确曾集结在乌拉圭的边界上，因为在这次选举中有左派人士弗伦特·安普里奥参加。

另有一项重要的援建工程是美国公司颇感兴趣的。就是在巴伊亚州阿拉图地方的工业区，建设一个深水港口。在该工业区内有美国氰胺公司、美国人造丝公司、艾利斯-查默公司、联合碳化物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孤星水泥公司等。

这些美国公司将发现泛美开发银行投资修建的这个港口特别有用。它们都需要这样一个港口为设在这个工业区的冶炼厂装运矿石。

甘愿负债的同盟者

看来可能出人意外，巴西用它从美国和国际开发署所得到的援助，建立了它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援外计划。巴西近来已向许多拉美国家提供了近八千万美元的信贷，而且将来还会更多。鉴于援助是为援助国输出服务的手段，对巴西来说，“援助”本半球更加不发达的国家几乎是很自然的。例如，贷给玻利维亚的大部分款项（有两千两百五十万美元，是最大的受援国），将被用来购买巴西的资本货物和机械。对玻利维亚的这种援助，将有助于加强它们同推翻了左倾的托雷斯将军政府以后玻利维亚班塞尔政府之间的关系。镇压人民的班塞尔政府酷似巴西的政权，它为巴西提供了一个反对智利社会主义政府的友好的缓冲地带。因此，在援外方面，如同许多其他领域一样，巴西在拉美正担任着准帝国主义大国的角色。

还必须指出，巴西在接受如此巨大的援助数额的过程中，已经负了一笔庞大的外债。巴西政府的外债（由政府或政府的某一机构借用或担保的），在一九七〇年底已近四十亿美元，而且还在迅速不断地增加。同私人欠的外债合在一起，这笔总债务是如此之大，以致巴西外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正好为偿付这笔债务的本息。

这笔债务不仅在巴西当前的外汇收入上加上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如果现政权被一个更加进步的政府所取代，这笔债务将来可能成为美国债主手中的一根大棒。人们

只需看一看智利今天的例子，一个政府是怎样被前政府的债务所困扰的，以及外国债主是怎样利用这种债务来压迫甚至颠覆一个进步的政府就够了。

那末，美国从它倾泻到巴西的所有援助中最终又得到了什么呢？它得到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大而顺从的同盟者，这个同盟者时刻准备着执行它的命令。当肯尼迪的顾问 A·A·伯利，在一九六〇年提出要给夸德罗斯总统三亿美元的援助以换取巴西对猪湾入侵的支持时，夸德罗斯强烈地拒绝了，并把伯利送返机场，甚至连惯常的陪送礼节也没有。但是，在一九六五年时，约翰逊的遭遇较好，当时布朗库政府欣然派出了巴西的军队去帮助美国占领多米尼加共和国。因此，谁能说争取进步联盟已经失败了呢？

（摘译自一九七三年四月美国《拉丁美洲和帝国报道》杂志　复旦大学历史系拉丁美洲研究室译）

巴西的实用民族主义

〔美〕潘友苏

埃内斯托·盖泽尔政府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世界范围的能源危机和滞胀中，寻找出路以维持百分之十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时采取果敢的步骤扩大政权的政治基础，最后恢复政治民主。这个任务是不轻松的，但是，盖泽尔政府下决心要维持持续的经济增长，甚至不惜对内政和外交政策作出重大的改变。一九七四年不仅是从一九六四年四月开始的十年军事统治的结束，同时也是走向实用民族主义和"逐渐放松"的独裁主义，从而有利于和缓的和自由的政治秩序的新时代。

热图利奥·瓦加斯政府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期间，决定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扩大军方势力，此后，军方首脑们就难以从国家政治中完全脱身出来。在动乱的五十年代和无政府状态的六十年代中，军方常常通过集体的或个人的方式对历届政府的政策表示反对，但在一九六四年时，当这种干预方式被证明还不能满足军方的要求时，军方首脑们即推翻若奥·古拉特政权。在巴西历史上军方所遇到的问题再没有比在一九七五年所遇到的能源危机问题更重要了。它威胁着百分之十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基础。在一九七四年巴西的对外贸易出现了七十亿美元的赤字，主要因为石油价格提高了三倍。

鉴于能源开支的剧增，巴西不得不对它的发展政策重新加

以考虑，从传统的亲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到依靠跟外国、主要是跟美国企业订立合同来开采石油的政策。

一九五三年瓦加斯通过了“2.004”法令，规定石油开采由国家垄断，石油开采问题在法律上已经解决了。但是，由于缺乏技术和资金，迫使瓦加斯政府引进外国公司参加石油开采。这就使“2.004”法令无法执行。石油问题使不同哲学信念的经济和社会阶层，包括两个政党，执政党全国革新联盟和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配合起来了。由于石油问题在国民经济中的显著重要性，盖泽尔政府已被迫逐渐采取新的、更为民族主义的、独立的外交政策，从而在许多事件中同美国产生分歧。这种使巴西在国际政治上谋求新的地位的企图，使技术专家和将军们紧密地联合起来制定他们的政策，巴西的声音现已举世皆闻了。

在一个新的实用民族主义道路上，负有领导巴西的历史使命的人是埃内斯托·盖泽尔总统。他是日尔曼人血统职业军人的后裔，出生在意大利殖民地格兰德河的本杜冈考夫斯城。他是这个城的公证人奥古斯多·盖泽尔的第五个也是最小的孩子。他好象是一个孤独的人，从小就离开他的哥哥们。他只和奥尔兰多一同到波尔多·阿里格尔一个军事学院学习。在三十年代初，埃内斯托在瓦加斯政府中任巴拉·伊巴州的财务秘书，后任北格兰德州的内政秘书，这两个州都是贫瘠的东北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埃内斯托在美国堪萨斯州的美国陆军参谋和作战学校学习，战后任乌拉圭的陆军武官。

埃内斯托·盖泽尔将军和若来次·泰瓦拉元帅、哥尔倍里·卡脱·席尔瓦将军都是巴西军事学院的创始人。一九六四年革命以后，巴西军事学院所训练的民族主义官员有机会对政府施加影响。就在这时，卡斯特卢·布朗库选拔盖泽尔为他的陆军参谋长，这就把他提拔到继承人地位。

一九六七年盖泽尔的政治光芒衰退了。在继承问题上，他反对国防部长科斯塔-席尔瓦作为总统候选人。因为席尔瓦只是一个普通的高卓人（高卓人是南美洲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译者）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同志。席尔瓦的当选，迫使盖泽尔辞去现行职务；后来，他被提名在无实权的军事最高法庭任职。一九六八年第五号制度法的颁布，给予席尔瓦独裁的权力，而总统的突然生病改变了盖泽尔的经历。

一九六九年十月以后，总统继承人埃米略·加拉斯塔祖·梅迪西将军邀请盖泽尔担任巴西石油公司总经理。盖泽尔因血管动手术后，刚恢复，不愿接受这项任命，经梅迪西的一再坚持，才担任了巴西这一最大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在新的总统内阁内，其兄奥尔兰多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盖泽尔在巴西石油公司总经理任内，由于经济迅速发展，他开始为石油公司筹划一个新的有力的发展计划以扩充国内沿海油井和创办巴西石油公司的国际子公司。盖泽尔为巴西石油公司重行制订了行动方案，以适应巴西在变化中的需要。

一九七三年六月，梅迪西总统指定盖泽尔为他的继承人，这就建立了自一九六七年起高卓人三任总统的朝代。一九七三年九月执政党全国革新联盟全国会议批准了这一任命。同前两任总统（席尔瓦和梅迪西）不同，对盖泽尔的任命，支持者和反对派都表示同样赞成。一九七〇年七月，在一次出席联邦议会听取石油政策时，盖泽尔发出了一个石油公司政策重大转变的信号，这个公司增加了施工预算一百三十亿克鲁赛罗，开创了历史最高纪录，并分别从英国和美国获得了三千三百万英镑和一亿美元的贷款，扩大了工程并获得支付进口新技术的资金。这样终于扩大了零售的石油化工产品和精炼石油产品的产量。盖泽尔经营的石油公司雄心勃勃地推行了在各城市设立联号服务站

的措施。有时，政府还颁布法律，迫使一些外资服务站迁出它所选择的地点，以支持巴西石油零售站的设立。

这种民族主义政策博得了巴西人民的赞赏。盖泽尔在国营公司的职务使他赢得了经济上的民族主义者的信誉。他的十三名内阁阁员是根据过去在政府任职期间的功勋而选任的，十三个阁员中大部分是来自各级的专家。最重要的财政部长职位是由著名的经济学家马里奥·恩里克·西蒙森担任。这个选择，部分是要使外国投资者放心，巴西仍继续接受外国资本；同时，也为了不使它们对盖泽尔产生过分怀疑，因为他在巴西石油公司推行的政策可能导致在政府里做出一些仇外倾向的决定。

盖泽尔内阁中的“超级部长”哥尔培里·卡脱·席尔瓦将军，是盖泽尔在巴西军事学院时期的老朋友和思想体系相同的伙伴。在卡斯特卢·布朗库政府时，哥尔培里是国家情报局的创始人和第一任的头子。国家情报局名义上是直属于总统的军事情报机构，但它的真正职能则是执行保障国家安全的计划。同时，侦察军队内的反对派。作为一个在地理和政治学科有成就的学者，哥尔培里是以军事学院思想之父而闻名的。在五十年代冷战声中，国家情报局开始更加注意各种和国家利害有关的政治、经济问题。由于这种才能，哥尔培里先后为布朗库和盖泽尔所器重，以提供为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理论体制。

对政府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一致承认经济增长的动人纪录。现已普遍视为“巴西的奇迹”的这一事实是军事和技术同盟存在的理由。在仔细研究政府的成就中，批评者提出谴责说，奇迹的成果主要为上层阶级所占有。外国资本家们是奇迹的主要受惠人。梅迪西的农业部长寇英·里马在一九七三年辞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批评者提出现政权必须解决的两项突出的争端是：在各阶级中对国民收入进行公平的

分配；寻求可接受的政治改革以恢复政治民主。

根据瓦加斯基金会所发表的数字，巴西工人的实际工资指数从一九六〇年的一百零六下降到一九七二年的七十六。

虽然下层阶级（工人）已因收入下降而遭受贫困，而上层阶级（巴西和外国公司的老板）的收入却增加了。一九六〇年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五的上层人士获得了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点四，而一九七〇年则获得百分之三十六点三，增加了百分之九。同一时期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四十的下层人士，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从一九六〇年的百分之十一点二下降到一九七〇年的百分之九，下降了百分之二。

由于外国和国内公司是国民收入不平等分配中的受益者，因此，批评者都指责一九六四年以来的政府方案仅对资本家有利。瓦加斯基金会研究巴西的五十家大公司中，一九七〇年的二十家最大的企业中有两家是巴西的私营企业，但在一九七三年这两家企业已为国营公司所代替。巴西私营经济部分从五十家大公司中消失了，而外国公司却更为获利，国营公司仍旧维持不变。

巴西当前的五年计划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石油问题。盖泽尔比他三个前任更加了解石油在巴西经济中所起的平衡作用。在军事机构中，他作为石油问题的权威，在一九五七年国家石油委员会中担任国防部的代表。在那时，他仅仅是一个上校，但他已开始认识发展能源是巴西走向工业化的首要步骤。他不象哥尔培里，他没有发表对国家安全和发展的任何更深刻的见解，以及它们对石油的特殊关系。但是，他对能源危机的立场是无可怀疑的。

在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四年的石油禁运中，政府又面临能源自给的老的争论问题。它加强了盖泽尔和军事学院对石油及

其他自然资源方面所持意见的立场，也间接地促使巴西各阶层团结在现政府的周围。巴西石油公司一直未能生产足够的石油以满足巴西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

根据五年计划，巴西每年要进口所需石油的三分之二或国家能源消费的百分之四十八。此外，在过去，巴西进口石油的百分之五十是来自阿拉伯。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到六月间，巴西进口了一亿一千三百四十万桶石油，耗费资金十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说，一九七四年七月，巴西有外汇盈余六十一亿六千二百万美元，除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外，在拉丁美洲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但在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巴西有二十五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根据财政部长西蒙森说，到一九七四年底逆差可能达到五十到六十亿美元，而外国在巴西的投资将在四十至五十亿美元之间。为了减少公众的恐惧，并对巴西经济树立信心，西蒙森创造一个新词"小震动"来描绘当前巴西所处的困境。和乐观主义相反，巴西的将军们和技术专家们采取了修正措施以避免迫在眉睫的危机。

巴西的经济需要用双重手段来改正旧的政策和建立新的政策以阻止"小震动"变为"大震动"。首先，巴西必须有效地获得燃料和其他原料以供应它的经济需要，从而可以维持目前百分之十的经济增长率。要这样做的话，盖泽尔政权必须改正它的传统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中东和拉美各国以及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一九七四年巴西希望从两个阿拉伯国家进口它需要的百分之六十的石油（从沙特阿拉伯进口百分之四十，从伊拉克进口百分之二十）。巴西的一个出乎意外的新的石油供应者是苏联，它同意在一九七四年八月至十二月间，售给巴西五十万吨石油，占巴西需要量的百分之四。

巴西对石油的需要和对阿拉伯国家的依赖，迫使盖泽尔政

府改变它亲以色列的政策。在沙特阿拉伯外交部长正式访问巴西后，这一点就更加明确了。巴西外长锡尔委拉宣布，巴西原则上一贯反对任何军事占领别国的领土，并主张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它要求以色列撤出占领的土地。这一政策的突变是取得阿拉伯国家石油供应必需的条件。因此巴西变得更为实用主义了。虽然它的行动还必须遵循在不损害别国的情况下，使自己获得利益的原则。西蒙森坚决主张五年计划完全补充了新的中东政策，而这样的改变，好象在更多的方面都需要。除石油外，巴西还要吸收石油美元。不管怎样，阿拉伯国家参与巴西的经济发展导致对以色列政策的改变，这对五年计划的完成是非常有益的。

随着巴西采取新的"负责的实用主义"对外政策的同时，它也逐渐地改变了在一个时期内的那种恶毒的、强烈的反共姿态。它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获得市场。现在就断定说，巴西由于对外政策的改变将必然导致在内政方面对左派作相应的改变还为时过早。但是，由于依赖的增加，共产党集团国家将试图迫使巴西作出改变。一九七四年八月中，巴西同中国正式互相承认，并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商业机构升级为大使级。巴西的商人和政府官员还数度访华，使他们相信这一改变是必要的。在七月，甚至早在葡萄牙之前，巴西承认了几内亚-比绍的独立。迫使葡萄牙不得不跟上。这一行动无疑使巴西在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者中深受欢迎。盖泽尔对外政策的另一个坚定转变的标志是在中东建立了五个大使馆。

一九七四年九月初，巴西石油公司和利比亚签订石油开采合同。这个合同要求巴西在以后五年内投资三千五百万美元。一旦发现石油后，百分之八十五的石油归利比亚，百分之十五的石油运往巴西。按照这一合同规定，巴西支付石油的价款是不

大的。

通过这种实用主义的行动，巴西希望在世界上开辟更多的市场。一九七四年十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出口商会议要求盖泽尔和他的主要经济顾问制定出发展巴西出口的政府计划。世界范围的经济滞胀，迫使很多国家恢复限制性的保护政策，例如美国政府对进口的巴西鞋子规定要征收附加税。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一致认为，仅用财政、信贷和关税的刺激仍不足以保证巴西出口的持续发展，还要有更多的政府干预措施，例如成立贸易公司和举行交易会等。

内阁物价会议在一九七四年十月颁布一项新政策，取消了对工业品加价须事前批准的办法。新政策一方面是政府旨在使私营经济发挥它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面临日益加固的保护政策下，可以允许出口商更为迅速的调整价格。

在西半球，巴西也开始采取和梅迪西政权时不同的新政策。巴西放弃了它对古巴的反共态度。最近在乔治亚召开的美洲国家组织外长会议上，巴西要求美洲国家组织重新审查孤立古巴的政策，这就直接同福特政府的现行政策唱反调。为了通过贸易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巴西现在完全放弃了它传统的对古巴所采取的反共外交政策。为求得拉美国家之间的团结和联系，巴西也同各个西班牙语美洲的近邻，特别是向安第斯山脉国家进行投资和订立相互贸易协定。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智利等已和巴西签订铜、石油、煤和其他原料的贸易和发展协定。巴西正在采取实用主义的对外政策，以便在西班牙语美洲国家中获得原料和市场。

巴西和日本的关系是特殊的。除美国以外，大部分的日本侨民，近一百万人居住在巴西。日侨大部分集中在塞俄·巴罗地区。巴西籍日本人以勤劳著名。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增

长，使巴西籍的日本人更为光彩。他们进入政界的人数不断增加。现任矿业和能源部长的，就是自一九六四年以来成为第二个内阁成员的巴西籍日本人。

日本在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开始经济扩张，并向拉美国家进行投资。日本在巴西的投资仍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其他欧洲国家，但它的经济利益在某些区域迅速扩张。田中角荣曾于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对巴西进行正式访问，使两国的传统关系更为加深。日本希望对巴西的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仅在一九七三年，日本在巴西的投资占巴西外国投资的比重：钢铁百分之四十三，造船业百分之八十，森林及木材生产百分之三十一，机器和工具工业百分之十九。田中同意日本帮助巴西发展铝矾土矿，并扩大铝的生产。日本仅在"巴拉计划"中即准备投资二十四亿美元，这将资助巴西在里奥·多康廷斯建设一个发电厂和一个有两万居民的新城市。

自由化运动，或者借用冯·拉扎尔的名词"排除压力"，或如亨廷登最近所说的从巴西独裁主义"逐渐排除压力"，将无可避免的对政府掀起一系列的压力。巴西政府开始诱导非军事人员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扩张经济进行支持。很多技术专家都是经济学者、社会学家和统计专家，他们都是在一九六四年以后受过大学教育和训练的，有些人还得到美国的援助和巴西政府的资助，在国外受过训练。一九六四年以前的技术专家现在是在政府各部门和机构中制定经济发展计划的人。联邦和政府官吏的这种很少引人注意的变动，保证文官阶层对这个政权的支持。为了扩大这个政权的广泛基础并促使进一步合法化，梅迪西和盖泽尔政府开始使军人政权的控制逐渐放松并向自由化发展。

这种新动向的首先证明是，在"三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时，不再举行庆祝了。仅以经济成就而论，盖泽尔政权完全有理由歌颂

它的成就。然而它似乎还在努力制造一个妥协的形象。

另一个自由化步骤是第三党运动的出现。科斯塔-席尔瓦政府的副总统佩德罗·阿莱舒是共和民主党的领袖。他的宪政设想曾在一九六九年为议会所抵制。他正在罗致所需的法定签名人数以批准他的设想。盖泽尔政府没有阻止这个运动，并且，政府的领袖也承认两党制的存在。一九七四年九月，据说共和民主党已经收集了九十万人的签名，但仍远不能达到法定的一百一十五万票，也就是一九七〇年选举的总选票的百分之五。

一九七四年的选举是从一九六四年以来第一次有争论的选举，除了对石油问题特别是由国家垄断沿海油田的开发问题是举国一致外，巴西民主运动要求采取更多的民族主义的措施——完全排除外资参加巴西石油的开采。巴西石油公司的新领导阿拉肯·奥里费拉将军再次肯定石油由国家垄断的原则。但是，在目前缺乏技术和资金的情况下，仍不能完全排除外资的参加。

通货膨胀也是在这个选举年中引起很大注意的问题。瓦加斯基金会公开反对政府关于通货膨胀的年增长率不限制在百分之二十以内的决定。该基金会的报告说工资收入者的购买力已降低百分之五十五，而劳动生产率却提高了百分之五十六。在一九七四年头三个月中，通货膨胀率为百分之十八。经济学家预测通货膨胀年增长率将接近百分之三十。

在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选出了联邦国会的三百六十四名众议员和二十二名参议员。巴西民主运动(反对党)在几个关键州都赢得了压倒的胜利。在参议院中，反对党在二十二个州中，有十六个州选出了它的代表。在众议院中，巴西民主运动赢得了不少于一百七十个席位。

无可怀疑，巴西民主运动的出乎意外的胜利，对盖泽尔政府和它的反对党都是一个很大的震动。政府鉴于反对党的胜利，必须重新考虑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象这样一个压倒的大胜利肯定归因于对通货膨胀的广泛不满，尤其是在一些城市和工业州内是如此。另一个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是公众的印象问题。由于全国革新联盟的政治代表都是一些老的和职业性的代表，都是一些既成权力体制的拥护者，而且巴西民主运动作为反对党以年青的新的面貌出现，这将使盖泽尔政府要想延迟逐渐放松压力的政策，就不那么容易了。

盖泽尔在国内外政策中的实用民族主义，更坚定了军方和专家政治的对立。一方面，巴西对它的发展理论作出基本的修正——考虑外资和技术在今后的作用，石油国家垄断，新的但是现实的和共产主义国家的联系，最后，政府独裁主义的逐渐自由化等。另一方面，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正在威胁着自一九六四年三月革命后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将有被摧毁的可能。鉴于这种逼近的威胁，一度是勇敢的反共军官的盖泽尔正在谨慎的、不太感情用事的、更为有理性的基础上重订他的民族主义的发展计划。

同共产主义世界的重新接触，这是五十年代军事学院派的任何成员所梦想不到的，但巴西在七十年代需要新的尝试和新的决策。盖泽尔和他的六十年代专家们是充分理解这种急需的，也是急于采取一个新的实用民族主义，以重新为今后十年制定方向。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一月美国《近代史》杂志　洪茂斌译）

西方经济衰退如何危害苏联

〔美〕《商业周刊》

苏联计划人员和经济学家理应对当前这场笼罩着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危机感到心满意足，然而，他们并没有这种想法。苏联经济有它自己的一些严重问题，眼下的情况是，许多苏联计划人员认识到，他们的经济要想接近计划目标，就必须同西方进行更多的贸易。因此，他们把西方经济危机看作是“利弊参半的事情”：既给他们带来了机会，也给他们带来了问题。

苏联经济发展的传统战略，主要是依赖两个因素：劳动力的迅速增加，以及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投资于重型生产资料部门。这套办法，在四十年代后期和五十年代里颇有成效，经济增长率既高而又稳定。可是到六十年代，经济发展就减慢下来了，在七十年代，到目前为止，成绩甚至更差，大大落后于计划人员的雄心壮志。

而且，预计的人口变化和消费品需求方面的日益增强的压力，将使旧战略的两个主要因素都会大受影响。计划人员只得通过改进技术这条路，而不是依靠单纯增加投资额的办法，来大力提高生产率。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艾布拉姆·伯格森说：“事实上，斯大林首创的著名的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终于要从苏联消失了。”

俄国人本国发展的技术历来很差劲，先进的机器和工艺不得不向外国购买。这种依靠外贸为基础来提高生产率的做法是

有弱点的。随着西方进口的成品价格飞涨而影响到苏联的成本结构，苏联经济将越来越容易受到来自国外通货膨胀的损害。目前，苏联凭借它出售原料（特别是石油）价格的上涨所增加的收入，对国外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害，还能暂时抵挡一阵。不过，原料价格可能由于世界经济更深地陷进衰退而急骤下跌，这时西方主要国家中工资价格的螺旋形上升，就会使苏联进口货的价格节节上涨。

然而，尽管风险重重，苏联还是决心朝着这个方向挺进，当然，同时也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副所长叶夫根尼·谢希涅夫说："假如认为我们将等待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萧条或通货膨胀时再同它们扩大联系，那就大错特错了。"他补充说："可是，认为我们不会限制这些国家动荡不定的经济对我国经济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那也是错误的。"

所以，苏联计划人员正在使用那些能使他们保护本国经济不受外国经济动荡的损害的办法。可是真正叫他们发愁的，主要还不是增加对外贸易可能带来通货膨胀方面的压力，而是迫使他们把外贸放到首要地位上来的内在问题，即经济发展的严重减慢。

发展有起落

苏联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是因为受气候的支配。一九七二年的严重歉收，使增长率降低到俄国人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百分之一点七，但次年农作物产量的明显回升就加速了经济发展的步伐，达到百分之七点五的坚挺水平。不过同这些短期波动相比，更重要的是长期发展趋势不断减慢。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年四年中，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四点四，比六十年代后

半期平均百分之五点五和一九五六到一九六〇年间的百分之六点五都低。

应该指出，这些百分比是根据苏联公布的数字经过细致认真的重新演算得出的，以便同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定义相一致而进行比较。苏联关于国民收入的概念一般不把劳务计算在内，通常还不随价格的变更而进行调整。估算这些数字的工作由宾汉顿的纽约州立大学经济学家斯坦利·H·科恩担任，他是美国公认的第一流研究苏联经济数据的专家。科恩说："西方专家并不完全不用(苏联)官方发表的概算，而是把它们作为确定比较可靠的数据结构的基础。"

资金转拨

七十年代头四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四点四，同第九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规定的目标年平均百分之五点八相比，使苏联经济学家坐立不安。

而且在此期间，尚未竣工的建设项目积压了起来，以致今年百分之七十的建设投资必须用于完成拖延下来的工程，并为下一个计划的开始而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这就意味着要把发展项目的资金转移使用。这种资金转拨的结果又可能妨碍今后五年的进程。

经济发展逐步下降，主要是因为无法提高生产效率。西方经济学家发明了一种对任何经济都适用的、从三个基本的有影响的因素去分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情况的方法。三个因素是：工时的增加、每个工人使用的固定设备的增加，以及这种设备的使用"效率"(主要取决于工业组织和技术进展)的变动。

哈佛大学的伯格森应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苏联经济，发现七

十年代头五年苏联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量同前二十年增加得一样快，但是他又发现“要素生产率”（即每个劳动和资本综合单位所生产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五〇到一九五八年间每年很快地按百分之一点七增长后，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七年每年就只增长百分之零点七了。七十年代里增长情况如何，很难作出精确计算，但经济学家基思·布什下的结论是：“苏联工业的资本生产率在六十年代头五年明显地一落千丈，而在后五年几乎停滞不前，到七十年代初又继续开始下降了。”

苏联报纸曾透露过一些生产率危机方面的细节。在当前的五年计划的头四年里，即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七四年，工业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二十六点四，而指标是百分之二十九，建筑业生产率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六，而计划规定的是百分之二十八点五。据一九七四年年终总结报告上说：“某些企业未能完成规定的产量、劳动生产率增长和资金积累的任务。许多工业企业还没有把大部分发展生产的潜力挖掘出来。生产能力、工时和原材料应当更充分地得到利用。”

劳动力缺乏

这种生产率增长速度降慢的状况如果不扭转过来，苏联工业发展的前景看来会更加黯淡。这是因为迄今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两个因素（劳动力的增加和资本的增长）在今后二十年内问题很多。（美国）商务部苏联东欧司外国人口分析科科长默里·费希巴哈曾经预测，苏联在今后的岁月里将有多少人能够参加劳动大军。他发现，从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五年，符合劳动年龄的人口每年约增加二百六十万，但是从一九七六到一九八〇年将减为二百十万，其后在一九八一到一九八五年竟将直线下降到

仅仅每年增加五十八万九千人。

在发生劳动力不足情况的同时，要求节制资本总额超速增长的压力亦将日益加强，而资本总额的这种超速增长，正如布什说的，原是"'斯大林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尽管战时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从一九二八到一九七〇年间，苏联资本总额仍几乎增加了十四倍，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它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九。但是这种迅速机械化的代价则是抑制消费者的需求，并把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五的国民收入移作投资之用。伯格森估计，在从新的投资取回的产品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如要保持百分之九的资本增长率，就得在一九八〇年时几乎把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分配于投资上，而这恰恰是苏联计划人员不可能办到的，因为要求更多更好消费品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苏联最高的政治领导人中间流露出一种"但求应付过去"的情绪。去年十月，勃列日涅夫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明确信号。他在对工矿经理讲话时不满地说："在各工业部门中，投资回收率日益降低，但是部长和领导人却继续要求给予建设新企业的资金。"这证实了伯格森的结论，即将来苏联的资本年增长率十分可能是百分之六。

随着投入的劳动力和资本所起的作用逐渐缩小，从现在起，苏联经济发展的快慢将更多地由生产率改进的情况而定。而生产率增长的情况事实上是越来越糟而不是日有改进。伯格森说："遭到战争洗劫的国家，有一段时期里经济发展都加快了，因为它们用比较有限的投资费用恢复了部分遭到破坏的生产能力，并应用其他受战争影响较少的国家的发明创造而加速了技术的发展。"但是到了六十年代，这种经济上赶上来的势头逐渐减少了，到七十年代就消失了，苏联经济中内在的因技术发展缺乏动力而大吃苦头的情况也暴露出来了。

贸易增加了

象主管苏联经济全面规划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尼古拉维奇·伊诺捷姆采夫等高级计划人员认为，根据以往纪录，苏联如有必要，完全可以自己干。然而担负着领导职务的政治家和计划人员至少在目前是宁愿借用西方商品和技术，作为摆脱生产率低下的困境的出路。

在过去四年里，苏联对外贸易额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三，苏联领导人计划到一九七五年再增长百分之十三。外贸部第一副部长伊·谢米恰斯特诺夫最近指出，在目前这个五年计划期间，外贸的增长额已是工业生产增长额的两倍。他说，这是"苏联更多地参与国际分工的证据"。在莫斯科的许多西方分析家认为，今年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将第一次超过外贸总额的一半。

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伊诺捷姆采夫一直把全副精力放在成立一个新的专门和西方国家合作的部门上面。

他说："这个部将处理有关计划协调、工业合作的具体内容和工业项目的分配等事项。例如不久前，我们同英国签订了一个协定，就涉及到外贸部、国家科技委员会和国家计委。"

苏联出口商品如石油、锰和铁矿砂的涨价，目前正有助于为日益增多的进口提供资金。石油出口量从一九七〇年九千六百万吨可能增加到今年的一亿二千五百万吨。其中约五千万吨出口到西欧，其余都到东欧和古巴。最近，苏联输往东欧伙伴的石油价格猛涨，并且加价要追算到今年一月一日，比预期的早了一年。这将使苏联获得更多的硬通货去买西方商品，并使它能从象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样一些技术比较先进的国家进口更多的生产设备。

抵制通货膨胀的保护措施

但是在较长的时期里，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材料价格可能重新发生周期性的不稳定状况——这一次是下降，而西方产品的价格则继续猛烈上涨。所以苏联计划人员已经搞了几套办法，以免他们的经济受到来自国外的通货膨胀的牵累。

最重要的办法就是所谓抵偿交易，即一家西方公司同意为一项大型采矿、连续加工或工业生产设施从事设计、筹款，时常还提供设备。在这种性质的合同里，苏联要把该项设施的一部分产量交给那家公司或有关的卖主，作为偿还贷款之用。这种交易可持续很长时间，十五年到二十年已成为通例，在此期间，苏联既可以把大部分产品供自己使用，同时又付清债款。

在莫斯科的一位美国银行家这样解释道："越来越多的俄国人用当期的美元购买工厂，然后超额生产百分之三十，再按以后的市场价格售出产品。实质上他们以低廉的美元购买，又以更低廉的美元偿付。"但是苏联经济学家萨希涅夫指出，利益是双方都得到的。他争辩道："迅速还债对于资本主义伙伴来说并不是件坏事，因为用于偿付的产品的价格已经提高。如果我们能很快付清债务，我们就可以提出另一笔更大的定单来。"他甚至争辩说，倘若"经济不稳定的国家"里有够多的公司参加这样的协定，"也许还可促使世界市场日趋稳定"。

不管如何，苏联经济决无可能避免在所谓"贸易条款"下不利动向（即苏联向外国购买的东西的平均价值比向国外销售的东西的平均价值上升得快的那种情况）所引起的消极影响。结果必然是苏联能够获得的先进设备的数量或质量（或两者兼而有之）要下降。

莫斯科制定技术政策的机构中有个重要官员说："高价格是同外国订立协定，特别是同美国订立协定的一个障碍。美国的技术比欧洲的好，但是当工业部长们说他们就是付不起美国的价钱时，我们就无言可对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俄国人想在几家工厂里引进卢穆思公司的制氨技术，可是不得不购买日本的技术上不很先进的设备，因为价钱比较合适。

因此，也许看到苏联评论家敦促西方国家（就象近来他们所做的那样）恢复旧的金本位制的秩序，重申采取节制通货膨胀的财政和货币措施，就不足为奇了。

（摘译自一九七五年四月七日美国《商业周刊》　马家驿　杨宇光译）

苏修报纸讨论什么是“轻快生活”

〔**本刊述评**〕 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三月，苏修《共青团真理报》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什么是“轻快生活”的讨论。不少“专家”、“学者”十分起劲，大发议论。从参加讨论的文章来看，可以说是奇文不少，废话连篇。本刊特予披露，供读者从一个侧面了解当前苏联社会的现状。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住在苏联巴尔脑尔地区、一个名叫克列姆涅娃的母亲，对她的两个儿子向往和追求“轻快生活”，感到十分担心。她写给《共青团真理报》一封信，希望从那里得到帮助。克列姆涅娃在信中说：“我儿子的同伴中有个小伙子名叫若拉，他已经好多年不在任何岗位上工作了，因为他给自己找到了一种‘轻快生活’；他同一个女人一起，在本地区中游荡，并承包俱乐部的艺术装修工作。若拉是根据私人合同工作的，也就是说，他自己开条件，自己订工资额。他经常有很多钱，举例说，他才二十六岁，就可以买‘伏尔加’小汽车了。”当然，若拉的本领还不止于此，他曾经说过：“不论是多么高价的商品，我都能轻而易举的得到。”若拉成了小伙子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了。克列姆涅娃的两个儿子“从心底里赞同他”，称赞若拉“能干”、“有进取心”，还准备学他的样。但是，克列姆涅娃却认为，“这种轻快生活就是一种隐蔽的、合法化了的寄生生活。”在母子的争论中，母亲说服不了儿子，所以她要求社会的帮助。

读完这封信后，克列姆涅娃描绘的若拉形象浮现在我们的

眼前：这是一个不务正业，投机取巧，搞“三自一包”（自找工作，自开条件，自订工资和私人包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若拉的年龄不大，但他也是在苏联这块资本主义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一株毒草。在资本主义复辟的苏联，象若拉这样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可以说是毒草丛生，毫不为怪，而若拉的“轻快生活”，正是苏联新旧资产阶级分子梦寐以求的，是那些“专家”、“学者”、精神贵族迫切希望保持和加以扩大的，也是那个社会所竭力鼓励的。克列姆涅娃能够从这样的社会里得到什么帮助呢？

现在让我们看看讨论的经过情况吧！

一个名叫利西奇金的经济学副博士跳了出来，他指责克列姆涅娃的观点根本没有说服力。为什么呢？这位经济学专家有三点论据：

其一、“若拉也是劳动的”。“多赚些钱不是盗窃”。这位“专家”真有点经济学理论水平。他连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什么是劳动？劳动是指一切能创造价值的活动，是指改变自然使之适合人们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若拉的所作所为是对社会有益的吗？显然不是。如果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活动都说成是“劳动”，那末，江洋大盗就应该授与“劳动英雄”的奖章了。

至于“多赚些钱不是盗窃”，那更是明目张胆地在为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辩护。马克思曾经说过：**“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资本家雇用工人从事生产，就是为了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为了多赚钱，发财。那位经济学副博士也许会说，那是剥削，不是盗窃。其实，这两者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其二、“为了使人生中的一切美好，就应该有钱”。这更是赤裸裸地大肆贩卖资本主义的“钱能通神”的谬论。赫鲁晓夫、勃

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以来，推行了一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路线，让卢布牵着人的鼻子走，整个社会弥漫着金钱的臭气，到处是货币权力至高无上的表现，“有钱可使鬼推磨”又成为当前苏联流行的格言。经济学家的热昏胡话不过是把他主子的意图说得更明确一些罢了！

其三、母亲和儿子的“这些矛盾不是突然地偶尔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的存在要用历史因素来解释”。“母亲的生活是在我们的需要比今天少得多的情况下度过的”。“现在情况变了”。可是母亲不识时务，还在说什么：“在我们那个时代……”怎样，怎样。无怪这位经济学家说：“这些话不能经常的使听到的人信服。”为什么这位母亲的话不能使人信服呢？按照这位经济学家的逻辑，是因为：生产水平低，人们不爱钱；生产水平高，人们爱财宝。这样的市侩经只能使那批在商品货币交换的土壤上滋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五体投地。

经济学家胡诌了一通以后，一位哲学家出场了。

哲学副博士别兹切列夫内赫一出场，就摆出一副“学者”的面孔教训克列姆涅娃说：“把贪财说成是一种隐蔽的寄生生活，真是这样吗？……但他（若拉）还是劳动的呀！”接着他又说：“国家不禁止包工，愤怒地揭发是根本不需要的吧。”其实，包工是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经济形式。在一定的条件下，包工可以发展成为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进行中间剥削、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包工是这样，其他旧的经济范畴如货币、商品等又何尝不是如此。苏修叛徒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经济领域扩大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残余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作用，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蜕化变质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哲学家别兹切列夫内赫为“包工”大唱赞歌，完全是为苏修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共青团真理报》在讨论中发表了官方的意见。它说："我们把克列姆涅娃的信和经济学家、哲学家的看法向读者公布，建议就提出的问题共同进行思考。""信的作者把追求轻快生活的现象和寄生生活相提并论是否公正。""什么是'轻快生活'呢？可能，在一些情况下，是由于幸运地选择了职业，由于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献给了事业……"这篇官方文告，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在《共青团真理报》看来，若拉选择了他的职业，挣钱多，生活好，那不过是"由于他毫不吝啬地把自己献给了事业"的结果。讨论刚开始，《共青团真理报》就定了这样的调子，这就注定了克列姆涅娃在这次讨论中失败的命运，正如她在信的结尾所说的："我担心，如果我在这次争论中失败，将意味着我只能听从两个儿子去受'轻快生活'的诱惑。"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在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苏联，这条原则已被根本颠倒了。在苏修眼里，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尊敬的。难怪若拉及其追随者追求所谓"轻快生活"，必然会有一帮子苏修哲学家、经济学家从理论上为之辩护了。所谓"轻快生活"就是资产阶级生活。今天的苏联已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天堂，亿万劳动人民的地狱。这位苏联母亲的失败是必然的。一切正直的劳动人民，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联合起来推翻新沙皇的统治，才能逐步铲除产生若拉这样的新毒草的土壤，并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真正取缔这种资产阶级的生活！

（复旦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工农兵学员　庄起善、孙惠丽、李茂）

章　鱼

〔美〕理查德·J·巴伯

美国实业界，还有美国各大公司的面貌，现在正由于本国历史上最大的合并浪潮而改观。每年有两千五百多家公司由于同其他企业合并而消失。这一事件本身是意义重大的，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前合并运动的性质。

几年前，各公司之间的合并，多是按行业相同或经营活动相近的原则进行。今天，这种合并的形式已过时了。现在合并的形式，是把各种具有不同市场的企业凑在一起，把它们合并成庞大的控股公司，并经常在国际上进行商业活动。按当前的提法，这些不定形的大杂烩式的大公司被称作"联营财团"。

奥格登公司是一家多样化并且经营得很好的年销售额达十亿美元的公司。它处理废旧汽车，在道奇尔运动场供应红肠面包，在巴拉圭养牛，加工水果和蔬菜，提供建筑和机械工程服务，经营一家储蓄和借贷公司，并且从事世界性的运输业务。贯串这些各不相同的各个部分的是一个管理核心。这个管理核心，是在拉尔夫·阿布隆董事长（一个能说会道主张合并的人）的指示下开展活动。他把合并看作是商业的自然演变，以及技术、通讯、运输和管理科学的根本变化的结果。

不论它发展的理由怎样，这种联营财团仍然是六十年代实业界最为生动的特征。而且，在本世纪的最后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内，它有希望成为美国实业的主导形式。数以百计的主要大

公司采取了多样化经营的道路，典型做法就是通过攫取一系列的有地位的企业。其结果是，有名的公司突然不再在市场出现了，而市场则对公众证明这些公司不得不改变原来的名称。还记得美国橡胶公司吧？它现在改为尤尼罗伊尔公司了，在改变名称后面出现了大多数实业界最近活动所共有的两个特征：这家公司已不再是一家橡胶产品制造厂商，也不是立足于美国的企业了。它目前的情况几乎同橡胶没有多大关系。同时，由于在二十三个国家有着二十八个研究和生产的中心，这家公司已失去它主要的、同美国特有的关系了。

R·J·雷诺公司，一度只不过是一家香烟制造商（除其他牌子外，还生产"吉士"牌香烟），现在经售家禽，汤类罐头，鸡蛋面，馅饼用料，和不含酒精的饮料，并且经营一家大的轮船货运公司。这家公司原名雷诺烟草公司，一九六九年起把"烟草"两字除去；现在改名为R·J·雷诺工业公司。利格特-迈尔斯公司现除供应香烟外，还供应狗的食物。博登公司现在经售咖啡、涂层织物、磁性录音带，以及从化妆品到肥料的各种化学用品。坎贝尔羹汤公司经售品类齐全的冷冻食品（用斯旺逊商标）和面包食品。可口可乐公司虽然仍在全球销售它的"提神间歇"的饮料，但也制造速溶咖啡、牧场饲料和"少女"牌浓缩橘子汁。费尔斯通"轮胎橡胶"公司制造无后座力步枪和喷气飞机引擎的零部件。百事可乐是发现改变名称为有利的另一个组织，改变新牌号是谋求超多样化经营的象征。它现在称做"百事可"，除原来不含酒精的饮料外，还供应各式各样的零食；同时并以它的北美货运公司代客在全国和全世界运输物品。美国钢铁公司在塑料、肥料和房地产方面都有巨大投资，并和伯林顿工业公司共同经营喷气飞机的出租企业。当纽约中央运输公司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合并时，这两个冤家对头马上改名为宾州中央公司，公

司招牌或新闻报道都再不提及运输或铁道了，并宣布今后将在象佛罗里达、纽约等州的房地产和纺织业广泛进行投资。

攫取其他公司成为多种经营的大公司

在美国，目前每年约有五千家公司进行合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通常的四倍多。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六八年末，近一千三百家资产各为一千万美元左右的工矿企业被其他公司所攫取。据说，它们的资产要超过五百亿美元。购买这些资产的买主是本国最大的工业康采恩和谋求更大的发展和多样化的大商家。在这个期间里，两百个最大的制造商攫取了近六百家公司，后者的资产超过三百亿。这些资产的半数是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八年这五年内被并吞的。特别是在石油、化学、造纸和机械等一些工业部门中，许多独立的殷实的大商行都被吃掉了。有些工业部门，如乳制品和纺织业等，早在六十年代就已全部被改头换面了。

近年来，已出现了大量的规模可观的合并公司。就长远的经济方针的目的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正在变化中的公司共同合并的特性。在过去，商行主要是同它们的竞争者、供应者或主顾进行合并。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是在一九〇一年从相互竞争的卡内基财团和穆尔财团中分离出来的。它一下子就把全国钢铁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合并掉。同样，约翰·D·洛克菲勒是在十九世纪末叶购买十多家炼油厂、输油管道和销售公司的资产而成立美孚石油公司的。在本世纪开始，象二十年代的合并浪潮那样，为了控制市场，用这种方式出现的合并运动把竞争的财团凑在一起，并司空见惯地巧取豪夺进行垄断。采用这一手法建立的许多富达亿万美元的公司，它们今天继续支配了我国

许多主要产业部门。

目前竞争对手之间的合并，正迅速地接近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在工矿业的合并公司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现在具有联营财团的形式。

有证据表明，那些最大的公司通过合并正在扩大对其经营有利的联营范围。一千家最大的企业中的五百六十家，在一九五〇年从事制造六种以上独特的产品。到一九六二年它们的数目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超过七百家。今天，两百家最大的公司经营着两千两百多种不同的工业商品，而且公司愈大，通常它所经营的范围就愈广，并且多样化经营的发展速度也愈快。

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多样化经营或联营活动以及近年来美国那些最大公司攫取其他企业的情况，可举博登公司为例。它曾经一度是乳产品的制造厂，现又攫取了一些企业从事水果和蔬菜的加工，制造糖果、粘合剂、涂层织物、塑料制品、梳妆用品和外科手术器械。其他的大公司实际上也都在进行相当程度的多样化经营。后果是：约半数的五百家最大的产业公司，目前经营四种以上主要的工业品项目。一家公司只固定在单一行业那种搞法，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许多公司现正进入一个新时代，把它们过去的形象抹掉，换上多样化经营的新装。每年营业额达十亿以上的美通公司，就常说它"对经营十几种生意着了迷"——经营人寿保险、房地产、私人贷款、消费投资和周转贷款、包机空运等。赫尔希公司的招牌用"食品公司"代替了"巧克力公司"，它的产品目录上增加了通心面、实心面和它的调味品、酥饼和饼干。当它把一家制造电子仪器的科里公司攫取过来的时候，它恰当地说："今天赫尔希比巧克力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记得赫尔克里士炸药公司吧，几十年来这个名称不就是军火的同义语吗？现在它改称为赫尔克

里士公司了。在改变它的名称的时候，这家公司指出："一九一二年公司以它的产品类型而命名，那时的产品类型还不到现在销售的十分之一。"

田纳西州煤气公司这一名称，同它的多种经营活动是很不一致的。它的资本投入化学、石油产销、纸品和打包、造船、房地产经营、农场和建筑设备制造以及银行保险业。它挂起了新招牌：田州公司，表明它现在是"一家高度地多种经营的公司"，附有六家分公司，而每家分公司本身都可归入全国首屈一指的五百家公司行列中。对明尼苏达矿业和机械制造公司、奥林公司、食品机器和化学公司以及许多其他企业来说，可以生动地看出通过多种经营而发展的同样表现形式。有时候竞赛的进度是如此之快，以致人们跟不上竞赛者的速度。例如，信号石油煤气公司于一九六六年决定进行多种经营。它攫取了麦克卡车公司、阿利桑那银行公司和艾利斯-查默斯公司（它为艾利斯-查默斯公司付出了四亿七千五百万美元，这是一个有着从农场器具一直到储油箱的各种不同产品的公司）。但是，正当它开始消化这些攫取过来的公司时，它本身却通过同西洋石油公司的合并而被另一家从事更为多种经营的大公司所兼并。顺便提一下，西洋石油公司本身的名称是会使人产生误解的，因为它一直在扩大它的业务——如住房建筑、化学用品和煤炭业。西洋公司和信号公司这两家公司合在一起的年销售额超过三十亿，对大公司之间的联姻来说，这倒是一份虽不典型但却是合宜的嫁妆。

联营财团这条章鱼的触角现已遍布全国各地。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简称 ITT）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该公司建于一九二〇年，四十年来主要经办通讯业务。后来哈罗德·吉宁担任公司董事长，他热衷于攫取其他公司而进行多种经营。在过去十年中购买了约五十家公司，其中大多是电子通讯以外的实业。它

攫取了阿维斯出租汽车公司（该公司同时还出租其他许多东西）、汉密尔顿经营管理公司（有五亿合股资金）、伊特纳金融公司（经办消费贷款和人寿保险）、谢拉顿公司（世界最大的旅馆业）、奈维特父子公司（一家庞大的住房建筑公司）、雷仁尼尔公司（该公司被攫取时资产为三亿美元）和大陆面包公司（全国最大的面包制造公司）。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还攫取了拥有十亿资产的哈特福德火险公司。在以后五年内，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销售额和资产都增加了一倍，在广泛兼并基础上的飞速发展，使它成了资产多达四十亿的联营公司。

这也许意味该公司的经营是以美国为中心，但事实上该公司的大部分业务都在国外。在遍及全球的业务中，它拥有一百五十多家公司，雇用职工三十万（半数以上不是美国公民），在五十七个国家中进行研究和制造活动，并在一百多个国家设有分销处。外国人经营的分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常有当地政府官员或在野人士作点缀，公司股东包括了数以千计的外国投资者。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现代化大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但却不是独一无二的例证——庞大，积极扩充，不论在实业经营或地区方面都广泛地作多种经营。它典型地说明了在未来岁月中，各国政府和公众都必须习惯于这类商业性的企业。一个联营财团的头头情不自禁地预言："在十年内，美国将只有二百家主要的实业公司，而且都是联营财团。"

联营财团的哲学

构成发展联营财团的力量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那种预见到联营公司将是商业发展的下一个演变步骤的新的经营态度。主张联营的人用新宗教的措词阐明这一普渡众生的、多种经

营发展的福音。它具有两个基调：发展和神圣协作。

就联营财团公司来说，发展是它本身的目的，这甚至比追求利润还重要。利顿公司（该公司也许是联营财团的鼻祖）的创始人、得克萨斯州查尔斯·B·桑顿是这样说明他的哲学的："我们不局限在商业中的发展，而是为了要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刺激性的气氛。发展是跟进步相联系的，是同完成更多工作的手段相联系的。利润只是动机之一。更强有力的动机是一种深刻的不断开拓精神。"这种强调发展、发展、更大发展的态度，同样渗透在所有的联营财团之中，甚至感染了许多老一点的商行。

神圣协作（全部大于它各个部分的总和），是另一说明联营趋势的关键因素。正如斯佩利·兰德公司所说的："我们做许多不同的事情，我们之所以把每一件事都做得更好，是因为我们同时还做所有其他的事。"在一个联营财团中，神圣协作采取的形式，是用某种能提供更大的实力和发展的途径把那些独立的商行紧密结合起来，这样就比仍旧让它们各自保留本身的工业主权而其实力不大和发展不快要好得多。例如，利顿工业公司预见到要组成一个运输系统的联营集团。为了贯彻这一计划，它攫取了休伊特·罗宾斯公司（这是一家庞大的制造装卸设备公司）、英戈尔斯造船公司和阿尔维-弗格逊公司（一家制造控制仓库装卸体系的计算机公司）。每一部分本身都具有价值，但却是统一的（在中心机构指导下，以适应客观广泛需要为目标）这个理论使各部分潜力能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这种神圣协作的概念，是同在集中经营管理控制下进行分散的多种经营活动的概念紧密联系的。对提倡联营的人来说，这种紧密联系是成功的关键，也是加速发展的关键。由于具有现代通讯和计算机化情报系统的各种有利条件，联营的经理们都异常自信，通过不断密切注意各行业的活动表现和在条件允

许范围内作些幕后的控制，他们就能管理一个多种多样经营的组织。一个联营的总经理大言不惭地说，他的由九十个专家组成的核心班子就能“管理任何一家联营财团和世界上的任何一家公司”。

正如六十年前那样，今天同样存在着金融帝国的创建者。象任何一位当代联营财团合并公司大王一样，林·特姆科·沃特（LTV）公司的主持人詹姆斯·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仅仅十年，他主要是通过合并，使一个年产值为二百万美元的电子业一跃而为年产二十亿美元在十多个主要工业部门进行多种经营的大公司。

其他两种考虑有助于解释美国正在不断加快合并的倾向。一种是联邦所得税法律。这些法律对由家族拥有的公司有很大的关系，它可以使公司非常乐意地和经济上有利地出卖给更大的公司，特别是出卖给公众占有的股份公司。这样做既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税和消除对未来财产税的动荡不定，又使一个家族能分散它的投资。这种税制也有助于促进较大公司之间的合并。比如说，某公司的一个股东拥有价值五千美元的股票，经过协商，被合并公司可能付给他价值七千五百美元的股票（或许是可变卖的债券）。他对这笔有利的证券交易并不需要纳税。而且，假使他拿到的是可变卖的债券，他获得的利息还可作为公司应纳税款的扣除额。

另一因素，是跟证券市场常常捉摸不定的倾向有关。这就是证券市场过高估价联营财团公司的利润而过低估价有所作为的企业的利润。联营财团公司的账面上一块美元的利润也许可以产生比如说为四十五美元的证券市场价格。而另一家公司的每份股额能赚得一美元，一张股票大概只值十五块美元。结果是一家联营财团公司往往就出售自己的股票，来换取另一家公

司的股份，这就使兼并几乎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举例来说，如果有这样一家联营财团公司，它的股票以每股四十五美元出售，而它却愿意换取另一家公司每股以十五美元出售的两股。这样，后一家公司的股票持有者宁可放弃价值三十美元的股票而换到了价值四十五美元的股票，因为他可得到相当百分之五十的溢价。

一般说来，由于联营财团具有和能提供非常吸引人的有利条件，因此，在购买它们想要购买的公司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困难。但是人们要问，它们怎么能干得象变魔术一样呢？部分的回答是，只要证券市场估价联营财团公司的利润大大超过非联营财团的公司的利润，那末，这就不牵涉到魔术的问题。联营财团公司的总管理处就是简单地利用了证券市场难以捉摸的心理状态。然而最主要的，还在于联营财团公司的不断发展并且在迅速发展着。这同踏车有某些类似之处，因为公司不继续增加利润收入，就失去使自己能承担它兼并后所带来的种种负担的能力。这恰恰是联营财团公司在狂热追求的扩张活动中所遇到的潜在问题。

由于各种进行多种经营活动的合并公司的压力，整个美国产业的行车图需要重新加以绘制。关于这一点，也是整个发达世界共同的问题。

（摘译自美国理查德·J·巴伯著《美国公司：它的权力、金钱和政策》，纽约一九七二年版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译）

法国出版动态

《马斯佩罗小丛书》

《马斯佩罗小丛书》是法国马斯佩罗出版社出版的丛书。该出版社成立于一九五八年，以出版政治读物为主。下列书目是已出版的该丛书的一部分：

《毛泽东选集》(三卷集)，《胡志明选集》，《卢森堡全集》。

《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列宁和哲学》，《列宁的莫斯科》，《公社。历史和回忆》，《一八七一年公社史》，《俄国革命的第一年》，《斯大林》，《谈资本论》，《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者》。

《中国文化革命史》，《中国文化革命和工业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越南人民反抗的故事》，《为了非洲革命》，《阿拉伯的革命运动》，《希腊的神话和愿望》，《肯亚峰脚下》，《巴勒斯坦史》，《阿尔及利亚的独立》。

《美国工人运动》，《欧洲工人运动史》，《美国黑人运动史》。

《论法西斯主义》，《强盗》，《看家狗》，《帝国主义在一九七〇年》。

《古巴革命》，《革命战争回忆录(格瓦拉)》。

《妇女解放》，《农民起义》，《青年的问题》。

此外，法中友协主席夏尔·贝特兰的一些著作也列在该小丛书中，如：《关于社会主义一些现实问题的通信》，《德国纳粹经济》，《印度独立》等。

(上海金山石油化工总厂青年工人　胡杰)

苏联法学动态

苏联举行关于公民尊重法律问题的“学术会议”

为了强化苏联国内的法西斯专政，苏联科学院国家和法研究所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召开了关于如何使公民尊重法律问题的“学术会议”。据一九七五年第四期《苏维埃国家和法》杂志报道，参加会议的有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司法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共两百多人。

会上，苏联司法部第一副部长A·Я·苏哈诺列夫谈在学术理论上研究如何使公民遵守法律的“现实意义”，反复鼓吹必须在公民中普及法律知识和进行法律教育。

苏联内务部副部长Б·А·维克托罗夫在会上发言说，苏联的司法机关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舆论的潜在力量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作用，以形成一种不容忍破坏法律秩序的气氛、加强对违法行为的监视、健全法律教育措施并提高司法机关工作者的专业技术水平。

A·P·拉基诺夫发言说，发展法律意识理论必须重视调查工作，在全苏防止犯罪研究所的调查中证明，刑事犯和守法公民相比较，在内心尊重法律的程度上后者较前者更为稳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和蒙古的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

（复旦大学外语系工农兵学员　李茂）

苏联学术动态

苏联举行拉丁美洲问题讨论会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主持召开了一次“国际”性的拉美问题讨论会。据一九七五年第二期苏联《拉丁美洲》杂志报道，会议集中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趋向和前景。应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学者以及古巴等国的大使馆代表。

在会议上，苏联拉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弗·弗·沃利斯基教授致开幕词。他大谈苏联对拉美国家的“全面援助”和“施加的革命影响”，并要求对拉美的关系问题“集中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苏联方面的报告有：历史学博士阿·恩·格林金教授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斗争同拉美国际关系的发展》，经济学博士勒·勒·克洛奇考夫斯基教授的《苏联同拉美各国的经济合作问题和展望》，拉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副博士叶·阿·科萨列夫的《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和拉美经济一体化》，地理学副博士弗·伊·布拉文的《苏联和拉美国家在能源方面合作的现状和远景》，历史学副博士阿·斯·科瓦利斯基提出了《苏联和拉美国家在联合国系统的国际组织中合作的趋势和前景》的报告。

其他国家的报告有：匈牙利勃·卡达尔的《影响社会主义国家同拉美经济联系的发展和前景的因素》，波兰兹·多鲍谢维奇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拉美一体化集团关系发展的问题》。

（彭万林）

苏联经济动态

苏联召开集体农庄会议

据一九七五年第五期苏联《农业经济》杂志报道，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联集体农庄会议，讨论了苏联农业的状况以及第九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的任务。苏修政治局委员、集体农庄会议主席、农业部长Д·С·波果斯基在会上作了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各加盟共和国的农业部长以及一些集体农庄的主席等。

据报道，一九七四年苏联谷物生产不佳，总产量一亿九千五百六十万吨，低于一九七三年的水平。谷物收购量七千三百多万吨，其中集体农庄出售近四千万吨。由于谷物减产，眼看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指标难以实现，苏修叛徒集团十分着急，在会上一再重申，一九七五年谷物产量必须达到二亿一千五百万吨，收购量不低于八千七百万吨。为了完成这一指标，会议认为，一要扩大谷物的种植面积，二要提高单产，要求平均每公顷达到十六公担的水平。

会议透露，在第九个五年计划已经过去的四年里，甜菜的种植面积缩小了，甜菜的收获量和含糖量都下降了，原因据说是"甜菜栽培的注意力放松了"，"很少施肥"，"收获期往往被干扰"，等等。

会议还透露"农业经济最复杂的部门"的畜牧业问题，指出在这方面虽然"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会上许多人的发言谈到，不少农庄生产效率下降，成本增高，技术人员和青年不安心农业生产，纷纷想离开农村等，都是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

（诸自建）

日本史学动态

关于日本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多年来，关于日本历史的分期问题，日本历史学界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出版的日本进步报纸《长周新闻》和日共(左派)中央机关报《人民之星》，发表了一位中学教师藤井贤三写的《日本历史的分期》一文。藤井贤三在文章中强调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对日本历史进行分期，批评了日本史学界关于历史分期的某些谬论和错误见解，提出了他自己的关于日本史分期问题的意见。

据作者介绍，在日本，关于日本历史的分期问题的不同见解，包括专史在内，竟有三十七种之多。作者对三个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提出了批评。

第一个受到藤井贤三批评的，是原东京大学教授、以西洋史学会的权威而闻名的堀米庸三。此人所著《观察历史的眼睛》一书，在青年中拥有许多读者，流毒甚广。他主张按照"和平团体"的发展来分期。所谓"和平团体"，据说是"在其内部禁止行使暴力的团体"。于是，家庭——农村——城市——国家，就成了他的结论。藤井贤三讥讽地写道："他说不出别的话来，竟然说什么国家是和平团体！学生们大骂他是'脑软化症教授'或'糊涂专家'，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第二个受到藤井贤三批评的历史学家是远山茂树。文章说，远山茂树认为历史分期的标志不是一个，而是有好多个，如生产方式、政权的阶级性质、阶级斗争等等。而对其中的每一个标志，都长篇大论地作了模棱两可的说明或解释。但是，读完以后，所谓历史分期是什么，如何处理才好，却越来越糊涂了。

文章也评论了井上清的历史分期观点，特别批评了井上清关于"日本社会的变革，不是一下子从下面用革命的方式来进行，而是点滴地积累来

自上面的改良”的说法。

藤井贤三认为，井上清的分期不清楚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井上清讲过：“在日本，来自下面的革命为来自上面的改良所阻止。因此，分期是不清楚的。”藤井贤三不同意这个意见。他认为：看不到革命就不可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期。即便徒具形式地借用奴隶制、封建制这些名称，也会功亏一篑，最后陷于日本历史是不知不觉地和平演变的谬论中去。

藤井贤三认为，研究日本历史的分期，首先必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来划分历史时期。其次，特别必须坚持“奴隶社会”这个名称。第三，必须把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的转变作为革命来理解。关于这一点，文章用以下的史实阐明了作者的观点：“虽然有一些人持不同的说法，但是，把镰仓幕府的创立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把明治维新作为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开始，大部分人的意见是一致的。倘若是这样的话，那么产生出它们的源平战争和幕府末期的维新战争不就是封建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了吗！是否把这两者明确地规定为革命战争＝暴力革命，这不但是在分期问题上，而且也是日本历史本身的最大的要点。……（源平战争和幕府末期的维新战争）既然是革命，那就必须有革命的政党和革命的军队，需要革命的领导人。革命家是谁呢？在封建革命中是源赖朝；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是吉田松阴、高杉晋作、西乡隆盛等人。别人也许会对武士政权的创始人、专制主义官僚是革命家这一点提出异议。但是，……在推翻平氏政权和江户幕府以前，他们是得到人民的拥护、带头进行战斗的革命家。这种革命家在镰仓幕府和明治政府设立的时候，就转化为反人民的压迫者。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文章指出，在这方面，中国的批孔运动中，孔子作为拥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而被彻底地摈弃，反之，秦始皇则作为废除奴隶、创立封建专制国家的元勋而得到一定的评价，这是很有意思的。第四，必须将一个社会形态划分为上升期、鼎盛期和下降期，以便明确这一社会的盛衰。第五，必须确定现在（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处于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哪个阶段，它会被什么样的革命所扬弃。

然后，作者就日本历史的分期问题发表了如下的见解。

原始公社社会（十万年前——公元前三百年）

这是建立在狩猎渔捞等自然物采集经济之上的无阶级的社会。

奴隶制社会(公元前三百年——一一八五年)

文章说,按照地理的观点,把日本同希腊、罗马作比较来决定被剥削者是不是奴隶,这是欧洲中心史观的残余。奴隶,只能说有希腊、罗马型(连它也是因时而异的)、日本型和其他类型,而不是比较一下哪一种最象是奴隶。

一、成立期(自公元前三百年的稻作开始)

统治和剥削的阶级社会开始了,奴隶的存在得到肯定。(见《后汉书》)

二、发展期(自公元三百年的邪马台国开始)

由于难以和解的阶级对立,国家出现了,奴隶制进一步得到扩大。大和河内平野的开拓(生产)、仁德陵和法隆寺(文化)都是由奴隶承担的。(见《魏志·倭人传》和氏姓制度)

三、完成期(自六四五年的大化革新开始)

由于大化政变,日本建成了法制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方面,奴隶主的头头专制天皇把奴隶主的豪族作为官僚组织起来,而把另一方的全体人民作为国家奴隶加以统治。(见律令①、《防人之歌》②、《贫穷问答歌》③)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奴隶和农民为规避赋役而逃亡的阶级斗争开始激化。

四、衰微期(自九〇二年的班田制结束开始)

班田的完结也就是庄园在全国的发展。农民加强了对土地的所有权,逐步从奴隶上升为农奴。斗争形式从逃亡发展到诉讼和反抗(见尾张国④郡司和百姓等的诉状)。带头的有武士(当时武士是人民)的反政府的斗争(最初的承平、天庆之乱同这一时期的开始大体上一致)。于是,国家也就丧失了统一的形态;随着中央政府相应地变质为藤原政权、院政权和平氏政权,国家就逐渐衰落下去。

---

① 律是刑法,令是行政法及其他。

② 防人是当时的边防军,《防人之歌》收在《万叶集》中。

③ 也收在《万叶集》中。

④ 在今爱知县。

五、崩溃期(自一一八〇年的赖政举兵开始)

这就是导致最后的奴隶主政权——平氏政权灭亡的源平内战,即封建革命战争的时期。

封建制社会(一一八五——一八六八年)

一、成立期(自一一八五年的镰仓幕府成立开始)

赖朝的封建革命获胜,公武①联合势力掌握了权力。以后,武士粉碎了朝廷发动的两次反革命——承久和建武之乱,武士的政权得以维持。这一时期封建农民的主要形态是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由于经济外的强制——鞭子、习惯、成文法——而遭受剥削,在领主的土地上服若干天的劳役)。

二、发展期(自一三九二年的南朝投降开始)

经过六十个年头的南北朝内战,公武的地位颠倒了过来,由于南朝投降,实际上开始了武公联合的室町幕府。

三、完成期(自一五六八年的信长入京开始)

由于长达一个世纪的战国内战和丈量地亩、没收武器,庄园制的残余被清除干净,奴隶主阶级最终归于消灭,成立了武士阶级的单独政权。这一时期封建农民的主要形态是隶农(在身分上比农奴前进一步,缴纳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

四、衰微期(自一七一六年的享保改革开始)

江户幕藩体制是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因而也是它的最后阶段。看起来那样巩固的统治人民的机构,由于两个方面——资产阶级因素的发展和农民起义的高涨——而开始衰微。

五、崩溃期(自一八六三年的组织奇兵队开始)

青年下级武士站在一切反幕势力的前列,组成人民武装奇兵队,夺取了藩的政权,接着成立统一战线的萨长同盟,把幕末戊辰的资产阶级革命战争打到底,并取得了胜利。

资本主义社会(一八六八年——现在)

文章说:这一时期的分阶段,应当考虑到以下各点:一、资本主义经济

① 即"公家"和"武家",指当时的朝廷和幕府。

的演变；二、由阶级斗争造成的阶级关系的变化；三、政治体制的相应改变；四、对外侵略的扩大；五、同世界史，尤其是东亚史的联系。上述各项，必须按照政经一体、内外一致（即"对内压迫、对外侵略"）的观点，全面地加以掌握。从这个观点来考察的时候，就资本主义经济来说虽处于困境，但它在对内镇压阶级反抗、对外进行侵略战争中取得一定的"成果"时，就资本主义体制来说，可以认为它是处于上升期中。反之，不论表面上如何暂时呈现一派兴旺景象，在它对内难以镇压阶级斗争、对外不能随意进行侵略时，就必须认为它是处于下降期中。

一、成立期（自一八六八年的天皇政府成立开始）

二、发展期（自一八九〇年左右的帝国宪法、日清战争和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

三、完成期（自一九一五年前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景气、抢米暴动和原内阁开始）

这一时期也可以一九三〇年左右的对共产党大镇压、昭和经济危机、"满洲"事变、五·一五事件为界，划分前后两个阶段。

四、衰微期（自一九四五年的日帝失败开始）

由于战败，日本处于美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这件事情虽有占领（"媾和"以前）和附属的区别，但基本上直至今天没有变化。这是日本史上无前例的事情；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此长期地而又如此全面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处于别国的控制之下，在全世界也是没有先例的。因此，这就是把它作为衰微期的理由。

战后，当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前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高涨和民族解放斗争勃兴的背景下，美日反动派企图依靠资产阶级民主来阻止在日本高涨起来的革命趋势。他们把日本帝国宪法改为日本国宪法，把教育敕语改为教育基本法，把"为天皇和国家"改为"为自由民主主义和个人的幸福"，总之，这只不过是把太过时了的"国民服"和裙式裤子①改制成当今流行的资产阶级服装罢了。国家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它是压迫人民的机构，在这一点上丝毫没有两样。

---

① 日本妇女劳动时穿的一种裤子。

五、崩溃期

谁都看得很清楚，由七十年代开始的美日反动派的没落，如今呈现出危机的样子。是否跟着立即发生崩溃，这完全取决于革命核心的形成和人民斗争的高涨。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已经开始或不久即将开始的崩溃期中，通过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民族人民革命，维新以来的日本资本主义时代就会结束它的既长又短的一生了吧。

在提出了自己关于日本历史的分期的意见之后，藤井贤三写了以下的几点小结。

一、如果从整个日本历史来看，阶级社会时期是极其短暂的。就是在阶级社会中，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各段时间也是逐渐缩短的。

二、承担下一代的新阶级的抬头，就是旧社会的衰微期的开始（在资本主义情况下，因为还要加上对外因素，稍有不同）。

三、在一个社会形态中，上升期（成长、发展）是缓慢的，下降期（衰微、崩溃）是迅速的。特别是崩溃期，仅仅只要几年就解决了。

四、生产关系通过革命，也就是暴力革命而改变。连两个阶级的联合专政中的势力交替，也需要激烈的阶级斗争（如南北朝内战和抢米暴动）。

（丁日初）